

● 周永新 著



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
60年

● 周永新 著

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

60年

中華書局

□ 黃仕編輯：黎翠玉
□ 裝幀設計：高林
□ 昇：顏：黎品亮
□ 印：蔡：劉漢華
□ 封面圖片：工聯會，羅漢華

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 60 年

□

總書
周永新

□

編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2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五

電話：(852) 2131 2338 傳真：(852) 2133 8383

電子郵件：info@hongkongbooks.com.hk

網址：http://www.hongkongbooks.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門路 66 號

中華書局附設大書 3 字樓

電話：(852) 2158 2188 傳真：(852) 2487 2862

電子郵件：info@logistics.hk.com.hk

□

印刷

香港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順業街 5 號 尚德工業大廈 5 樓 A 室

□

版次

2014 年 7 月初版

© 201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約 16 開 (230 mm×170 mm)

□

ISBN：978-985-8298-92-3

自序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我到了新加坡和澳洲休假：這兩個地方都較香港清靜，朋友聽見，都說新加坡和坎培拉的城市生活十分沉悶。我不怕沉悶，平日很少應酬，正好趁休假，白天做研究，晚上寫些自己喜歡的東西。結果，放假大半年，共完成兩部書，一部交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書名為《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去年增訂，書名改為《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復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另一部記述自己對香港過去的所見所聞，交由明報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目睹香港四十年》。

為什麼提起以上兩部書？2012年，我從教學完全退下來，也減少公職服務，騰出的時間正好用來修訂自己過去的著作。首先想到的是香港中華書局替我出版的《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後來用了一年的時間，把全書增修完畢。雖說是修訂，大部分是重新編寫。時隔二十年，香港的社會政策很多方面都改變了。《香港政策的觀念和制度》於去年6月出版後，為我打點編輯工作的，是香港中華書局的黎彩玉女士，她提起我的著作中有《目睹香港四十年》一書，不知是否有興趣重新出版，記述香港回歸前後的情景。

其實，2007年時，我剛滿六十歲，已有意思把《目睹香港四十年》翻新。這樣的翻新工作，在1997年曾做了一次：《目睹香港四十年》1990年出版，到1997年，我在原書增添新材料，書名改為《見證香港五十年》，於1997年出版。可是，2007年翻新的意念並未成事，但重修此書的衝動未有減退。

為什麼我有這個衝動？我在《目睹香港四十年》序言中說：「我突然有這個衝動，寫下我過去看到的社會現象，並把我內心的感受寫出來，多少也受到去年北京民運事件的影響，……我感覺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將出現很大的變化，我不知道香港社會將變成怎樣的面貌，但香港的過去是我認識的，我感受到有責任把曾經出現的一切記錄下來。」

在《見證香港五十年》的序中也寫着：「從八九年到現在，轉眼又過了七、八年，到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便要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自己也剛過『知天命』之年。回顧過去十年的情況，香港又經歷了無數改變，這些改變不單是多了幾棟高樓大廈，而是香港的整體結構，從基本的生活條件、家人間的關係、權益的觀念、對香港政府和中國的態度，都出現了複雜和難以理解的變化。在九七回歸之前，我希望補述這些變化。……」

香港有什麼變化而令我有執筆的決心？首先，香港社會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我熟悉的貧窮，情況很不一樣。三十年前，我認為香港的貧窮已非「吃不飽、穿不暖」，今天再這樣形容貧窮，看來

也不再貼切？其次，常說香港的收入分佈極不公平，貧富懸殊。香港的穩定會受到破壞嗎？第三，香港的住屋問題轉化為階級矛盾，抨擊「地產霸權」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的房屋建設為什麼淪落到如斯地步？第四，香港的家庭顯得支離破碎：年輕人不結婚、不生育，老人被形容為「社會包袱」，親情去了哪裏？最後，香港人追求的「獅子山下精神」是怎麼一回事？「獅子山下精神」仍存在嗎？

我無法解答以上問題。香港社會發展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並非當初所預料的：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簽署後，誰能預測中國出現的變化？97年回歸後，誰會想到香港的經濟如此大起大落？「港人治港」受到如此重大考驗？如果要解釋這一切，無論我做多少研究，相信也徒勞無功，但我可以做的，是把看到的現象記錄下來。

《目睹香港四十年》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過去十多年裏，我曾在報章和雜誌上，斷斷續續的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評論，多是介紹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或分析一些社會問題。在這些文章裏，我很少談到自己的感受，一來文章以分析為主，二來我希望客觀的討論問題，不想在文章裏加入自己的喜惡。」我繼續說：「為了表達我的感情，單是分析問題是不夠的，我決定以第一身來記述香港社會經歷的轉變。在這書裏我加入多個我親身看到或聽來的故事。這些故事或許並非曲折離奇，但卻有血有肉。我相信也只有真實的故事，才可記香港過去的四十年描繪出來。」

在這書裏，我也採用相同的敘述手法。《目睹香港四十年》和《見

證香港五十年》書中出現的故事，五、六十年代的大致保留下來。我想今天年輕一代未必知道當日的情景。至於七十年代以後發生的事，大致上是新的，前兩書未有記載。故事敘述是本書的主軸。適當的地方我也加入一些統計數字和分析，但數字只有輔助作用，免被人懷疑以偏概全，社會變遷主要是透過親身的經歷來說明。

本書原先的計劃是想多方面的描述香港社會的不同面貌，但範圍太廣，難以掌握，而我過去專注的研究範圍是貧窮和社會保障，參與的公職也以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為主；所以，本書內容還是圍繞香港的貧窮面貌，以後有機會，再來記述其他方面。其實，貧窮面貌反映的，又何止限於窮人的生活？貧窮又豈可與社會其他現象分割？

寫《見證香港五十年》一書時，我在序言中說：「……這個時候寫這部書，或許有點特殊的意義。九七到來，香港主權隨即移交。有說是香港的大限，有說是香港的契機，無論如何，大部分香港人仍在這小島上生活。香港過去出現的社會現象，是香港人奮鬥和求存的歷史。內中有勇敢的行為，也有令人噁心的故事，正是香港剛強和懦弱的寫照。我們未必要保留過去的一切，但對於社會現象的了解，正好幫助我們，迎接九七的來臨。」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已有十七年。回首這段日子，我們感到的是嘆息、迷惘、無奈，還是滿足、高興、期待？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曾說：「我們身處的是富歷史性的時刻。」我十分同意。我們很難把香港特區經歷的十七年，與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比較，畢竟管治制度

不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也有差異：我們必須向前走自己的路，並且從過去的經驗吸取教訓，這正是本書寫作的目的。

我深深的相信，只要我們如實的看待過去：不加以醜化，也不張狂，我們總可作出結論：香港是怎樣的社會？這書既不是歷史，也不是傳記，唯一相近的是我中學時讀的《老殘遊記》：我相信只要如實的記錄，真相自可在其中尋見。

目 錄

自 序 ii

第一部分 八十年代前的香港 ——從物質匱乏走出來

- | | | |
|-----|--------------|----|
| 第1章 | 五十年代：一窮二白的貧窮 | 11 |
| 第2章 | 六十年代：捉襟見肘的貧窮 | 31 |
| 第3章 | 七十年代：物質之外的貧窮 | 47 |

第二部分 八十年代到回歸前 ——貧富懸殊：從羨慕到妒忌

- | | | |
|-----|----------|-----|
| 第4章 | 經濟繁榮的背後 | 61 |
| 第5章 | 貧富懸殊變得醜惡 | 103 |

第三部分 **回歸後香港的貧窮**
——香港人珍惜什麼？

第6章	個人責任還是社會責任？	137
第7章	貧窮新一代與「M型」社會	173

第一部分

八十年代前的香港

——從物質匱乏走出來



圖後勞苦大眾的居住環境十分單狹。

按：第一部分的圖片，除特別聲明外，均由工聯會提供，特此鳴謝。



媽媽們帶著在工人留產所出生的孩子參加留產所舉行的湯餅會，親如一家。



「大羹一瓠，一瓠五羊」——戰後工人工資低矮，午餐躲在街道進食。這棟灣仔永豐街，又叫「磚地工人食街」。



1949年12月電車工人因要求資方增加特別津貼遭到拒絕後，採取罷工行動，後來更釀成血路罷工事件。圖為當年警察在電車工會門前佈設了警戒線。



工會團體舉辦的車縫班，吸引不少婦女參加。



戰後工人受教育機會不多，尤其是婦女，故不少團體舉辦識字班，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



1953年石岐屋大火，災民達六至七萬人，不少團體展開賑災等救濟工作。



1976年6月18日，因連日暴雨發生山泥崩落，數幢羅麥安置區有七十八間房屋，近二百人被活埋，造成七十一人死亡。



1963年香港經歷嚴重旱災，四天供水一次，每次供水四小時，連小孩子也要幫忙挑水。



1973年8月，基隆製廠關閉，資方提前一個月通知解僱全廠1300名員工，不作任何補償。工人遊行到勞工處陳述聲，要求資方發給遣散補償。事件促使政府於1974年實行遣散費條例。



五十年代初期修頓球場旁的盧押館，圖片右方為戲院。本書作者周永剛小時候在灣仔長大，修頓球場是他經常遊玩的地方。（圖片提供：高夢強）

五十年代：一窮二白的貧窮

貧窮是怎麼一回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貧窮也不是調查和研究發現的現象，是每個人在人生中，或多或少必然遇到的經歷和體驗。這些經歷和體驗，也非窮人才擁有；今天不少腰纏萬貫的富豪，他們發跡前，何嘗沒有經過一段艱辛的日子？

本書裏寫的貧窮面貌，指的是物質生活的匱乏，也旁及一些非物質的事，如夫婦之間的感情、家人的關係等，但範圍不會太廣泛，否則多寫幾部書也無法說清楚，我也力有不逮。

即使是限於物質生活的匱乏，若從第二次大戰結束計起，香港過去六十年經歷的，我怎能描述清楚？我可以利用一些數字來說明，如從1971年開始，公共援助轉以現金派發，只要翻查社會福利署歷年發表的報告，不難看到多少市民需要援助，他們窮的原因是什麼？有了這些數字，是否就對香港的貧窮有認識？我需要引用一些數字來說明香港的貧窮面貌，但數字是死的，我說的仍是自己的感受。

從「和昌大押」說起

今天，政府講起保育工作，常向外人介紹的，是修頓球場莊士敦道那邊的「和昌大押」。政府想要證明的是，自己並非單顧地產發展，還花了不少工夫保留舊建築物，作為市民的集體回憶。但這是怎樣的保育工作？「活化」得來什麼效果？現在的和昌大押搖身一變成為一所頗高檔的西餐館和酒吧，下層有中式食肆，兩間我都只光顧過一次，都是別人請客。

我為什麼提起和昌大押？因從我有明確記憶開始，到我小學畢業的十多年裏，我家就在和昌大押附近一棟唐樓的第二層。往日最底的一層稱一樓，第二層是二樓。我小時候曾入過和昌大押，是大姊帶我入去典當物品。記憶中的押店（那時稱當舖）並不可怕，尤其窮人朝不保夕，有東西典當已不算窮了。

我孩童時認識的灣仔，只限於修頓球場一帶。印象中，灣仔是龍蛇混雜的地方，而且十分破爛。我家住的一棟舊樓，原先沒有廁所，後來在屋內梯間底下加建，日間漆黑如墨斗，沒有通風和照明的窗，用廁時開着燈，旱廁就突然出現，嚇你一跳，只好急急完事。全層包括騎樓，三間板間房，走廊安放兩張雙層碌架床，屋的盡頭是廚房。屋內沒有浴室，洗澡是趁沒有人煮食時在廚房沖身，天冷就要燒熱水，一旦遇上「制水」，三、四天供水一次，洗澡是辛苦事。

我家住的一層面積有多大？走進現在的和昌大押便知道，應該不到一千平方呎（約一百平方米）。我家的一層共住四伙人，頭房（騎樓）是裁縫店，出入有五、六人，留住的有一、二人。我家共八人，父母親和六兄弟姊妹，父母佔了一間板間房，六兄弟姊妹睡在走廊的兩張鐵架床。另外有兩伙人，各佔一間板間房，兩家合共有七人。全層住客共二十人，每人佔用面積約五十平方呎。

我家的居住情況並不算差，至少有瓦遮頭，那時蝸居是等閒事，只要有地方棲身，那怕一家八口一張床，住屋問題算是解決了。沒有居所的，只好在山邊蓋搭木屋，或在較寬闊的行人通道旁霸佔一角，放置床鋪並圍上布簾，這樣就是自己的家。莊士敦道到灣仔道兩旁，便有不少這樣的「臨時建築物」，每格床是一個家庭，隨時可以住大大小小四、五個人。

有些上了年紀的男女，他們應是孤家寡人，多在修頓球場圍欄外朝行晚拆，或在樓梯轉角處鋪幾張報紙便睡覺。我家樓梯便住了一名老婦，我有三個兄長，其中一個較挑皮，上落樓梯時把老婦的家當踢翻，老婦不知從哪裏拾來掃帚，追着我的哥哥打。老婦如何維持生計，我不知道，只知她有吸毒習慣，是「追龍」那一種，即把海洛英（白粉）放在錫紙上，加點水，下面燃起洋燭，然後用吸管去抽。修頓球場附近的春園街，我看見不少「道友」（吸毒者）吸毒，一些用針筒，直接把海洛英注入血管。聽大人說，注射白粉很快死去，因白粉有雜質，注射白粉容易有併發症。我親眼看到「道友」暴斃街頭，路人不會理會，街坊通知警察派人來收屍便了事。

為什麼我好像終日流浪街頭？我並非諸事八卦的人，只是家裏有六兄弟姊妹，平日生活去哪裏玩，父母不會管這麼多，只吩咐我們不要鬧事，不要只玩不做功課。住的地方既然擠迫，小時候很少留在屋裏，做完功課就往外跑，修頓球場最常去。另一處玩耍的地方，是幾座舊樓連在一起的天台，晚飯後總有十多個孩子聚集，大人也在乘涼。父親有空時，間中到天台放紙鳶，這是我唯一與父親說話的時候。後來天台蓋搭了木屋，我們也不到天台了。

導演方育平執導的電影《野孩子》，描述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情景。那時貧窮家庭佔大多數，誰家的孩子不『野』？我小時候的修頓球場，看到的人和事，只好說千奇百怪。嫖、賭、飲、毒、吹，見怪不怪，對我的成長不知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唯一能確定的是，窮人的生活不好過，為了兩餐一宿，多少窮人能顧及自己的人格和尊嚴？

五十年代的貧窮情景

二十年前，我在《日睹香港四十年》一書中，對五十年代的物質生活，有以下的描述：

五十年代香港攝製的粵語片，應是那個時代貧窮景況最貼切的寫照：一家八口一張床，或飽受風雨侵蝕的木屋。至於衣着，多十分靚素，勞動階層的男士還有穿著唐裝的，孩子多衣不稱身，衫褲是兄姐穿過的，看起來總是過大。那時

失業十分普遍，沒有工作便沒有收入。所謂貧窮夫婦百事哀，拮据的生活產生各種問題：做丈夫的找不到工作，灰心喪志之下，或鋌而走險，或吸毒以逃避殘酷的現實；而子女缺乏適當照顧，男的誤入歧途，女的被騙貞操，被青火坑，從此永不起生。

在書中，我加插了幾段見聞：

五十年代，我仍是一個小學生，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學校有救濟包派發。救濟包上印有兩手交叉緊握的標誌。後來修讀社會工作，方知是英國救濟會的標誌。救濟包包括麵粉、芝士、奶粉等，麵粉和芝士多拿去賣錢，奶粉沖水做早餐，如一般中國人孩子，我不太喜歡。

我曾擔任基督教服務處執行委員會委員，期間有機會見到一些記錄五十年代貧窮情況的照片。香港基督教服務的前身是信義宗服務處，在戰後初期，曾替香港籌募大量救濟物資。照片中，可見領取救濟品的多是三四十歲的家庭主婦。看來她們的丈夫外出工作，她們留在家中看管子女。這些婦女沒有營養不良的面色，只是應付基本生活以外，還要救濟品補充。

香港小童群益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成立的組織，戰後恢復工作，仍為失學的孩子提供活動。小童群益會留有五十

年代拍攝的影片，影片所見，男童上身多沒穿衣服，只穿短褲，腳上穿的是木屐。一部分赤足，他們來到中心，便好像返回學校一樣，由導師教導他們讀書寫字。還有一個有趣的片段，群益會各中心的小童在灣仔修頓球場舉行運動會。玩二人三足、麻包裝枕跳；到了頒獎時，看到頒獎台上堆滿麵包，獎品正是這些可吃下去肚裏的東西，領獎的兒童看來十分喜歡這些獎品。

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是小童群益會前任委員羅怡基博士說的，在五十年代，他任校長的學校（聖保羅男女中學）辦有兒童會，參加的是附近貧苦人家的子女。兒童會也經常派發救濟品。有一次，救濟品中夾有芝士一塊，下一次兒童來參加活動時，聞到他們身上多有騷味。查問之下，才知芝士看似當日窮苦人家慣用的「勞工肥皂」，家人不知芝士為何物，只當是肥皂使用。可見當日物資何等的匱乏。

為什麼五十年代香港這麼多窮人？答案十分簡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五十年代初，短短六年間，香港的人口從六十萬驟增至二百二十萬，其中包括一百多萬從大陸（今稱內地）逃難來港的難民。這一百多萬難民，除少數過去從政或從商還有點金錢外，其餘皆身無長物，可說一窮二白。難民中有些是知識份子，部分擁有技能，但也有從農村來的；他們的背景雖有異，但遭遇同一命運，就是只得在香港掙扎求存，有兩餐溫飽已非常幸運。

難民原先只想在香港暫住，他們真的是為了避難才來香港，只待大陸情況穩定下來，他們便會回去。我家有六個小孩子，其實在廣州還有我們的大哥和大姐，他們年紀較長，可以照顧自己，父母沒有帶他們來香港，暫時把他們寄放在親戚家裏。與我家情況相同的難民，看來十分普遍。到了今天，在港七、八十歲的長者，很多在內地都有家人，一些在過去成功的申請內地家人來港團聚，但不少仍與家人分隔兩地。

五十年代的香港政府沒有安置難民的政策，只望中國盡快恢復秩序，難民便可離開返回大陸，所以不會為他們的前途作長遠打算。情願看着難民遍佈山頭和騎樓底蓋搭木屋，政府也袖手不理，唯一做的是確保環境衛生，按時「洗太平地」，免得疫症爆發。

小時候吃的和玩的

在五十年代，不是每家都有溫飽。我家共有八口，每人每餐兩碗飯，單是白米。母親每個星期都要到米舖買米。餸菜餐餐都是肉片炒菜、蒸豆腐和淡水魚等。每年有兩、三次割雞煮鴨，是小孩子過時過節的期待。父母不會為孩子慶祝生日，最多是有雞蛋一隻。因孩童時沒有慶祝生日，到了今天我也沒有這個習慣。

對今天的小孩子來說，家中沒有雪櫃（冰箱）簡直是匪夷所思，但在五十年代，小孩子只知酒樓食肆設有冷藏裝置，以便保存食物新鮮，但普通大眾要在家裏有這樣的設備，真要好好儲蓄，還

要計算每月的電費支出。這樣，家裏的食物豈不容易發霉或變壞？解決方法，就是每天都到市場買菜和肉，分量只夠一天食用，盡量避免「厨餘」；家裏真的要儲備糧食，一般只有罐頭和能夠保留較長時間的醃製食品，雞蛋也是家庭常備的。

到了炎熱夏日，雜貨店售賣的汽水、雪條（冰條）和雪糕（冰淇淋）最受兒童歡迎，那時「雪糕車」十分流行，修頓球場不同的出入口都可見到「雪糕車」。不過，汽水和雪糕（蓮花杯）的售價並不便宜，可樂三毫子一瓶，屈臣士汽水是兩毫子，還有綠寶橙汁，而玉泉忌廉汽水最貴，售三毫半。所以，不用大人吩咐，小孩也不會經常喝汽水。哪有這麼多零用錢？

若要在家裏做冰條和嗜喱，當時還有別的辦法，就是到冰店買冰塊回家，自製冰條和嗜喱。灣仔街市仍未拆卸前，入門右邊有售賣冰塊的批發店，小時候我隨哥哥和姐姐到冰店，用布袋把一塊如兩本往日電話簿大小的冰塊拿回家，然後在上面放置西瓜，一兩個小時便十分清涼。有時買嗜喱粉回來，按分量沖成水狀，倒入做冰條的容器，放在冰上一會兒便成為冰棒。

談到吃，灣仔最負盛名而歷史悠久的，有雙喜大茶樓，龍門大酒樓（後改名為龍園，幾年前才拆卸），和鵝頸橋附近的大三元酒樓，但家人很少外出吃飯，記不起小時候有沒有去過這三間酒樓。灣仔還有英京酒樓，是高級食肆，我是到出來工作賺錢後才有機會幫襯。修頓球場現在看台的位置，曾有一間名為經濟食堂的茶樓，

價錢十分經濟，幾毫子可飽吃一餐，爺爺五十年代初在港時，曾帶我去光顧，雖只有大包一個，也不錯了。我最熟悉的西餐店是在柯布建道的澳洲餐廳，這是父親與朋友傾談見面的地方，有時拿回來牛油餐飽給我們分吃，已覺非常珍貴。我小時常吃的麵包，是在附近餅店買的車輪包，一座子四片，我小學時步行返校，從船街沿皇后大道東到跑馬地景光街，未到校門已把這四片車輪包吃光。

小時沒有玩具，連今天太原街買到的懷舊玩具，如鐵皮車，我一件也沒有。我經常去玩耍的地方是修頓球場，那裏有老人、成年人、小童，男男女女不同的組合，有踢足球的、打籃球的、跳橡根繩的……林林總總，也有晚上坐上看台乘涼的，早上在那裏讀報抽煙的。那時修頓球場還是沙地，踢波的很容易受傷。我們小孩子，只會在球場邊玩「打波子」、「拍公仔紙」，有時大的欺負小的，打架是平常事。有一次，我和幾個小孩在「打波子」，有兩三個年紀比我們大的，走過來一手拿走我們的波子，還兇兇的威嚇我們，我們只好就範，警察不會理會這些小事。

我們要玩，還可到灣仔人稱三馬路的寶雲道。我可以從舊日的灣仔郵局（今環境資源中心）經過聖雅各福群會，循灣仔峽道上寶雲道，但這條路比較陡。我多從大佛口的萬茂里轉寶雲徑到寶雲道。寶雲道可望見灣仔全景，連我家住的樓宇也清楚可見。寶雲道沿途種有不少竹，小孩子摘竹枝做竹筒，捉兩、三隻蟋蟀放進筒內，大人會用蟋蟀互鬥作賭博。近灣仔峽道那邊有水壩，下雨時儲滿水，小時候可在池內浸水游泳，後來聞說有小孩溺斃，水池填了

做公園。

因我家住在灣仔，步行不到半小時即可到達跑馬地馬場。今天馬場的設施大有改進，但沒有改變的是馬場中間的大片草地。五、六十年代時間，馬場的草地開放給公眾使用，即使到了賽馬日（早期每隔兩個星期才賽馬一次，總是安排在星期六下午），我們也可到草地遊玩。

我從小步行往跑馬地上學，一早經過養和醫院對面馬路，可以隔着還未覆蓋的溝渠看馬匹晨操，很多時天還沒有亮起來。到了賽馬日，因為不用上課，常到馬場中間的草地踢球，你追我逐的玩個下午。賽馬在五十年代還未有電動人開機，馬匹齊齊排列在垂下的繩網前，待司令員發號，工作人員把繩網拉起，馬匹即起步出發，奔向會員席前的終點。我們看着馬匹出閘，也轉過身來跑向終點，當然馬匹走的比我們快。

兒時的日子就是這樣過去了，吃的和玩的都非常簡單，「廚餘」在那時根本不是一個問題。食物僅足飽肚，就算有剩餘也不會浪費。玩的都是現成的，玩具是奢侈品，但只要有兩、三個孩子走在一起，無論是男的或女的，哪愁沒有好玩的東西：一條繩，一個像似皮球的物體，小童都可玩過飽。況且，居住環境狹窄，窮人家又沒有錢給孩子買玩具，小孩子只好動腦筋，看見什麼都拿來玩，那時街上很少車輛，我們隨處走動，個個都是「街童」。

結束小時的吃和玩，我還要說一個故事：在我十歲的時候，在天台玩耍時認識了兩兄弟，他們年紀相差兩、三年。他們並不住在我家附近的幾棟樓，應是住在山邊窄巷裏的木屋。兩兄弟看來沒有上學，我不清楚他們的父母做什麼，但一定十分窮，熱天時他們沒有穿上衣，冬天時穿的衣服非常破舊。兩兄弟的皮膚黝黑，手腳多處有污垢，相信好幾天沒有沖涼。有一次，我拿着麵包吃，他們用飢餓的眼神望着我，那種空空洞洞的神情，至今仍深深的留在我的腦海裏。

五十年代灣仔面貌的補充

說起灣仔，我還有要補充的。灣仔的面積並不大，從今天的金鐘到維多利亞公園，主要的道路是軒尼詩道和皇后大道東，高士威道是五十年代的海岸線。灣仔不像中區，是一般市民作息的地方。正是這樣，灣仔可說是香港島和九龍的縮影，新界當然是另一回事。

今天有一股「集體回憶」的潮流，我發覺不少對灣仔舊日面貌的記述，與我兒時的並不相同，別人所述多是好的一面，我看的卻多是醜的一面，這樣也好，可以互相補充。我確實有記憶的，是從1953年開始，我入讀小學的一年，直到1959年我小學畢業。1960年，我家從修頓球場的莊士頓道搬到銅鑼灣駱克道，即今崇光百貨公司附近。有說崇光一帶屬銅鑼灣，不是灣仔。中學時，我每天乘坐電車經過灣仔到中環舊中國銀行下車，然後步行上花園道到位於

麥當奴道的中學，所以活動範圍再不在修頓球場一帶，對灣仔的記憶不像以前般深刻。

留在我記憶中的灣仔，並不是今天說的這麼充滿溫馨和人情味的社區。我兒時的住屋狀況和周圍的環境，以上已有描述，一些細節其實我也記不得這麼清楚。小學畢業時，我只是一個年齡十二歲的小孩子，社會裏發生的事，根本談不上有認識。我唯一知道的是，住在灣仔的居民，窮人佔了絕大多數，樓宇都是破破爛爛，人人為了「搵食」，工作辛苦的程度，只能用「金睛火眼」來形容。

小學時，我早上七時便出門，首先經過修頓球場外圍的馬路，常看見一大群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在那裏聚集，當看見搬運或裝修的判頭到來，即一哄而上，爭着要求判頭僱用。這樣那天的工作便有着落。若當天判頭來的不多，或他們只挑選年輕力壯的工人，年紀較長的便沒有工作了，只好明天再來碰運氣。有一次，判頭揀了幾個屬意的工人便調頭走，離開時看見有熟悉的工人走來，原先的幾個不再要了，於是工人間引起爭執，我還看見有人出手打人，互不相讓。從小開始，在我腦海裏，已認識到「搵食」是艱難的，常常你爭我奪，弱者為強者欺負。

灣仔隨處都有非法活動，只要到灣仔道、春園街、太原街一帶走走，光天化日下不難看見途人在聚賭，尤其是過年那幾天，總有兩三檔「魚、蝦、蟹」，「賭大小」、「廿一點」等，麻雀賭博更隨處可見。灣仔有沒有娼妓（性工作者）？應該有的，春園街是昔日

著名煙花問柳之地，但我年紀小，完全沒有印象。灣仔有數不清的「道友」，連誰人在販毒，我也看見過幾次。

修頓球場以北的幾條街道，包括軒尼詩道，駱克道和譚菲道，我知道那裏有酒吧。美軍在芬域街碼頭上岸後，蜂擁到灣仔的酒吧花天酒地。大人吩咐我們不要到酒吧附近，免得遇上醉酒鬧事的士兵。到了六十年代，我家搬到駱克道尾，酒吧沒有了，但有很多色情「架步」，窗口貼上有顏色的粉彩紙，一看便是經營不正當的事業。

這樣的灣仔，有什麼值得我留戀？說實在的，我對灣仔沒有什麼歡樂的回憶。灣仔有好幾間戲院，最近我家的一間是香港戲院（在今合和中心），是戰前建成的，陳舊得十分可怕：座椅是木造的，常覺得有木蚤在咬，也不時聞到臭味，我懷疑有人看電影時在黑暗中「小便」，工作人員也懶得清潔。香港戲院後來改建為香港大舞台，經常上演粵劇，但不久拆卸為現今的合和中心。

除香港戲院外，小時候去過看電影的戲院，有駱克道的環球戲院和馬師道的國民戲院。東方戲院（現今的大有商場）放影的是西片，票價較昂貴，小時候我好像沒有去過。灣仔還有洪聖古廟，今天列為古蹟。我小時候經過時，總覺得陰深恐怖，連探頭入內看也不敢。洪聖古廟向東走，再過兩三個街口，有小巷通往山邊，從外可看到一間細小的廟宇，我從來沒有走進小巷，也不知道廟宇叫什麼名字。

五十年代，香港殯儀館仍在灣仔，在愛靜道對開的灣仔道，所以皇后大道東到摩利臣山道有幾間賣棺廨的店舖（俗稱棺材舖）。店舖內常擺放幾具棺廨，中式西式都齊備，店裏的員工多穿唐裝，白色黑色都有，我經過時總覺得有點不安，心裏十分害怕，只好急急的走過。

我較有好印象的，是附近的兩間書店：三多軒和大方書局。三多軒售賣毛筆、紙張、墨汁；大方書局售賣教科書，也有新穎的文具，走珠筆（原子筆）是新產品，最受小孩子歡迎。

以上是我對五十年代灣仔的記憶。在我升讀中學以前（那是1959年），我的活動範圍離不開灣仔，不要說新界，連九龍我也只去過幾次。就家在灣仔，我走來走去就只有修頓球場和小學所在地跑馬地一帶。我不能說小時候看見的，就是香港貧窮的全部，或許和我同輩而住在其他地區的人，可以補充我記述的不足，讓今天的年輕人對五十年代的艱難日子有較完整的認識。

我渡過的小學階段

這裏，我想補述一下自己小學讀書的情況。我是在1953年入讀東華三院第三小學校，地址在跑馬地景光街（現今是中元書院的所在地）。到我升讀六年級時，學校搬到新址，即今位於皇后大道東的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入讀小學前，我曾在盧押道的「中國兒童書院」讀了兩年幼稚園，因當時只有五、六歲，沒有什麼記憶，

半晝的時間就只有認字和遊戲。

那時入讀小學並不容易，據父親日後對我說，要為我找一個小學學位要通過「人事」。父親從廣州來港後，在米業商會見得一份秘書的工作，職位上認識了一些做生意的，有他們的介紹，我們六兄弟姊妹才可入讀東華三院開設的小學。

我入讀的東華三院第三小學校，全校只有三個課室，加上教員室，廁所和小小的操場，進入校門即一眼看齊。因學校只有三個課室，所以我有一年讀上午班，有一年讀下午班，老師也只有那七、八位。從小三開始教我英文的，是一位姓梁的老師，算是最認真的，其他只當教書是一份工作，不太理會學生；相反，間中有從師範學院來的實習老師，上課前準備充足，主動的與學生接觸，同學們都很喜歡他們。不像班主任，動不動用界尺打學生手板。

我讀書的學校雖處跑馬地，但學生多不在區內居住，來自灣仔的最多，其次是銅鑼灣、北角。到了放學的時候，我們聯群結隊的到跑馬地電車總站乘搭電車。我們二、三十個小學生，坐在電車上層，你一句，我一句，吵吵鬧鬧的，這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有一次，學校派了救濟品，我們拿着重甸甸的紙皮箱走向電車總站，我個子較小，走得慢，落在最後，有一位黎姓的同學，長得比我高大，較我有力氣，他先把自己的一箱搬上電車，然後轉過頭來幫我一起抬，我十分感謝他。大人為了「溫食」或有機心，小孩仍留有純真。

東華三院屬慈善組織，辦學的宗旨是讓窮家子弟有讀書的機會。學校原稱「義學」，學生不用繳交「堂費」（今天稱雜費），書簿和文具時有派發。學生雖不用繳費，但有些學生，家境實在太窮，中途輟學時有發生，同學間傳回來的消息是：他們留在家裏照顧小弟妹，或必須外出工作幫家。我有一位同學，他家在灣仔太原街，我們常常一起上學，小五時突然不見他上學，後來在勿地臣街的一間車房門口碰到他，他看見我時，表現有點尷尬，說在車房當學徒有幾個月了，沒有機會讀書，我也不好意思再問他，說聲再見便分開。

我六年的小學生活，就是這樣平淡的過去，也有兩、三位同學比較熟絡，但小學過去，各散東西，升讀中學的不多。那時，教育署仍舉辦小學會考，一年後轉為升中試。我們全班有三、四十位同學，但不是全部學生可以參加小學會考試，只有成績較好的五、六名，學校才派他們去參加，而最終獲得派位升讀中學的，我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餘下來的只好自己找學校，或邊工作邊讀書。同學們各奔前程，小學畢業後很少聯絡。1959年，我小學畢業，獲派往現在轉為直資的聖保羅男女中學（如當日已轉為直資，相信沒有機會入讀），而我家住了十多年的灣仔唐樓，業主要拆卸，我家搬去駱克道尾、今天崇光附近的另一座唐樓（現今仍存在）。因此，到五十年代終結，我不但離開住了十一年的莊士頓道唐樓（我一歲時父母帶我們來香港），也離開了讀了六年的東華三院第三小學。

在我小學的階段，從同學口中得知的，盡是貧窮家庭的故事。

我有一位同學，家裏什麼事情都要他做，他根本沒有時間做功課，但老師不體諒，不交功課就要罰他抄寫，愈罰愈無法完成，最後索性不返學。家長一般忙於「搵食」，一些有不良嗜好的，常拿子女出氣，少罵幾句便算是好父母。同學間不是全無歡樂的時候，但家庭太多不愉快的事。我看見、聽到的，盡是艱難和辛酸。在我的印象裏，五十年代的香港，瀰漫在每一角落的是：大人不開心，小童不快樂。

舊的好還是新的好？

今天懷舊之風非常熾烈。現在提起舊的事物，總覺得新不如舊。舊的真是好嗎？灣仔是戰後窮人聚居的地方，一如現在的深水埗，灣仔仍留有幾棟舊建築物，如石水渠街的「藍屋」，我也贊成保留，但不要變成另一個「和昌大押」。至於當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留在我記憶裏的，也不是《歲月神偷》電影所描述的；相反，我看見的是人性尊嚴遭受踐踏：艱苦辛勤工作的市民，賺來的錢不夠養家；窮人為求溫飽，女的不惜出賣色相，男的鋌而走險，或為毒品折磨。

五十年代也是爾虞我詐的年代：你欺騙我，我欺騙你，親友間難有真誠可言。執法人員也多目無法紀，我親眼看見警察在街上向小販要錢，市民不會覺得貪污是不應該的，有權力的人不收「黑錢」才怪呢！在我的印象中，五十年代是沒有希望和機會的年代：逃難來港的難民，想着早日返回家鄉與親人團聚，並不肯定自己會在香

港長久住下去。香港戰後短短五、六年間多了一百萬難民，部分長期在香港找不到工作，捱不下去決定返回大陸，但大部分怎樣辛苦也只得留下來，見步行步。

難民對香港很難建立感情，當時的香港政府也不想難民長久留下來。我後來研究香港的福利發展史，查看政府在五十年代期間的通告，發現政府曾指世界各地救護組織正向難民發放大量救濟物資，所以政府不會訂立長遠的福利政策，免得吸引更多大陸難民逃來香港。政府的態度是讓難民自生自滅，即使1953年聖誕節前夕石硤尾木屋區的一場大火，造成五萬多災民無家可歸，政府的對策是在附近蓋搭臨時建築物，讓災民有瓦遮頭，其後在災場原地興建七層高的徙置大廈，也是暫時安置災民。沒有想到災民一住就是四、五十年。

到五十年代後期，內地的政局並沒有改善，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叫港人看得驚心動魄，原想返回家鄉的難民都死心了。政府也知道情況繼續下去，如果什麼都不做，社會有一天會失控。1956年在西九龍發生的動亂，雖說起因是國共之間的紛爭，但如果沒有這麼多走投無路的窮人，相信情況不會一發不可收拾，社會也不會亂起來。不過，政府要解決問題，不是今天說扶貧這麼簡單。1958年政府發表的年報，說到政府財政能力有限，只能在最迫切的民生四方面加強工作：增建校舍，為兒童提供學位；興建公共房屋，安置「無瓦遮頭」(without a shelter)的市民；加強公共衛生設施，防範疫症爆發；確保市民有清潔的食水。

以上就是我對五十年代貧窮面貌的描述，其中都是悲慘的故事，如果太灰暗，只怨自己身處貧窮家庭，看見的盡是悲傷的面孔，咀咒的說話、無奈的眼神。如果我們把生活在香港這一邊的中國人（那時沒有香港人一詞），與生活在深圳河另一邊的中國人比較，五十年代的香港中國人還是幸福的，最少免了政治鬥爭。我小時候常聽的一句話：「鬼叫你窮，頂硬上」。大人也常說要「捱世界」，可見那時的世界不是讓人去享受的，要捱就得吃苦，唯一盼望是捱過去後，未來的日子比現在好一些。五十年代的香港居民，總算這樣艱苦地捱過去了，六十年代帶來的，又是怎樣的日子？

六十年代：捉襟見肘的貧窮

窮人享用的社會服務

五十年代成為過去，香港的窮人並沒有消失，貧窮只是隨着大環境的轉變而改了面貌。首先，鄰近的大陸所出現的連場政治運動，使從大陸來港的難民明白到，返回家鄉的機會已微乎其微，尤其是 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繼而「人民公社」在神州大地遍地開花，大陸不再是他們過去認識的地方，就算冒險回去，自己可以捱得過令人心驚膽顫的鬥爭嗎？最後，無論如何不情願，他們也只好在香港這叢兩小島安頓下來。

當我還在小學念書的時候，母親經常帶我返回廣州探親，同時給他們帶去那時大陸極之欠缺的物資，如衣物和副食品。小時候印象中的廣州，環境並不比我家所住的地方惡劣。雖然廣州親人居住的房屋一樣殘舊，門是用木造的橫門，一如新界圍村的樣式，進門後有寬敞的天井，兩旁有好幾間房間，睡床放在房中央，上面吊有蚊帳。我記憶中的廣州，馬路兩旁植有大樹，天熱時有路人在樹下

乘涼，那時路上很少車輛，有專人指揮交通，他們是公安還是街坊組織的人，我不知道，也不知如何分辨。

逃難來港的難民既知不能返回家鄉，留港居住是他們必須接受的事實。從此，他們對香港的心態改變了，不再夢想他們總會有一天返回大陸。香港雖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但由英國人管治香港，對決定留下的難民來說，香港也算是一個可以棲身的地方。香港政府推行的政策也在六十年代出現了變化。以上提到1958年出版的年報中，政府只承諾為市民提供基礎設施，但現在要多做一點事了：除徙置寮屋居民外，政府增設廉租屋，讓收入低微的市民申請入住；天台學校是五十年代末開始的，設備異常簡陋，但低下階層子女總算有人學讀書的機會。

進入六十年代，一般市民不再窮得這麼要命：徙置大廈的設施十分簡陋，但改善是有的，如廁所轉為兩個單位共用一個，但沖涼仍要到走廊盡頭的沖涼格，家長不放心女兒沖涼時被人偷窺，只好守在沖涼格外。要獲得徙置並不容易，窮人要先在山邊或天台蓋搭的木屋居住一段長時間，等待徙置事務署的人員來登記，再過七、八年才可編配單位。有些等不了，人為的製造火警，木屋燒了，政府被迫安置災民。

政府當時正準備推行免費強迫教育，但每個家庭都有三、四個小孩子，政府難於短期內興建足夠校舍，天台小學應運而生，當作

臨時措施。到1971年，政府推行六年強迫免費教育，天台學校仍未完全消失。強迫教育推行前，童工仍非常普遍，香港在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發展輕工業，需要大量工廠工人，茶樓食肆也多僱用小童賣點心或洗碗碟。

醫療方面，政府在各區設有診所，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居民稱這些為「健康院」。我小時生病，家人多帶我到附近看中醫，通常是感冒和腸胃不適等小病，休息一兩天便好了，若然發高燒便要看西醫，多是帶我到修頓球場側的「貝夫人健康院」。打針連吃藥每次收費一元；那個時代，每份報紙是一毫子，麵包兩個是一毫半，一元不算小數了。升上中學後，衛生署透過學校辦有學童保健服務，學生每年繳交二、三十元（正確數字記不起了），有病時可看指定的西醫。我也有參加，但感覺並不好，醫生不太重視我們這些病人，常要等候很長時間，待其他病人走了，才叫我們入醫生房，問幾句便開藥。

替補老師的經驗

對於天台學校，我也有些親身的經驗。我是1966年入讀香港大學，那時大學的暑假，從五月到九月，整整四個月的時間。有一年的暑假，我向教育署申請做「替補老師」(supply teacher)，即是遇上正規老師放產假或因其他原因缺課時，替補老師便去頂替。申請後，教育署派我從五月中到七月學期完結前，在官塘（今稱觀塘）佐頓谷一間小學當替補老師；因我已預科畢業，每月薪金三百

多元，等同師範學院的畢業生，薪金十分不錯。到官塘佐頓谷做小學老師，首先從銅鑼灣乘車到北角碼頭，然後坐船到紅磡碼頭，再乘車到牛頭角，再步行到佐頓谷，一程最少要花個半鐘頭，那時仍未建成海底隧道，去哪裏都要坐車坐船又坐車。

佐頓谷的小學不是天台學校，用的是徙置大廈的最底層，有八、九個課室，還設有音樂和美術等專用的教室，設備也算整全。學生小林時，可利用徙置大廈中間的天井及大廈的天台作自由活動。學生來自佐頓谷周圍的徙置大廈，部分更住在學校樓上的單位，所以學校吩咐他們小林時不可回家。

因為我是替補老師，學校不緊張我是否懂教書，管理好課堂秩序就是了。也因為到了學期末，我要教的課程並不多，主要是幫助學生溫習，準備他們應付考試。於是，除講課外，空餘時間就多問學生幾句，了解多些他們家裏的情況。我教的其中一班是六年級，我很想知道他們小學畢業後有什麼打算。

學生住在佐頓谷和遠一點的牛頭角徙置大廈，屬於基層家庭的子女。我不會說他們的家庭都是貧窮的，因當時搵工做並不困難，附近的新蒲崗就有大量工廠，經常有空缺。做父親的，當然要外出工作，父母皆工作的亦非常普遍，而母親就算要留在家裏照顧小孩，也可在家裏做些外判工作賺錢，單靠一個人搵食並不夠全家開支。有一次，我晚上到一個學生家庭做家訪，細小的公屋單位，除住人外，儼如小型的山寨廠，兄弟姊妹幾個連同母親在加工，都是

從工廠取回來的膠花和手套。

我接觸的學生是否聰明？學業成績是否優異？我作為替補老師，也只有兩個月的時間，這並非我所能知道的。我注意到的是，學生上課時，常常不能集中精神，也很容易疲倦；現在事情過了四十多年，記不起當時有沒有問學生箇中的原因，記憶中好像他們對我說：平日要幫手做家務，照顧弟妹，或穿膠花至深夜，所以沒有時間溫習功課，有時趕工，晚上很遲才上床睡覺。

我也有幫家裏做事的經驗。父親在商會做秘書時，賺的錢並不多，無法養活一家人，於是利用晚上時間寫些東西，投稿到報館，目的是多賺點錢。我父親的文學根底不錯，又喜歡看章回小說，寫的是當時大行其道的武俠小說，刊登在武俠雜誌上，後來集結成單行本，其中有所、三部還拍過電影。

父親來港後，猶如其他大陸難民，也染上賭博的習慣，尤其是賽馬。每次都落注。後來，武俠雜誌的老闆開辦報紙，於是邀請父親主持馬經版。到六十年代初，父親辭去商會的秘書工作，全職寫小說和馬經，刊登在那時幾張銷量較好的報紙上。這樣，我們幾兄弟姊妹，放學後便得幫父親把稿件送到報館。當日報館多在中上環或北角，坐電車來回要兩個多小時，對我們的學業不多不少也有些影響。

話扯遠了。當我幫手送稿的時候，我已經入讀中學，但佐頓谷的小學生仍年幼，體力過分透支，難免影響成長，而研究顯示，窮

窮家子弟要加倍努力才可有好成績。今天，傳媒不時訪問各行各業的成功人物，他們多說自己出身貧窮家庭，住的是徙置大廈，讀的是天台小學，總之，並非含着銀匙子出世。這些報道，用意在鼓勵年輕人不要氣餒，只要努力，窮家子弟也有出頭日。這樣的報道沒有錯，但接受訪問的是特殊例子，普遍現象並不是這樣。我小學畢業時，同班同學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獲派中學學位，所以我的經歷沒有代表性。無法升讀中學的才是當日一般小童的遭遇。

貧窮家庭的子女

回說六十年代貧窮家庭子女的情況，他們較五十年代的兒童幸福，多有人學讀書的機會，大部分可以完成小學；他們的父母除非患病，找一份工作不成問題。但六十年代的香港，經濟發展剛在起步階段，一般家庭的生活仍十分艱苦，賺的錢僅足糊口；住的問題尤其嚴峻，正在輪待公屋編配的，不是要忍受唐樓的惡劣環境，就是要在山邊或天台蓋搭木屋，隨時遭遇火災和山泥傾瀉的威脅。所以，就算溫飽不成問題，赤貧在六十年代仍未完全消失。

1969年，我大學文學院畢業，那時兄妹都出來工作，家裏只有我一人仍在讀書。我不想教書，也不想入政府做文職工作，於是轉去修讀一年制的社會工作文憑，因為發覺自己很想多認識社會發生的事。社工訓練包括實地學習，學期開始後被派到灣仔小童群益會的兒童中心做實習。六十年代期間，灣仔軒尼詩道和駱克道一帶的舊樓仍未拆卸，最上層的天台有不少搭建木屋。兒童中心的設備

頗簡陋：一張乒乓球桌、幾台康樂棋、跳繩和小型足球等，但對居住在狹窄房間的小孩來說，這些設備已有很大吸引力。兒童中心隔鄰還有圖書室，除一般兒童讀物外，還有漫畫書（公仔書）和《兒童樂園》等刊物，很受小童歡迎。

實習期內，不時要做家訪，多了解兒童在家裏的情況，特別是過了一段時間沒有來參加活動的孩子，看看他們有什麼問題。有一次，我探訪的女孩住在軒尼詩道一棟舊樓的天台木屋，對面是修頓球場。據中心資料所知，探訪的女孩是家中長女，約十三、四歲，小學畢業後便沒有讀書，留在家裏照顧三個弟妹。事隔四十多年，我仍記得家訪時看到的：她家住的天台木屋，全屋只有一百多平方呎，放兩鋪床、一個衣櫃、一張可開合的枱和幾張摺椅，還有收音機和電風扇。我和大女談了半個小時，她很懂事，說父母都外出工作，早出晚歸，家務由她負責，所以不一定有時間到兒童中心參加活動。我問她做家務是否很辛苦，她沒有直接答我，說父母要賺錢養活他們，有空父母還會帶他們去玩。她說話十分世故，不像十三、四歲的小孩。

類似這女孩的家庭，六十年代時十分普遍，我很難說他們生活貧困，因大人有工開，基本生活過得去，不用依賴政府和福利機構的協助，家裏還可設置各種電器用品。但做父母的大人，日晡夜晡，無法負起做父母的責任，要靠年長的孩子照顧小的，令他們失去求學的機會。這類家庭，從今天的角度看，應是貧窮了，但當日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談起小童群益會，我還有另一個經驗，可反映六十年代貧窮家庭子女的情況。我就讀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羅怡基博士除熱心教育工作外，還參與不少公益事業，包括在校內為低下階層小孩開辦兒童識字班。兒童識字班由小童群益會負責組織和招募學生，每星期幾次借用中學的課室開班。顧名思義，兒童識字班並不單是為兒童安排各種遊戲活動，還教他們 3R，即閱讀（reading）、寫作（writing）、算術（arithmetic）。

香港是到了 1971 年才推行六年免費教育，窮家子女在六十年代不一定上學，沒有書讀的，參加兒童識字班是他們另一學習的機會，免得自己成為文盲。識字班的上課時間安排在我們放學後，從下午四時到六時，兩個鐘頭時間，兒童不但讀書，還可打乒乓球、跳繩、踢毽等。他們被分到各班學習中文、英文和算術，負責帶領他們遊戲和讀書的，都是在學校就讀的學生，他們自願參加，當時不會說自己做義工，只盼幫助沒有讀書機會的孩子。

我記不起是否有參加教導這些識字班的兒童，就是有，自己也不是積極份子。有一次，我遲了離開學校，碰到幾個識字班的兒童，與他們一起從學校所在魁麥當奴道返回路克道的家。這幾位識字班的兒童住在灣仔，就如我小學時住在莊士敦道的唐樓一樣，但我較他們幸福，小學時可以上學。他們得要靠識字班才可吸收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識。今天想起來，我應該感恩，也感謝羅怡基校長在校內開設兒童識字班，讓窮家子女不致成為文盲，而參加教導學童的中學生也明白到，不是每個孩子都是這麼幸運的。

六十年代家庭面貌的轉變

六十年代，我有另一個認識香港貧窮面貌的機會。大學第一年的暑假，做完替補老師後，我還做了三個月的調查訪問員。這個調查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是中大成立後最大型的社會研究計劃，名為「香港城市家庭生活調查」(Hong Kong Urban Family Life Survey)。1977年我加入中大任職講師，才知這項十年前進行的研究，是中文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合作進行，規模之大是香港過去沒有的，中大希望藉此建立自己社會學方面的學術地位。

可惜的是，調查在1967年期間進行，正是內地爆發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香港也受到牽連，動亂在全港各區出現，政府要出動英軍鎮壓。我也第一次明白戒嚴是什麼一回事。香港大學通常在五月安排考試，下午一場從二時到五時。有一次，我們正在陸怡堂專心回答試卷問題，但還沒有到四點鐘，主考教授說收到通知，政府將於六時開始戒嚴，看令我們即時回家，也不用擔心考試成績，學校自有妥善安排。那時學生關心的，並不是考試是否及格，而是車船何時停駛停航，自己能否平安回家，香港那時實在太亂了。

回來說說我做訪問員的經驗。我住在港島區，所以訪問的住戶也多在港島。六十年代開始，港島出現了一些新建洋樓，多是單棟式的。那時私人屋邨還未盛行。新樓多在中、上環和半山區，從銅鑼灣到北角的英皇道，兩旁都起了不少十層八層高的樓宇。洋樓的特點是有升降機，住戶不用爬樓梯。新樓是要迎合一群收入較穩

定人士的住屋需要，他們有些是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工程師等，一些是官津學校的老師，或在政府任職的中級公務員，或從事小本生意的商人，賺了錢也想住得好一些，以上人士都不會合資格入住公共房屋。

我訪問的家庭有私人樓宇的住戶，也有住在山邊木屋的居民。現在勵德邨所在地，以前是蓮花宮和馬山木屋區，過了北角，筲箕灣到柴灣一帶，山邊也遍佈密密麻麻的木屋。我在1967年的暑假進行訪問，正值暴亂的高峰期。現在想起來，也覺得十分危險，但那時並不害怕，可能年齡還輕，愈危險的事愈想去做。做訪問員雖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但每天訪問三、四戶人家，增加了我不少見識，對社會也好像明白多了一些。

有一次，我被派往大坑山邊木屋做訪問，按地址找到要訪問的住戶後，我看到屋內有四名彪形大漢在搓麻將。我心裏有點恐懼，只好自我安慰，又不是做壞事，不接受訪問就是了。於是道明來意，其中一位較友善的對我說：「見你是大學來的，就幫你一次忙。問卷開始的幾條問題，是關於住戶的基本資料，當我問到屋內住了多少人時，其中一位笑着說：「這裏住了七億同胞！」（當時中國有七億人口）。我看情勢不妙，多謝一聲便走了，問卷未能完成。

我訪問的木屋住戶，總數有二、三十戶，全屬低下階層市民，多是三、四十歲的夫婦和他們的年幼子女。這些住在山邊木屋的貧窮家庭，猶如我小時候所經歷和看見的。一般物質生活十分匱乏，

夫婦兩人都出來工作，收入僅夠日常開支，有剩餘的就拿來購買家具和必需的電器，如電風扇、收音機。不過，六十年代看見的貧窮家庭，與五十年代的比較，情況並不一樣。

首先，六十年代的貧窮家庭，戶主已非戰後來港的難民，他們多是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偷渡來港，他們曾經經歷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多場政治運動，也嘗過「大躍進」及後來的「大饑荒」，是冒死偷渡來港的。包括1962年「大逃亡潮」來港的難民。他們就算有工作，兩餐沒有問題，但要找到一個安樂窩，是天大困難，唯一辦法是在山邊蓋搭木屋。據我了解，當時他們並非自己蓋搭木屋，而是從別人那裏租來的，原先住在木屋的居民又去了哪裏？我當時沒有想得這麼多。後來對貧窮問題多了認識，學懂社會流動的道理，我的結論是：原先住在山邊木屋的難民，他們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經濟條件逐漸改善，他們有些成功申請入住徙置大廈，更好一點的自己租住私人樓宇。於是，他們騰出來的木屋，自有人代他們轉讓給新近偷渡來港的難民，木屋轉讓當時是十分普遍，「頂手費」可以是一筆為數不少的錢。有些人租住木屋，其實目的並不在居住，而是等待有人縱火把木屋燒掉，自己便有編配入住公共房屋的權利。

在「香港城市家庭生活調查」訪問的住戶中，我也遇到中、上階層的家庭，有幾個原先也是窮的，但經過幾番努力，終也成為小康之家。其中有一戶住在港島大坑道，戶主年約四十多歲，他說他們三兄弟於五十年代來港，當時二十剛出頭，父母仍在鄉下。他們

沒有特殊技能，只要有人僱用，除了犯法的事，什麼都去做，生活十分艱苦。他自己做五金學徒，食住都在工廠裏，足足有六年的時間，後來想想，所謂「工字不出頭」，於是找其他兩位兄弟商量，合作開間五金「山寨廠」，一起做老闆。那時候，三兄弟都已成家立室，負擔不輕，但各自想辦法，最終籌足資金開廠。過了幾年，「山寨廠」生意不錯，「山寨廠」變成有幾十個工人的工廠，不再做加工而有自己的訂單。後來一間廠變成兩間、三間。由「山寨廠」到今天，前後不過十年的時間。言談間，他表現十分自豪，雖然他講的發跡故事，已超越了訪問的範圍，但只要他想講，我也願意聽。

以上的故事，有點傳奇，但香港很多大企業家，都是這樣「發」起來的。有錢人的發跡史，機緣際遇不一而定，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我想是當時的家庭制度，和家人間的感情，都很有傳統的特色，就如以上所提的受訪住戶，三兄弟如果不合作，一個人未必有足夠資金開廠。今天發跡的企業家，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倚賴家人的支持，但數目相信不會少。

另一受訪家庭的情況是：一對五十年代來港的夫婦，兩人同心協力，生活開始穩定下來。丈夫在商行任職會計，妻子在小學教書，兩人收入不錯，連續生了兩個孩子。小孩出世後，照料成為問題。因妻子不想留在家裏看顧小孩，於是申請婆婆從鄉下來港定居。婆婆到港後，倒也幫了不少忙，但婆婆思想守舊，對兒媳仍然任職小學十分不滿，常向兒子投訴。兒子夾在兩人中間，不敢要求

妻子辭職，也不敢送母親返回鄉下，只把事情掩下去，家裏的氣氛愈來愈沉悶。

妻子是有學識的人，並不與婆婆吵架，但夫婦二人的感情，先是冷戰，後是互不理睬。最後，妻子提出要求，婆婆必須返回大陸，自己回家照料孩子，做丈夫左右為難，不斷央求妻子多多忍耐。過了一段時間，妻子提出離婚，婆婆罵兒媳不守婦道，最後，夫婦二人協議分居，如不能復合便離婚，子女由他們兩人分別照顧。以上訪談，也不是我想知道的，只是戶主經歷家變，遇到外人願意聽，就一五一十的從頭說到尾。那時，我的感覺是，無論是窮的富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另一個發生在六十年代中的例子：一對年輕人中學畢業後，一起到英國讀預科和大學，兩人在中學時已開始拍拖，到了英國，沒有家人管，大學二年班時開始同居。他們沒有告訴家人，只說共同租了一間屋，租金各付一半。家人收到信後，心中也明白，但他們在外面，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女方家長更擔心，但為了保存女兒聲譽，要求男方家長不把事情傳出去。

數年後，這對男女畢業返回香港工作，依舊住在一起。雙方家長十分緊張，屢次勸告他們早日成婚，免得親友恥笑。但這對成年人不理會，還說婚姻制度沒有意思，他們對婚姻也沒有信心。兩方家長十分憤怒，但想不出辦法。又過了幾年，他們突然對家人說，他們不再同居了，因他們都各自找到意中人，他們要結婚。雙方家

長知道後，真是哭笑不得。

社會流動和貧富懸殊

「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 和「貧富懸殊」，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兩個社會現象。上一章敘述五十年代的貧窮面貌時，我沒有提到貧富懸殊的問題，因在我進入中學以前，即 1959 年前，我完全沒有機會接觸有錢的人。他們的子女也不會是我的同學或朋友。

我小學時就讀的東華三院第三小學，學生全都來自低下階層，家境稍好一點的，也不過和我一樣。完成小學後可以升讀中學。我父親認識的朋友中，也有兩、三位是有錢的，他們是父親任職商會的理事，父親不會邀請他們到家裏來坐，我們住的唐樓實在太擠迫。那個時候，父親與朋友見面，不會帶子女去，親戚中也沒有那幾個是有錢的。有喜慶事時，父母只帶大的孩子赴宴，所以，我從小便不習慣「應酬」。到今天也盡量避免出席「俾面派對」，就是非去不可的酒會，我只想着祝酒後快快離開。

我是到了中學階段，才知道什麼是富貴人家。我在聖保羅男女中學讀了七年書。聖保羅男女中學是傳統名校，校舍座落港島半山麥當奴道，學生不少住在麥當奴道，堅尼地道，堅道，般含道和離便臣道一帶，都是有錢人住的地方，家境富裕。我班同學有幾位來自九龍，每天要坐船過海上學，但他們的家庭環境看來也不錯，父母希望他們接受良好教育，不惜送子女到港島讀書。

和我同級同學，有幾位的家庭真的很有錢。過去，有傳媒詢問我對貧富懸殊的意見。我對記者說：我一生中乘坐遊艇出海暢玩的次數不多，最頻密的反而是在中學階段，因同學中有幾位家中有遊艇，他們十分隨和友善，雖生在大富大貴之家，卻完全沒有纨绔子弟的囂張。假期時常邀我們出海遊玩。我另有兩位同學，也是傳統富貴人家的子女，住的是半山獨立洋房，有花園和停車場，同學們很喜歡到他們家裏的空地踢小型足球。

同學這麼富有，我有自卑嗎？說完全沒有是騙人的，但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校風總算純樸，校長看重的是學生的行為表現和學業成績，盡量減少同學間因家庭背景的差異而出現的分歧，例如學生穿的校服和使用的文具，一概都有嚴格規定，學生不得穿着標奇立異，用的紙、筆、墨，校內小賣店都有供應。

因讀書時有機會與富家子弟相處，知道他們不一定因家庭富有而驕橫，所以日後在我研究的工作中，對有錢人不致有偏見。我對貧富懸殊的看法，覺得主要是制度出現問題，容讓社會財富兩極化，以至有的愈有、窮的愈窮。政府必須推行措施糾正，否則市民的怨憤愈積愈多，社會不會有安寧。其實，有錢人何罪之有？除非他們的錢財是作奸犯科得來的，否則政府不應懲罰他們。政府要做的，是避免政策偏幫有錢人，讓他們的財富以幾何級數增加，這樣「貧富懸殊」便真的是大問題。我也不贊成事事把矛頭指向有錢人，把他們鬥個你死我活，有錢本身並不是罪。

總結六十年代

總括香港六十年代的貧窮面貌：與五十年代相比，六十年代的窮人，生活好過一點，赤貧是少數，不是多數。但六十年代的貧窮家庭，一般有眾多子女，所以貧窮兒童比比皆是，他們又欠缺讀書的機會，所以1966年和1967年發生的動亂，群眾中竟有不少十歲八歲不到的小孩子。

另一不同之處，是六十年代的窮人，一些是五十年代才從大陸來港定居，特別是1962年的「大逃亡」，一年間來了二、三十萬人，他們較戰後來港的難民年輕，對香港日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有深遠影響。同時，當五十年代的窮人有了較穩定的生活，不再朝不保夕，他們留下來最底層的位置，就這樣給後來的難民取代。

六十年代期間，香港的社會結構也出現了變化：窮人還是佔大多數，但社會出現了類似今天中產的階層，他們有固定工作，收入也較穩定，薪金每年有增加，子女有書讀，完成中學後更可升讀大學或出外留學。生活方式方面，大多數人不再只求兩餐一宿，他們還有餘錢消遣，豐富自己的生活。在這些中層之上，有少數富有家庭在社會上佔據重要位置，擔任慈善機構的主席和理事等，政府也委派他們出任公職；不過，在普羅大眾眼裏，有錢人遙不可及，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一個謎。貪富懸殊並未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

七十年代：物質之外的貧窮

從事社工看到的貧窮景象

踏入七十年代，我看到的貧窮現象，主要是從自己的工作經驗得來的。正如戰後許多來港的難民，我家經過二十年的奮鬥，加上香港社會和經濟環境的配合，總算離開了貧窮的行列，成為小康之家。父親轉職報館寫稿後，收入增加，我們全家也有了比以前舒適的生活；而年紀比我大的哥哥和姐姐，完成中學或大學課程，很快便找到穩定的工作。其中三位更相繼到外國進修或接受專業訓練。到我 1966 年進入香港大學的時候，兄姐結婚的結婚、出國的出國，家裏突然變得冷清。原來擠迫的居住環境大大改善，我也可以有自己的房間。

1970 年 9 月，完成學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的社會工作文憑後，我找到社會福利署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的職位，第一份工作是派往兒童法庭擔任感化官，同時兼任新開設的塱背山男童院的善後輔導主任（after-care officer）。一年後，新蒲崗裁判司署（後改名

為黃大仙裁判法院）建成，我被派往做「開荒牛」，輔助的不再是兒童，是成人罪犯。

1972年10月，我離開社會福利署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社會政策碩士課程，為期十八個月。1974年初，我完成碩士課程返回香港，隨即在觀塘翠屏道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任職社工，負責的是中心的家庭個案工作。一年後，我重返社會福利署，成為新開辦的「社會工作訓練學院」的講師。教學之餘，從1974年9月開始，我在香港大學註冊修讀博士學位。導師是社會工作系的何志教授（Professor Peter Hodge），研究題目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研究。1977年，社會工作訓練學院脫離社會福利署成為香港理工學院的應用社會科學系；同一年，我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成為學系的助理講師。

我這樣詳細交代我在七十年代期間工作上的轉變，目的是要說明，如果在這十年裏，我只停留在同一職位，我不會對當時香港的貧窮面貌有多方面的認識；正因我曾經擔任社署的感化官，也曾有機會接觸成人和兒童罪犯，所以我了解罪犯犯事的緣由，及犯事與他們家庭背景的關係；正因我曾經在東九龍從事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我才能領會住在公共屋邨的低下階層家庭所遭遇的困難；正因我曾經在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我才有機會在九龍城寨進行調查訪問，明白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也同時有機會與當時兩位以反映社會實況為題材的導演討論社會問題。這兩位導演是龍剛先生和香港電台《獅子山下》劇集的編導張敏儀小姐；正因我在1977年加

入了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工作學系，我才有機會負責香港有史以來首項關於貧窮的調查。總言之，在七十年代的十年裏，我加深了自己對貧窮問題的認識，也開展了我日後三十多年來對貧窮現象的研究。

七十年代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七十年代的社會面貌，今天市民常用的形容詞，是前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於一次財政預算案中提到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是香港電台於七十年代拍攝的劇集，講述的是住在公共屋邨居民的生活，以及他們在逆境中如何憑着毅力和奮鬥，及親友和鄰舍間的幫助，最終創出美好的明天。

《獅子山下》劇集所反映的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整體而言是真實的，雖有描述人際的詭詐和虛偽，但劇集傳遞的多是正面的訊息，強調人必須真誠相對和彼此體諒，令觀眾觀看後得到激勵，認同做人就應該努力向上。《獅子山下》劇集當日能夠深入民心，已故歌手羅文演繹的主題曲居功至偉，這首主題曲也成為日後香港勵志歌曲的先河。

什麼是「獅子山下精神」？梁錦松引用這個比喻時，香港正經歷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衰退；連續六年的通縮，8%、9%的失業率，使市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陷入谷底。梁錦松以「獅子山下精神」來激勵人心，隱約暗示香港在七十年代也曾經歷

了一段艱難的日子：1973年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危機，令香港的經濟從1974年到1976年幾乎停滯不前，失業人數驟增，市面一片蕭條。

無疑，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衰退，與七十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的蕭條，確實十分相似，但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是香港經歷多年經濟迅速發展後首次遇上的挫折（1966年和1967年的動亂並未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嚴重打擊），但只過了兩三年，香港經濟即迅速反彈，增長速度較前更為強勁。所以，那時香港市民相信，只要他們奮發圖強，努力克服困難，好日子是可預期的。梁錦松重提「獅子山下精神」，但在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危機下，港人憑努力就可以翻身嗎？梁錦松的言論並未使港人信服。

話說回來，《獅子山下》描述的情景，與我當日看見徙置大廈的情景，大致十分接近。那時的徙置大廈，一層就住上數十戶人家，正是「朝見口、晚見面」，除非生性孤獨，出入總會閒談幾句，各人家中的情況，鄰居都瞭如指掌。這樣的關係，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需要鄰居幫忙時，出一句聲不會求助無門；壞處是難有個人私隱，家裏發生的大小事，街坊很快給你傳開去。

鄰舍間無私隱造成的困擾，以下是我親身看見的故事。我在觀塘的家庭服務中心任職時，個案中有家主因病去世，留下妻子和十多歲大的女兒，住在秀茂坪區的徙置大廈。我去做家訪時，經過走廊上二、三十戶人家才找到他們的單位。當時正值陽光猛烈的下

午，走廊靜陰沉沉。微弱的燈光連門牌號碼也看不見，漆黑得令人有點兒心事。好不容易才找到要探訪的單位，給我開門的是約好的婦人。我望入屋內。什麼也看不見，屋內比走廊更黑。婦人請我進入屋內，才把內裏的電燈開了。屋內的家具十分簡陋，也沒有什麼間隔。她的女兒坐在床上，並沒有做着什麼。

訪問前，我從個案的資料中知道，婦人的丈夫過身已有半年，過身前已沒有工作一段時間，全家靠公共援助過活。婦人大約四十多歲，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大。她對我說，自己健康不好，常常生病，無法外出工作，又要照顧女兒。女兒坐在床上，沒有說一句話。我問她女兒是否生病？為什麼沒有上學？婦人慌張的望着我，說丈夫生病後，鄰居知道他們領取救濟，看見福利官來做家訪，所以鄰居都看不起他們，常在背後閒言閒語。丈夫過世後，鄰居更多說話，她除了買東西，很少外出，平日都把門關了，窗簾放下，屋裏的燈也不開，整日閒坐在家裏，做家務打發時間。

我追問女兒為什麼不上學？婦人說女兒頭腦遲鈍，又正處發育期，有幾次與她外出，附近的男人都盯着她，她怕女兒被人欺負，這半年都不准她上學，只問中和她一起外出買東西。我看看她女兒，問她幾個簡單問題，她看來不似遲鈍，只是表情呆滯，可能長期困在家裏的缘故。婦人怕鄰居閒言閒語，自己封閉起來，鄰居更多說話。明顯地，婦人不自覺的把現實和幻想混在一起，心理不平衡，連帶女兒的成長也受到影響。

真正的「獅子山下」

話扯遠了，還是讓我們回到七十年代真正的「獅子山下」，看看當日香港的貧窮面貌，低下階層市民又是怎樣的生活？經過戰後二、三十年的奮鬥，一般市民總算站穩了腳，基本生活可以應付。當時私人樓宇價格數百元一平方呎，就是灣仔五、六百呎的洋樓單位，售價十多萬元，但那時一個工人月薪只有五、六百元，私人樓宇的租金還是無法負擔，只有申請公共房屋。輪候十年八載是平常事。

1974年，我在觀塘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任職社工，負責的家庭個案都是住在附近的公共屋邨，包括雅賓（今翠屏邨）、秀茂坪、鹹田（今藍田）、牛頭角等徙置區。這些屋邨是房屋署興建的公共屋邨第一至第三期，是由共用沖涼房和廁所，到每個單位有內置的騎樓附加細小的用廁和沖涼的房間。

第二和第三期的公屋設計是：長長的走廊，兩旁有二、三十個單位（後期約有多至五、六十個單位，看不到盡頭），每個單位的面積約一、二百平方呎（那時公屋的居住面積是每人24平方呎），向街的一面有狹小的騎樓，一邊用作煮食和洗衣服，一邊是用廁和沖涼的地方。在入住徙置大廈之先，申請者多曾在寮屋和天台木屋居住一段時間，才獲徙置「上樓」。

我在觀塘工作的一年時間，接觸的家庭差不多全部住在觀塘

的徙置大廈。難寮徙置區是五十年代落成的屋邨，每次走近大廈兩旁走廊，可見隨處堆滿垃圾，且發出臭味。那時徙置事務署隸屬政府部門，職員的工作態度十分懶散，居民也不會投訴，怕一旦得罪負責管理的職員，日後會被針對。難寮的居民全是社會裏最低層的市民：男的早出晚歸，做的是體力勞動，或從事服務業，如酒樓工人，十多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十分折磨人。我接觸的家庭中，不少是家主因「搵食」搵不過來，或因傷病而停工，結果令全家陷入經濟危機。

我負責的個案中，有酒樓工人於1951年來港，二十多年來完全沒有休息，只在結婚時放了幾天假，身體就算不舒服，只要不發燒也會帶病上班。他為什麼如此「搏命」？簡單一句，是薪金逐日計算，開工就有糧出，不開工就沒有，自己因事請假還得找朋友頂替，薪金由他自己支付。所以，除非爬不起床，怎樣辛苦也一定上班。

1975年，我在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學院要發展本地教材，於是舉辦研討會，題目是本地教材與社工教育，邀請的主講嘉賓之一是港台編導張敏儀小姐。研討會中，我描述任職社工時，在秀茂坪看見的情況，好像並沒有張敏儀拍的劇集那樣，鄰舍關係說的這麼美好。張敏儀解釋：《獅子山下》劇集在揀選題材方面，難免偏向較積極的一面，如鄰居的守望相助，至於負面的情節，不是完全沒有，但結局總希望是完滿收場。研討會中，另一講者是當日專拍社會題材的龍剛導演。龍剛說自己拍的是寫實電影，有人批評

他在電影中說教，他並不否認。還說自己拍電影，為什麼不可說自己要說的話，只是有時說話太直接了。

年輕工人付出的「代價」

常說「獅子山下精神」代表的是香港人的拼搏和「永不言敗」，但六、七十年代香港人這樣拼搏，為的是什麼？答案只有一個：他們為的是讓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好過一點，不致朝不保夕。但他們這樣辛勞工作，是被迫的還是自己情願的？誰不想輕輕鬆鬆的工作？誰願意每日工作十多小時，賺的只是「雞碎」這麼多？我當日看見的家庭，因為屬於福利機構的援助個案，無疑都是生活艱苦，但他們付出的努力，不但無法令自己和家人生活好過一點，日後仍要負上沉重的代價。

我遇到的男士，他們耗盡自己的時間和體力，日復一日的不停工作，生活的苦悶可想而知。為了逃避，一些沉迷賭博，或酗酒，或吸毒，或虐待家人，以圖發洩心中的憤懣，甚至無法自拔。至於他們的家人，太太要留在家中照顧子女，也多會從附近的山寨廠拿些半製成品來加工，盡量賺多一點幫補。到1978年，香港才實施九年免費強迫教育，所以在七十年代間，很多小孩子十一、二歲完成小學後即時出來工作，特別是女孩子，就算成績不錯也不會入讀中學。1971年，我調往新蒲崗裁判司署任職感化官。新蒲崗是新開發的工廠區，區內工廠數以百計，工人數目眾多；1967年暴亂就是因勞資糾紛在新蒲崗首先爆發，工人抗議資本家剝削他們的權益。

我在附近的法院工作。外出午膳，碰口碰面的都是年輕工人，女孩子打扮如黑白影片時代的陳寶珠：長長的直髮，紫色的襯衣和短裙。那時的工廠多實行三班制，二十四小時不停的生產。碰見的年輕工人有些是上班，有些是下班，返工前或後到外面吃些東西，也有「帶飯」返工廠吃的，利用的是不到半小時的休息時間。

低下階層就是要拼搏才能擺脫貧窮。七十年代，大多數家庭總算「有衣有食」，原先被認為是香港最大包袱的過百萬難民，當時竟成為珍貴的廉價勞動力，使香港在短短二十年間，躋身為供應世界各國所需輕工業產品的生產重地。政府是否有政策發展香港的製造業？我當時不明白。後來研究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發覺鄰近工廠區都建有公屋；這樣，工廠老闆不愁找不到工人，而且工人年紀輕輕，眼明手快，最適合香港六、七十年代的輕工業。

當日年輕工人雖不愁衣食，他們的辛勞也使香港的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但低下階層家庭因工作而付出的「代價」，社會有否計算？今天社會有沒有想過補償他們往日的損失？我可以用討論最多的退休保障來說明。香港應否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就這問題，我寫過不少文章，以後再作交代。但事實是，戰後百多萬來港的難民，他們和他們在香港所生的子女，曾在香港發展輕工業時付出他們的勞力；我不想在這裏誇大他們對香港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畢竟他們當時亦得到了報酬。但在解決一宿兩餐之餘，他們從工作還得到了什麼？他們有自我發展的機會嗎？他們如何計劃自己的未來？

七十年代製造今天的「貧窮」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開始起步，而當時香港的製造業正方興未艾，勞動人口中超過四成從事製造業。到了八十年代中，香港的工廠相繼北移，製造業工人的數目逐漸下降。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今天討論應否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回顧歷史是必須的，不能單看政府財政上的負擔。社會應如何照顧老年市民的生活，並不單是資源是否足夠的問題，其中還涉及我們的道德責任。我們應首先問：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老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香港今天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有九十五萬，其中 18%，即約二十萬人倚賴綜援。他們為什麼窮到要申請綜援？

有人批評，領取綜援的老人當他們年輕力壯時，為什麼不儲蓄多個錢，這樣他們的晚年生活便有保障？誰有頭髮想做「癩痢」？今天六、七十歲的退休人士，正是六、七十年代在工廠打拼的年輕工人，或在酒樓食肆的廚房工作，在樓面做侍應，或在街頭巷尾的小店鋪做售貨員。這些工人，今天都老了，他們部分要倚賴援助過活，我們可以埋怨他們年輕時不努力嗎？

今天的貧窮現象，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看，才能有全面的了解。戰後的香港，絕大部分市民都是一窮二白，他們捱過了五、六十年代的艱苦日子，生活才慢慢得到改善，但只做到「餐餐餐食」，絕對談不上富裕。從香港整體發展的角度看，低下階層勞苦大眾的生活，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貧窮，只是在不同階段，貧窮有

不同的意義而已：五十年代的貧窮是窮的要命，連基本溫飽都成問題；六十年代的貧窮，不再是生存受到威脅，而是收入僅可應付基本生活的支出，是捉襟見肘；七十年代的貧窮，不再限於物質條件的匱乏，也涉及一些生活方式和社會期望的差別，如子女是否有升讀中學的機會？

Seeborn Rowntree 關於工人所過一生的發現

這裏，我想提到英國一位研究貧窮現象的鼻祖從調查所得的發現。這位鼻祖名 Seeborn Rowntree。他不是一位學者，而是一間今天仍在經營中的糖果廠的老闆。在十九世紀末，他發現廠裏工人雖有固定收入，但很多時生活好像無以為繼，連維持基本生活也十分吃力。他於是在自己工廠所在地約克市（York City），做了一項簡單的調查，看看工人是怎樣過活的。1901 年，Rowntree 發表他的調查報告。其後每隔一段時間，又重複再做調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經歷半個世紀的時間。他得出的結論。歸納如下：

首先要說明的是，Rowntree 調查的對象是二十世紀上半部分的英國工人。沒有什麼學歷，一般也沒有受過訓練，有的技術是工作時積累下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家庭計劃並不流行，體力勞動工人所生的子女，五、六個十分平常，所以當子女還是未成年時，單靠戶主一人的收入，多不足維持全家人的生活；直到子女長大，相繼出來社會工作，生活才會有改善。

出來工作的子女，只有少數能夠脫離工人階層，多從工廠的低層職位做起。當他們結婚成立自己的家庭後，開始時生活還可應付，但當他們有了自己的兒女，情況又打回原形，重複他們父母的人生經驗，全家生活貧困。至於他們的父母，年紀大了就不能工作，常不到六十歲便退下來，而他們的子女自顧不暇，只得讓父母靠救濟過活。Rowntree 發現的貧窮現象，概括了一般底層工人的人生過程，簡單來說，貧窮出現在他們人生的三個不同階段：一是出生後的孩童時段，二是成家後有了子女的時段，三是當勞動力下降及退休後的時段。

以上簡單交代了 Rowntree 做的調查，若應用於香港，也可用來解釋六、七十年代的貧窮現象。六十年代，香港製造業開始起飛，工人不難找到工作，赤貧逐漸消失，那時有句流行說話：「有手有腳，哪怕餓得死人！」戰後初期，人浮於事，即使願意工作，要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也不容易。韓戰結束後，從上海來的資本家，憑着他們過去開辦工廠的經驗，適時地利用香港過剩的勞動力，以及政府開發新區安置難民的政策，要那間，各類工業包括紗廠、染布廠、陶瓷廠、塑膠廠、五金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荃灣、觀塘等後置大廈集中的地區。到七十年代間，工廠的種類更多，有做鐘錶的、假髮的、玩具的、成衣的、電子的（收音機、計算機），都是人力密集的製造業，對年輕工人的需求尤其殷切。

七十年代工廠工人的生活

我大學畢業後，在社署感化組任職感化主任，輔導的是被判接受感化的罪犯，職責包括協助成年罪犯找尋工作，及為失學的青少年覓求學位。為了介紹受感化的成人找尋工作，我經常聯絡一些工廠的主管，或在街上及報章上看到招聘工人的廣告時，主動的與工廠老闆聯絡。

有一次，我約了荃灣一間紗廠的老闆見面，看看有沒有適合接受感化人士的空缺。這間紗廠有員工千多人，除廠房外，還有食堂和供工人留宿的地方。接見我的是工廠的高級職員，他歡迎我介紹受感化人士到他的工廠工作，又說明白犯罪的並非全是壞人，工廠設有宿舍給單身年輕工人留宿。我見他十分健談，也多問幾句，問他在香港開廠是否賺很多錢？他見我是外行，頗願意解釋一下，他說：韓戰後，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對香港卻特別優待，香港出口到西方國家的貨品沒有關稅；政府也很鼓勵工業家來港設廠，同時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所以樂於批出土地，方便廠商經營。這樣，工人找到工作，廠家賺到錢，政府也積極在工廠區附近興建大量公共房屋，保證工廠不會欠缺人手。

主管說來高興，還教我賺錢的道理。他說老闆一旦與政府談妥廠房用地，一年半載廠房便可建成，機器同時從外國購買回來，有些還是二手貨。融資不會有困難，重要的是老闆人面要廣，可向銀行借到大部分資金。當廠房和機器就緒，即可招聘員工，不用一個

星期，工廠即可投入生產。所以，從籌劃到貨物出口，一般只需一年的時間。

他繼續給我上課，說香港的優勢是勞工法例絕無僅有，工廠可二十四小時運作，機器是不用休息的。工人一般分成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時，包括十五分鐘喝水、吃東西、上廁所的時間。工人願意的話，加班是可以的，但他不想工人加班超過兩小時，免得他們過分疲累而受傷。他這樣說，我覺得他要給我好印象，好像他是蠻有良心的。會面後，他帶我去參觀廠房。我看看滾動的紡紗機，這位主管得意的說：「機器有如印紗機，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不斷印刷，紗布就像花花綠綠的銀紙。」我不知當時如何回應，但我看到的，不是機器的轉動，而是站在紡紗機旁的工人，他們那張呆滯和毫無表情的面孔，我驟然想起差李·卓別靈在《摩登時代》的扮相，原來小時候在電影裏看過的情景，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的。

對於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今天港人普遍持有的印象，好像在這二十年裏，香港一切都是朝着美好的一面發展：赤貧不再困擾普羅大眾，市民不再擔心吃不飽，穿不暖；人浮於事的情況成為過去，街頭巷尾都可看見招聘工人的廣告，只要肯做，沒有人憂心找不到工作；雖然仍有數十萬市民在山邊蓋搭木屋，但他們得到安置入住公共房屋是遲早的事，政府的規劃是令每個家庭都有棲身之所；孩子要讀書，政府於1971年開始推行六年免費教育，新一代不會是文盲。娛樂玩耍，行街看電影是一般市民的餘暇節目，低層家庭雖未必有能力購買電視機，但基本電器如電飯煲和冰箱還可應付。

毫無疑問，六、七十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轉捩點，也是港人從一無所有上升至略有資產的過渡期。我不否認，七十年代的十年裏，港人滿懷希望和期待，但情景決不像今天的港人想的美好。我懷疑這種想法，就好像人到了晚年，緬懷年輕時經過的日子，縱有辛酸和痛苦，但事情既然過去，與其在心裏留下不安和怨懣，不如稍加美化和修飾。就如歌星羅文主唱的《前程錦繡》：「小小苦楚等於激勵，等於苦海翻細浪。」人總得向前望，過去的就由得它過去吧！從這個角度看，《獅子山下》劇集轉達的信息，不能說它有錯，但也並非事實的全部。

今天重提「獅子山下精神」，用意是要鼓勵港人毋須氣餒，要延續上一代的拼搏、努力的開創未來。這樣的勉勵說話，用意是正面的，但對於年輕一代，恐怕難起激勵的作用，畢竟時代不同了，困擾新一代的問題，怎可與三、四十年前的情況比較！

港人為什麼要拼搏？

回說六、七十年代時市民表現的拼搏，在我的觀察裏，這種精神很多時是迫出來的，並非他們的意願。所謂「生活迫人」，就是這個道理。八十年代中，我受葵青區議會的委託，在區內進行調查，了解當日區內青少年的行為表現，當中有什麼值得關注的地方？區議會可做什麼幫助他們？葵青區以公屋居民佔多數，大部分居民在該區附近和荃灣的工廠區工作。

我在葵青區進行調查時，受訪的青少年七、八成以上是公屋家庭的子女。八十年代的貧窮狀況，我以下還有詳細的敘述，但我想指出的是：我在葵青區訪問的「不良青少年」，令人擔心的行為諸如：聯群結黨、欺凌弱小、破壞公物、撿是鬥弄、亂搞男女關係、酗酒、吸毒等，根源所在還不是他們從小到大，從來都未能得到父母足夠的關懷和愛護，形成他們對家庭的感覺非常負面，也很少說自己的童年是開心和快樂的。

調查中，青少年常說的話：「父母不理我，從小就讓我自生自滅。」為什麼這樣？他們的父母不愛孩子嗎？我相信做父母的，不會故意不理孩子，但他們工作早出晚歸，與孩子見面的時間每天不到兩、三個鐘頭的時間，他們怎知小孩平日做什麼？有什麼朋友？學了些什麼不良行為？香港於1978年才推行九年免費教育，所以受訪的青少年，大多完成小學後便輟學，一些在中學多待兩、三年。那時小學是半日制，小童返學校前或放學後，家裏大人就可能只有他們的祖父母，孩子去哪裏玩，大人管不了。

我不是要在這裏分析青少年問題，但六、七十年代低下階層市民的拼搏，賠上的正是他們無法照顧兒女，待孩子習染上不良行為，或觸犯法紀時，做父母的想要補救，實在太遲了。我在職法庭感化主任時，有一次，年紀不到十五歲的青少年犯了事，罪行是威迫年紀比他少的加入黑社會，父母為他求情說：「我的孩子平日很聽話，是外邊的人教壞他。」裁判司顯得不耐煩，對求情的父母說：「你的孩子威嚇別的孩子，還說別人教壞他，他不教壞別人已

很好了。你們做父母的，不好好管教子女，還把責任推卸給他人。」葵青區調查完成後，我在報告中有這樣的結論：「所謂問題青少年，歸根究底，還不是家庭首先出現了問題。」

但家庭出現問題，誰應付上責任？那時流行的一句話：「不是你錯，不是我錯，是社會的錯。」社會錯在哪裏？這種沒有答案的問題，不問也罷。我唯一知道的是，父母無暇照顧自己的子女，代價其實十分沉重。除子女得不到適當的照顧外，夫婦關係惡劣是另一個困擾低下階層市民的問題。任職感化主任時，遇到一個令人深思的個案：一個十三、四歲的青少年，犯的是輕微罪行，但因他與父母失去聯絡，被判在九龍塘海棠道兒童院接受感化。我的工作係安排這位少年人返回學校讀書，或找工作做。我覺得長遠之計，首先還是為他找回父母，其他可待他住院判期完成後再作打算。

這位少年人為我提供的資料是，父親與他仍有聯絡，只是父親工作不穩定，以前的家早已拆散，他只能靠親戚的幫助才找到父親，最後一次通電話是幾個月前的事。據少年人說，他小時全家住在油麻地的唐樓單位，父親和母親都外出工作，生活算過得去。大約在他小學六年級那年，母親突然不見了，後來爸爸對他說：母親貪慕虛榮，在街上碰見有人說她漂亮，引誘她去做電影明星，她回家收拾衣物便跟人走了，以後沒有看見她。

我聽着這位少年人述說他的家庭狀況，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母親怎會聽了街外人幾句說話便跟人走了，連丈夫和兒子都不顧？是

什麼原因造成這個家庭破裂？夫妻的關係這麼疏離？說走就走？相信只有他們夫婦二人才知發生了什麼事。六、七十年代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付出的代價確實十分沉重。

政府協助市民的福利措施

那麼，政府在七十年代為低下階層市民做了些什麼？在交代五十年代的貧窮面貌時，我曾說，那時政府做的主要是一些基礎建設，如公共衛生和食水供應，窮人便由得國際救援組織去幫助。1958年，社會福利署發表的年報承認，國際救援組織從西方各國募捐得到的物資，數量較社署派發的物資還要多。所以，窮人要別人救濟，最好到世界社會服務社、天主教救濟處、救世軍等國際救援組織尋求協助。

公共援助（即今綜援）是1971年才改以現金派發。在此之前，社署實行的是實物救濟，市民需要接受審查，確定符合資格，才可每星期兩次到派發站領取食米、蔬菜、罐頭等物品。港島的派發站位於跑馬地體育路（即今香港賽馬博物館），因我常到馬場內的球場玩耍，常經過社署的派發站時，有好幾次看見輪候領取救濟的人龍，他們絕大部分是六、七十歲的老婦。那時候，低下階層婦女多穿黑膠綢布做的唐衫褲，遠遠看去烏黑的一堆人群，有人暱稱他們是「黑衣幫」，與「乞丐幫」諧音。

公援轉以現金派發後，金額僅足糊口。據文獻記述，公援採

用的是「一籃子的計算方法」(basket approach)，即先決定每一個人每天所需熱能 (calorie)，然後像買菜一樣，到街市購買等同熱能數量的食糧，完成後計算共用去多少錢。簡言之，公援受助者得到的，只夠他們不至餓死。1971 年，即公援改以現金派發的第一年，單身人士的基本金額是每月 110 元，即每天約三元七角。

有關公援制度，還要補充的是：公援開始時，15 至 59 歲的健全人士並不符合資格。就算他們是家庭成員之一，社署也不會把他們計算在內。政府的解釋是，有氣有力的人理應外出工作，不應倚賴援助。如果他們賺的錢不夠養家，政府會幫助他們的家人，但不會讓有勞動能力的人接受援助。除非他們是家庭主婦，政府才會朝開一面，讓她們在家裏照顧小孩。

七十年代上半期，香港股市大上大落，暴發戶如何從「魚翅撈飯」到跳樓自盡，今天傳媒仍津津樂道。到 1973 年，石油危機爆發，石油每桶從四美元上升至三十多美元，香港的經濟遭到嚴重挫折，失業率飆升，一度達到勞動人口的 8%，是香港戰後經濟復甦以來最嚴重，政府也於 1974 年實施燈火管制。我家住在今天崇光百貨公司附近，大九百貨公司開業不久，而波斯富街轉角的中國國貨公司是人流最多的商店；到了晚上八時，商店的櫺窗燈飾關閉，街道兩旁的廣告牌不准開燈，市民放工後只好趕着回家，娛樂場所大受影響。

1975 及 1976 年間，香港的治安大不如前，市民晚上外出要格

外小心，免遭「搶頭黨」和「扑頭黨」洗劫，加上市面極之蕭條，市民一下子墮入愁雲慘霧之中。而窮人的數目增加了，不少家庭走頭無路，無論公援金額是否足夠，要活下去就得申請。公援並不幫助成年人，變相令貧窮家庭雪上加霜。有團體要求政府放寬限制，讓失業人士也可領取公援，但當時的社會服務司（即今勞工福利局局長）回應說，因他看不見街上多了乞丐，所以他不認為政府應修改公援條例。明顯地，政府把成年人申請公援等同乞丐求乞，所以必須「窮到貼地」才值得幫助，觀念實在太落伍。

我描述七十年代的貧窮面貌，較多記錄社會陰暗的一面，好像人間充滿的，盡是悲慘的故事，沒有市民是開開心的。我雖然沒有這個意思，但記述的既是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他們縱有開心事，但令他們憂心的事更多。最使我感受深刻的，也是我要傳遞的信息，就是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出現的繁榮景象，其實在背後，勞苦大眾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他們的子女得不到適當的照顧；長時間的工作和惡劣的居住環境使他們身心疲累、精神受壓；夫婦之間的感情變得疏離，關係猶如陌路人；他們的人生日的就好像要多賺錢，財富是量度成敗的唯一標準。我記得七十年代時，報章副刊仍有連載小說，其中有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的標題是：「這個混亂的時代」，這也是我對七十年代的記憶。

窮人中的窮人：九龍寨城的面貌

今天香港人知道的九龍城寨，已成為歷史陳跡。這個舊日稱為

「三不管」的地方，今天只能從圖片中看到：外圍是密密麻麻十層八層高的樓宇，一株緊貼一株；城寨的高樓沒有樁腳，樓宇互相支撐，單位的外牆掛晾曬的衣服，底下兩、三層懸掛的是各色各樣、大小不一樣的廣告招牌，寫的是包包牙醫、包包眼科，還有醫治各種疾病的中醫師，看得人們眼花撩亂。

城寨有多少人口？走入城寨見到的，全是彎彎曲曲的小巷，約可容納兩、三個人經過，其中幾條貫通城寨的「大街」，如龍津街、大井街、老人街，外邊的人或有聽聞，其他小巷連城寨居民也不熟悉。城寨並沒有正式的水電供應，是城寨居民私自從外邊鋪設過來的，所以水管和電線掛滿小巷兩側和頂頂，路人走過時難免「中招」。電線漏電常有發生，居民不時要「走火警」。

城寨內有色情小電影播放，有娼妓和吸毒的「架步」，有賭檔，一切非法活動，人所共知；警察一般不會入內掃蕩，除非有大案逃犯藏匿城寨，警察才會入內搜捕。有人形容九龍城寨是藏污納垢的地方，從非法事業的活躍情況來看，形容不無道理，但住在城寨內的萬計居民，他們是否全都參與非法勾當？

1975年，我在社會工作訓練學校任教，那時救世軍的社會服務部與學院聯絡，探討與他們合作在九龍城寨進行調查的可能性，看看裏面居住的民眾，對社會服務有什麼需求。救世軍所以委託我們進行調查，因他們在城寨裏辦有一所小學，另外有一所社區服務中心。當時我受學院委派負責這項調查，而訪問員全是社工訓練學

院的同學。

在進行調查之前，我從來沒有人過九龍城寨，聽到的也全是壞的東西，好像只要一踏入城寨，即被人搶東西，或被迫拉去看色情小電影。所以，我第一次進入城寨，還是救世軍的工作人員帶路的。我和社工同學首先到他們的服務中心，聽取他們報告在城寨服務的情況，然後同工帶我們到城寨的街坊福利會，與那裏的職員打招呼，拜託他們多多幫忙，使調查可以順利進行。離開城寨之前，救世軍的同工帶領我們在城寨內走了一趟，吩咐我和同學有什麼地方是不能去的，但同工也叫我們不用害怕，因「撈偏門」的人「盜亦有道」。他們不會亂來，只要他們知道我們入內是做正經事，他們不會故意「搞」我們的。不過，為了安全計，同工吩咐我們訪問時，最好是兩個同學走在一起，互相照應。

調查在1975年的暑假進行，共成功訪問了城寨內97戶人家。同學們沒有遇到不如意的事，最大困難是按地址找人並不容易，有些樓宇沒有門牌，要靠熟悉環境的居民「指點迷津」。另一困難是，就算地址正確，戶主多在日間外出工作，晚上才可進行訪問。

當時，我們只知九龍城寨的名稱。後來城寨在八十年代中清拆，發現被棄置的石碑，上面寫着「九龍寨城」。該石碑今天放在公園之內。因說1975年時，九龍城寨雖「三不管」，但九龍城民政處對城寨存有一些資料，如城寨的人口估計有二萬至三萬人，救世軍同工卻對我們說，人口應有五、六萬，因城寨居民不少沒有正式

居民身份，也即是說，他們是非法在香港居住。

訪問完成後，參與的同學做了個總結，談論各自的感受，一致認為九龍寨城並不可怕。受訪的家庭一般十分友善，拒絕我們訪問的只屬極少數。因被訪者全是曾經或正在接受救世軍援助的家庭，所以他們不能代表住在城寨裏的全部居民，這是調查所必須接受的限制。但沒有救世軍的協助，我們也無從得知寨城內居民的地址。

這樣，受訪者為什麼要住在這個人皆厭棄的地方？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得看我們調查得來的數字。我們成功訪問的住戶共 97 個，而每戶的平均人數是 6.57 人（1971 年全港人口普查的相關數字是 4.37 人）。工作成員方面，每戶平均有 2.23 人，而主婦照顧家庭外，有五分之一外出工作幫補家計。換言之，城寨的家庭多是夫婦兩人皆外出工作，單靠一個成員賺錢，無法養活全家。

被訪住戶由救世軍援助的個案中抽出，所以全部被訪者以家庭為單位，並不包括單身人士；與今天的情況比較，受訪家庭子女的數目異常的高，平均有 4.37 人。子女多，但平均收入卻偏低，有兩成受訪家庭的平均收入在每月 500 至 799 元，四成 800 至 1,099 元，二成 1,100 至 1,399 元。七十年代中，工人的工資低的每月是四、五百多元，較高的六、七百元，所以雙職工家庭，全家收入不到一千元，生活應該十分困難。

接受我們訪問的家庭，六成以上在城寨裏住了超過十年，其中

一半擁有自住物業。我們問他們為什麼搬入居住？答案呼之欲出，總離不開城寨的租金或樓價比外面便宜。有受訪者說，他們戰後便有這裏住，因子女多，在市區很難找到地方，唯有搬入城寨；有說，在九龍市區工作，以前住木屋，火燒了，寮仔部編配他們到葵涌，太遠了，最後搬入城寨租樓住，方便返工。簡單一句，成為城寨居民，都是為了解決住的問題。

這樣，九龍城寨裏住的居民是貧窮嗎？應無疑問，他們屬於低下階層，只要有多點收入，相信也不會住在這個與煙檔、賭檔、色情架步為鄰的地方。據說在寨城裏經營非法事業的「撈家」，也不會在城寨裏住，只有那些收入微薄，子女眾多的窮苦人家，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才會住進這個「三不管」的地方。在提交救世軍的報告中，我形容接受我們訪問的居民，是「窮人中的窮人」(The poorest among the poor)。我也以九龍城寨居民的困苦，總結了我對七十年代貧窮面貌的描述。

第二部分

八十年代到回歸前

——貧富懸殊：從羨慕到妒忌



按：第三部分的圖片由溫賢賢先生及李偉英女士提供，特此鳴謝。

















經濟繁榮的背後

從破爛到昌盛繁榮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是怎樣的社會？俗語說：十年人事幾翻新。香港從戰後到五十年代末，十五年的時間，一句說話來形容：全部從頭開始。記憶中，到我 1959 年小學畢業時，周圍的一切都是破破爛爛的：樓房遭戰火摧殘，就算無即時倒塌危險，但到處漏水和牆壁剝落。和我一輩的孩子，穿的是哥哥姐姐穿過的衣服，或從親友處撿來的。只有到了新年，或衣服真的破爛不堪，父母才會給子女買新的，也是一件起兩件止，不會從頭到腳換新的。

這種破爛的情景，到了六十年代，香港才逐漸換上新面貌：舊樓開始拆卸重建，市區的洋樓裝上升降機；小孩除了較原始的遊戲如跳繩、踢球外，還可有自己的玩具，是鐵皮和木造的，十分簡陋，小孩玩得津津有味；大人的消費場所變化更大，當時我的年紀還小，不知大人的事情，只知道西餐館的價目有高有低，同是午餐，價目有幾種。

以上變化，絕非香港政府的規劃，是一連串無法預測的事，巧合的令香港從戰後的破落中，變成亞洲區除日本以外最繁榮的城市。為什麼是巧合？試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誰會預測英國仍會繼續管治香港？國民黨執政幾十年，誰會想到在戰勝後數年間，竟把江山斷送在共產黨手裏？新中國成立不到兩年，誰會估到朝鮮半島會爆發戰事？到韓戰結束，誰會預計歐美各國竟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總言之，一連串事件的巧合，無論戰爭中誰勝誰負，誰是朋友或敵人，香港竟在這變幻中，成為最終的得益者。我這種想法或許有點誇張，但人們不是常說香港「一世夠運」嗎？

有人說香港是福地，表面看來對香港不利的事，最後常令香港向前跨進一步。命運真的對香港偏心嗎？我不知道，也很難解釋，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周邊發生的事，常使香港在亂打亂撞中抓到了發展的機遇，在二、三十年間，成為世界級的國際大都會，不但曾經是紡織和成衣業的「世界工廠」，更且是亞洲區舉足輕重的貿易和金融中心。

到七十年代初，香港取得的成就和繁榮已超越了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甚至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嫉妒和制裁的對象，連英國人對香港的有錢人也看不過眼。1972年，我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碩士，開課前先在倫敦停留兩週，以便熟悉英國的氣候和生活，並與幾位在英國讀書或工作的舊同學叙舊。到了倫敦，朋友約我在香港館（Hong Kong House）見面，這裏是香港學生的聚腳點。朋友對我說：有幾位從香港來的有錢子弟，終日在香港館hea（今天術

語），人稱他們是「預科研究生」(matriculation research student)，因屢次參加預科考試，但都成績不佳，無法考上大學。他們可以長期在倫敦逗留，吃喝玩樂，因他們家裏有錢；香港的留學生看不起他們，本地的學生知道他們是錢筒子弟，除非要從他們身上討便宜，也對他們不太友善，甚至覺得香港人都是「暴發戶」，欠缺文化，連帶對留學英國的香港學生也有一點不屑。

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在七十年代仍未出現，新聞報道多是中共政權鬥得你死我活，文化大革命未有終結的跡象。英國雖是香港的宗主國，一般英國人對香港並沒有印象，少數人士到過香港的，多如一般的客「到此一遊」，說得出的是太平山頂和淺水灣幾個景點。對香港稍有體會的，覺得香港的社會環境差異很大，城市中心地區異常繁盛，車水馬龍，可媲美世界其他大都會，但離開中心遠一點的民居，見到的與第三世界的情況分別不大。

資源分配是道德問題

我在曼徹斯特大學修讀碩士課程時，曾選修福利經濟學 (welfare economics)，教授的是剛從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的講師。他教授的內容，把英國傳統的福利觀念和經濟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強調社會發展的目的不單把「餅」造得更大，更重要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使他們免於匱乏。他指出，當資源不斷增加時，應確保資源公平分配（不是平均），避免財富兩極化，是維持社會穩定所不能忽視的。他特別強調，資源分配不單是經濟問題，更是民生

的問題、社會道德的問題。

這位年輕講師 Ian Gough，當時和我年齡相若，勤於研究和寫作，1979 年出版了一部社會政策學生必讀的書，名為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我感激他的教導，從他那裏，我認識到福利並不單是「做好人」，也不完全等於慈善。我並非認為慈善工作不重要，就是到了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實物救濟 (material relief) 仍是必須的，猶如一個極度口渴的人，一杯涼水比什麼都重要。所以，任何社會政策，都必須緊貼環境的變化，也不能草草依循一些傳統理論，最終要考慮的，還是「人」的福祉，無論是一杯涼水，或是全民享用的福利措施，只要資源拿得出來，就應好好的分配。

說話扯遠了，我想指出的是，從英國完成碩士課程回來以後，我特別注意福利政策中的資源分配，也就是今天常講的貧富差距。我這個省悟並不是什麼新的發現，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為什麼「寡」不是問題，「不均」卻必須要關注？匱乏生活當然不好過，就如戰後的香港，大部分人都是貧窮的，而且窮得要命，但正是大家都貧窮，只好心甘命抵的努力工作。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的中產逐漸成形，生活在赤貧之中的市民變成少數；社會觸目所及，繁榮景象隨處可見。我上文提到倫敦「香港館」的預科學生，他們的父母雖非大富大貴，但只要他們是商人、專業人士，或中、高級公務員，在香港經濟開始騰飛的日子裏，他們的財富和收入，足以令他們有能力遣送子女到海外讀書。

我在英國逗留只有一年半的時間，1974年初回到香港，因而錯過了1973年股票大上大落的日子，只能從別人口裏聽到「魚翅撈飯」的誇張形容，未能親睹箇中情景。回來後所見所聞，我發現香港的貧窮問題，再不單是物質的匱乏，而是隨着社會財富的增加，社會關注點逐漸移向「有與沒有」的差別，貧窮變成相對性。另一方面，財富的增加未必令社會更加和諧，更多時是製造了各樣的矛盾和衝突。若要進一步分析收入不均造成的現象，恐怕要另外寫一部書，但當日的「暴發戶」，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常成為城中話題。市民心裏也會疑問：這些財富驟增的富人，他們憑什麼可以「發達」？為什麼別人可以這樣飛黃騰達，自己卻仍是「地頭」一名？這種心態的出現，可見財富差距再不是窮人羨慕富人這麼簡單。

貧窮是命運的安排？

七十年代的貧窮狀況，上一章裏已有交代。那時工人找工作不會有困難，工廠的數目數以萬計，大約聘用過千人，也有親人合作營辦的「山寨廠」。總言之，有氣有力又肯做，香港不會餓死人。所謂貧病交迫，到了七十年代應該少之又少，較普遍的情況是：過百萬基層工人工作賺來的，除足夠維持基本生活外，還有幾個餘錢消費，增加生活情趣。不過，他們付出和忍受的，卻常是體力的過度消耗、冗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的工作和居住環境，這一切日後對他們自己和家人，難免做成嚴重的傷害。

看到貧富不均的現象，我也常有一些疑問：為什麼一些人的命

種如此不滿？是他們自己一手做成？是家庭加諸他們身上的枷鎖？還是當日流行術語講的：是社會的錯？我記得好幾次面對年輕罪犯時，我真的不知如何輔導他們；其中有十二、三歲的少年，中途輟學後，他在街上拾了些廢鐵來賣，後來被控偷竊，判接受感化，我問自己：這位少年錯在哪裏？有錢人送子女到海外就讀，窮家子女很多小學未畢業便得出來賺錢，社會待他們公平嗎？

我不想把問題帶到哲學的層面來討論，我知道自己不是第一個人問這個問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貧窮是古今中外、數千年來人類不斷探索的問題。我唯一知道的，是香港經過戰後二、三十年的發展，一些市民確實「富起來」了，他們的生活大大改善，少數好炫耀的，令人覺得他們不可一世，其他低調的積聚財富，為自己和家人的安好生活作打算。到了八十年代，「吃不飽、穿不暖」的窮人成為少數。我甚至可以大膽的說：赤貧不再存在。

貧窮的新定義

因此，當我在 1980 年受託進行貧窮現況的調查時，我的着眼點不再是有多少市民過着赤貧的生活。我轉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任教，除講課外，我主要的研究範圍包括貧窮和老人福利。當時政府扶貧的措施，廣為市民知悉的是公共援助，目的是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我研究的重點是應否設立退休保障。至於老人福利，我發覺香港 65 歲以上的人口剛超越整體人口的 7%，進入聯合國界定的人口成熟期（Mature stage）。我認為政府必須為人口老化作準

備，所以聯同一些工會和關注團體，促請政府及早設立退休保障制度，因任何退休保障計劃都需要一段長時間方能發揮作用。

1979年，政府發表第三份社會福利白皮書，其中提及公共援助的部分，決定發給老人和傷殘人士額外的補助，還提到要協助生活在公援金額水平以上的市民。政府於是委託中大社工系進行研究，看看政府應如何改善公援。當時我在中大社工系專注研究的課題是貧窮，這個研究便交給我去做。

首先，我確定不會採取英國 Charles Booth 和 Seebohm Rowntree 於十九世紀初採用量度貧窮的方法，指的是欠缺生存的條件。從事社工的經驗告訴我，香港家庭無論怎麼窮也不至「吃不飽、穿不暖」；也就是說，香港已過了赤貧的階段。香港人雖非富有，但只要找到工作，收入足夠維持生活；有些市民因年老、傷病、失業等原因，沒有收入，但政府設有公共援助，僅僅足夠生活開支，但不會叫人餓死。

其次，我確認為香港的經濟已發展到了相當水平，資源足夠保障每一個市民的基本生活。所以，貧窮問題不應是資源不足，而是部分人士無法賺取資源，需要別人的幫助。任何社會，總有一些人有錢，一些人貧窮，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問題是社會是否願意協助窮人，協助有多少？對於貧富差距，社會可容忍到哪一個地步？我們又是否願意看見漸趨富裕的社會，一些市民卻仍生活在赤貧之中？1973年股市興旺時，有人「魚翅撈飯」，揮霍無度，但一些市

民窮到「無錢開飯」。正如唐代詩人杜甫說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社會正常嗎？

或許我這個觀點是過於婦人之仁，過去也有人說我「好心做壞事」。但在有良知的社會裏，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我想做一些事來糾正，是錯的嗎？無論如何，我當時的結論是：我不應草草研究怎樣改善公援，還應為貧窮下個定義，讓大眾知道貧窮是怎麼一回事。我既決定「貧窮線」不等於赤貧，所以貧窮是相對的，即窮人被界定為窮人，不是他們欠缺衣食，而是相對於其他收入較高的市民，他們的生活十分艱難，買東西都要精打細算，花十元八塊也要思量，怕別人看不起他們。有時連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窮人的真實生活

當我提出用相對的觀念量度貧窮時，有人質疑窮人為什麼不向孔子的弟子顏淵學習。「一簞食，一瓢飲」，也不覺得辛苦；但顏淵不覺苦，且得孔子的稱讚，是因他安貧樂道。顏淵的高尚人格，有多少人可以仿效？我曾經做過實驗：要求讀社工的學生以公援的金額，嘗試生活一個星期，體驗公援受助人士所過的生活。同學其後報告：一日三餐還可應付，其他使費，就算肥皂和廁紙，也必須買最便宜的。一週過後，他們沒有剩餘的錢，還用多了。

窮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每用一個錢，都要想過量度過；生存雖沒有受到威脅，但這樣的生活，經年累月，是會叫人發瘋的！再

舉一個例子：有領取公援的家庭，子女很喜歡吃橙，但橙的價錢比較貴，香蕉卻便宜，所以持家的主婦只好買香蕉不買橙，且安慰子女說，香蕉的營養比橙高。公援家庭的真實生活，一般市民不會明白，認為這些只是瑣碎事；就是這些瑣碎事，才叫人煩惱。當每樣事情都要斤斤計較價錢，慳得就慳，我肯定的說：這樣的生活，絕不好過！

我決定以相對性貧窮的概念來進行研究，但問題來了，怎樣的相對性概念才可化為量度的標準？我查看文獻，發覺過往以相對性概念作為基礎的研究，大約可分為三種方法：一是以收入分佈的情況來量度。例如把全港的住戶按收入分為十個等分，收入最低的10%或15%便劃分為貧窮住戶，成為援助的對象。二是以生活開支的情況來量度，例如住戶用於食物的開支超過整體生活開支的50%，這些住戶便劃分為貧窮，政府給他們提供援助，減低他們用於食物開支的比例，這樣，他們便可以有多些錢用於生活的其他開支。

第三類方法是我最後決定採取的，是以生活方式來量度貧窮。這種研究方法運作起來較複雜，卻最能反映窮人的生活狀況。其實，貧窮的定義，一旦超越「吃不飽，穿不暖」，還有什麼比生活方式更能顯示有錢與沒有錢之間的分別？以上講到窮人的生活，每用一毫子都要仔細思量，但有錢的人，想買的東西就買，甚至如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說的：「錢用了才是你的。」對窮人來說，慳回來的錢才是自己的。

我當日採取生活方式來量度貧窮，主要是參考了英國社會政策學者 Peter Townsend 剛發表的報告：他也是採用生活方式來量度英國的貧窮狀況。讀了這千多頁厚的報告書，我便多了一分信心，認為在香港使用這種研究是可行的。從開始，我便不想單以收入和開支等數字來分析貧窮，我希望研究可以真實的把窮人的生活顯露在大眾面前，讓大眾認識到，貧窮不是我們想像的只是一種概念，而是無時無刻地影響着窮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包括他們每一個決定，購買的每一件物品，向家人所作的每一個承諾，金錢都成為他們心中的考慮。他們無法逃避金錢對他們生活所起的作用，也處處受制其中。

貧窮生活是怎麼一回事？

為了探討金錢在窮人生活所起的作用，我設計了一個問卷，用意是蒐集不同收入階層和社會背景的市民對窮人生活方式的意見。如我所料，衣與食是否足夠不再是衡量貧窮的指標，多數市民認為：就算每餐都是簡簡單單的飯菜，不代表這家人生活貧窮。衣着方面，八十年代香港人的穿衣習慣十分隨便，「先敬羅衣後敬人」的取態不至完全消失，但年輕人參加飲宴，只穿T恤牛仔褲也不會失禮；衣着只顯示個人的品味，與有錢或貧窮沒有關係。

貧窮觀點調查問卷

如一個家庭因人息有限，無錢而必須做以下的事情，你認為這

個家庭是貧窮嗎？請在適當位置打勾。

範圍一：衣食住行的問題	是貧窮	%	不是貧窮	%
1. 一個星期全家未能出外吃飯一次	40	12.4	283	87.6
2. 一個月一次都買得起游水海鮮吃	117	36.0	208	64.0
3. 只在重要日子（如過年過節）才割雞殺鴨	104	32.1	220	67.9
4. 衣服全部係平價貨	86	26.4	240	73.6
5. 弟妹要穿兄姐穿過的衣服	115	35.7	207	64.3
6. 只有非常緊急事才乘搭的士	59	18.1	267	81.9
7. 平日絕少乘坐地下鐵路	35	10.8	289	89.2
8. 房屋內全沒有間隔	149	45.3	177	45.7
9. 孩子讀書沒有自己的書枱	134	41.4	190	58.6
10. 家中部分成員長期要在廳睡覺	138	42.5	187	57.5

範圍二：屋內設備	是貧窮	%	不是貧窮	%
11. 沒有廁所	217	66.8	108	33.2
12. 沒有廚房	211	65.1	113	34.9
13. 沒有浴室	166	51.2	158	48.8
14. 沒有電視	179	55.4	144	44.6
15. 沒有雪櫃	219	67.4	106	32.6
16. 沒有電話	197	60.8	127	39.2
17. 沒有收音機	208	64.4	115	35.6
18. 沒有洗衣機	84	25.9	240	74.1
19. 沒有冷氣機	55	25.9	270	83.1

範圍三：教育醫療	是貧窮	%	不是貧窮	%
20. 家人小小不舒服不去醫醫生	52	16.0	273	84.0
21. 家人生病只去辦公立醫院醫生	191	58.8	134	41.2
22. 家人大病後買唔起好嘢食補身	237	72.9	88	27.1
23. 孩子讀書，買唔起習作試題簿	291	89.5	34	10.5
24. 就是孩子讀書成績好，也要他九年免費教育後出來工作	232	71.4	93	28.6

範圍四：生活情趣	是貧窮	%	不是貧窮	%
25. 家用不夠，減少雜支，如吸煙、飲酒	129	39.6	197	60.4
26. 經常不買報紙牌	104	32.0	221	68.0
27. 一個月都唔睇一次戲	51	15.6	275	84.4
28. 從來沒有出去外地旅遊	66	20.3	259	79.7
29. 從來沒有去過海洋公園	73	22.5	252	77.5

範圍五：生活方式	是貧窮	%	不是貧窮	%
30. 從來沒有帶孩子出街飲茶	159	48.9	166	51.1
31. 至親生日（如父母）都買唔起禮物送出	196	60.5	128	39.5
32. 新年無錢返利是	270	83.1	55	16.9
33. 親友有喜事無禮送	247	76.0	78	24.0
34. 一個星期無找朋友出街飲茶一次	36	11.0	290	89.0

在衣與食項目中，稍多市民認為可代表窮人生活方式的，是

「一個月一次都買唔起游水海鮮吃」及「弟妹要穿兄姐穿過的衣服」，但這兩個項目得到的「認同答案」，也僅佔 326 位受訪者中的三分之一。不認同的佔三分之二。總結來說，衣與食的選擇與貧窮生活方式關係不大；貧窮一旦不再是「食不飽、穿不暖」，飲食習慣和衣着就只算是個人的喜好，並不再是有錢和沒有錢的分別。

衣與食以外，住與行方面又有哪些可代表窮人的生活方式？香港八十年代已完成部分地鐵工程，成為普羅大眾日常的交通工具，乘搭的士也漸趨普遍，所以沒有一個「行」的項目可代表窮人的生活。「住」的項目中，有五成被訪者認為，貧窮家庭的特徵是：「房屋內全沒有間隔。」這個項目在後來的調查改為：「家中是否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的床？」原因是屋內間隔難有一致的定義，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理解：例如，用木板分隔的地方是否算有間隔？公屋單位的「騎樓」算是間隔嗎？

屋內設備：七八十年興建的房屋，大部分有獨立的基本設備，如廁所、廚房、浴室等，一般家庭也擁有各種電器，如雪櫃（冰箱）、電視機。所以得回來的答案，六成受訪者認為：家庭中沒有以下裝置就是貧窮：廁所、廚房、浴室、電視、雪櫃、電話和收音機；其餘兩種設備：洗衣機和冷氣機，只有四分之一受訪者同意是家庭貧窮的象徵。我的理解是：廁所和電視機等七個項目，當日已被視為每個家庭必須有的設備，沒有的就是貧窮；至於洗衣機和冷氣機，因價錢昂貴，而當時公屋住戶也不許在屋內安裝空調，所以家裏沒有這些設備，不一是貧窮家庭的獨有情況。

醫療和教育方面，列出的五個項目中有四個被列為貧窮家庭的象徵：「家人有病只去睇公立醫院醫生」、「家人大病後買唔起好嘢食補身」、「孩子讀書、買唔起習作試題簿」、「就是孩子讀書成績好，也要他九年免費教育後出來工作」。答案顯示香港人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也覺得有責任照顧患病的家人；這些都是華人社會認同的責任，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若家窮無法履行責任，就是貧窮所做成的結果，所以是貧窮的象徵。

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故方面，有三個項目被視為貧窮的象徵：「至親生日都買唔起禮物」、「新年無錢派利是」、「親友有喜慶事無禮送」。香港人有句說話：「人情緊過債」，就是到了今天，網上有一年輕人訴說朋友結婚，自己無錢做足人情，準備不赴宴席。可見人情這件事，無論社會如何改變，總是不可避免。對窮人來說，寧願捱餓，也不能兩手空空的參加親友喜宴。

貧窮的九個指標

有了初步的結果，我再做了一些統計學上的分析，最後選取了九個項目作為量度貧窮的指標。這九個項目是：

家中是否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固定的床？

家中有沒有電視機？

家中有沒有雪櫃？

家人有病時是否通常看私家醫生？

家中有喜慶事時，全家一般有沒有出街吃飯？

除了過年過節，平日有沒有割雞殺鴨？

親友有喜慶時，有沒有送禮做人情？

過年時，有沒有派利是？

平日有沒有搵朋友飲茶吃飯？

定下了這九個指標，我得到統計處的協助，隨即進行全港住戶抽樣調查。訪問時採用的問卷，除以上九個項目外，還有住戶的特徵、就業和收入等基本資料，還包括他們對貧窮的看法。調查成功訪問了約八百個住戶，規模算是大型的了，所得數據足夠統計分析。

調查結果顯示：貧窮人口共 741,746 人，佔 1981 年全港約五百萬人口的 14.9%。七十萬多窮人，數目是多是少？我自己不會作定論。當時有意見認為，以生活方式量度貧窮，有欠科學依據，但這次調查得出來的數字，與日後用其他方法計算窮人的數目，實際上相差無幾，又怎可說這次用的量度方法不科學？

調查報告發表後，引起社會人士不少討論，連無線電視播放的連續劇《香港八二》，其中一集也以此為題。說黃允財飾演的男主角想要結婚，女方家長聲言，黃允財家裏必須配備電視機等物品，否則勸喻女兒不要嫁他，免得「餓死老婆薰臭屋」。這是挖苦的說話，但反映了在八十年代，市民再不以「食不飽、穿不暖」來形容貧窮，而是看一些代表生活水平的家居設備和生活習慣。

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我採用生活方式來量度貧窮，好處是可以生動地描述窮人的生活狀況。猶如五十年代時，單是一句「無瓦遮頭，無錢開飯」便道盡了窮人的困難。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已是小康社會，窮人的生活，相信一句「他窮到連利是也派不起」，也可概括窮人面對的冷漠和嘲笑。

窮人可以不與他人比較嗎？

從八十年代到回歸前的十多年裏，香港經歷了不少波折：港幣兌換美元大起大落，中英談判衝擊港人信心，中產家庭大量移民海外，加上「六四」引中的憂慮，都令港人感到徬徨和不安。但對生活在貧窮邊緣的基層市民來說，他們最關心的，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會否因政局的不明朗而改變？他們的下一代，會否在香港前途的困局中失去教育和發展的機會？

我在八十年代初所做的貧窮研究，多多少少也對以上問題提示了答案。首先，窮人並沒有很多選擇。沒欠債已十分幸運，又何來儲蓄，港幣貶值不關他們的事，更不會移民外國；他們期盼的是穩定的生活，渴望的是自己不要與別人相差太遠：如新年時派利是，別人有得派、自己不能寒酸到無得派，雖然紅包裏的數額會少一點；別人家裏有電視機和雪櫃，他們也應有同等設備，牌子可以低檔一點；別人和親友外出吃飯，他們也應可以偶一為之，光顧的食肆當然不能奢華。總言之，自己就算是窮，也不想與別人過着有太大差別的生活方式。

窮人有這種想法，是奢求嗎？這種「人有所有」的要求，我們應該接受、盡可能去滿足？還是鄙視他們、認為這是「貪得無厭」？我很難下定論，只覺得隨着市民生活的改善，我們對貧窮的看法也應有所轉變。我的調查報告發表後，隨後也有不少關於窮人生活的調查，有些也採用了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例如，八十年代的年輕人喜歡穿着新穎的運動鞋，有報道青年人為了得到一雙名牌運動鞋，不惜做違法的事。這種違法行為，為的只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當時社會上有不少議論，有意見認為：如果家窮買不起名牌運動鞋，青年人不應與別人比較，廉價的「白飯魚」（帆布鞋）一樣可以穿着來做運動；亦有意見認為，青年人自尊心較強，不想被同學看扁，別人有的東西，自己怎可沒有？為什麼貧窮就會給別人看不起？

當日「麥當奴」漸趨普遍，有調查顯示，窮家孩子多想父母帶他們去嘗嘗漢堡包的滋味。小孩子真的很想吃漢堡包？我看不一定。小孩子看見同學成群結隊光顧「麥當奴」，自己卻回家吃麵包。他們心裏會怎麼想？怨恨自己家窮、父母無錢給他們到「麥當奴」？還是想自己雖然吃不到漢堡包，但不至於捱餓，所以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希望小孩子有骨氣，不會因家窮而感到挫敗，但在現實世界裏，誰能不與別人作比較？或堅守自己的原則和理想？大人做不到，何況是小孩子？批評別人很容易，但多少人真的做到安貧樂道？

香港人常說：「人比人，比死人。」說話不無道理。傳統智慧也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們若能凡事知足，物質匱乏當

然不足掛齒，但多少人可以離群獨處？我們總要和別人生活在一起。人是群居的，自然會互相比較，各人或有不同的喜好，但當人人都覺得一些物品是生活所必需時，自己沒有，就不是喜好的問題，是貧窮的後果。我做的調查發現，人性並不想認窮，承認自己貧窮的感覺並不好受。

1986年，有一次出席「社會福利發展五年計劃」的檢討會，討論的是公援應否調高兒童補助的金額。會上，我用了一個親身看見的例子來說明金額應增加：我經常到灣仔的摩利亞山泳池游泳，看見三五成群的中學生，游泳完畢從泳池出來，他們駐足泳池門口的小食檔，喝汽水，還買一兩串魚蛋吃，花費十元八塊。我在會上指出，如果有領取公援的學生，他們沒有餘錢花費，泳畢後會怎樣做？是先離開不與其他同學一起走？還是坦白的對同學說自己沒有錢？我希望公援的孩子誠實的對同學說真話，但青年人有沒有這個勇氣嗎？如果我是他們，我會說假話來掩飾家窮的事實。

富裕與貧窮——觀點與角度

到了八十年代，富裕和貧窮很多時變成觀點與角度的問題，難有絕對的標準。1986年，房屋署建議公屋居民若收入超過某一限額，應提高他們繳交的租金。社會人士稱這些住戶為「富戶」，但公屋居民屬低下階層，怎可算「富有」？極其量是收入有改善。我當時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香港人對貧窮的看法，節錄如下：

什麼是富有？什麼是貧窮？這是千古以來爭論不休的題目。去年房屋委員會提議對富裕住戶減少資助和增加租金時，曾對富裕一詞加以界定，但即引起不少異議。是否全家的收入超過某一限額即稱為富戶？相信分界線無論訂在哪一水平，都難得到大多數人士的同意。其實，稱這些收入較高的住戶為富裕也不恰當，一來在香港整體收入的分佈中，他們未必真的富有，二來把住在公共屋邨的居民劃分為富裕和不富裕，對兩者都不會有好處。房委會的建議，目的只是希望收入已有改善的住戶多付一點租金，這樣便直接稱這些為收入較高的住戶，也不用冠以什麼富裕的名稱。另外，如果建議只是關乎租金的問題，那麼反駁的，也應集中在這個問題上，而不應為看富裕一詞而大做文章。

至於貧窮，如果以街上乞巧的數目作為標準，則實在太無知了。香港不是沒有乞巧，但只要生活過得去，或只要還有一點辦法，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無恥到出來行乞。事實上，自一九七一年政府設立現金形式的公共援助以來，申請的人一向不多，而合資格領取援助的，不是年老無依無靠，便是患有病症或身體殘缺，那些有工作能力的，只要有人肯僱用，多數不願長期倚賴政府的救濟。

在一般香港人的觀念中，貧窮並非是可恥的，特別是上一輩戰後來香港的，除了少數人外，哪個不是兩手空空，但經過了多番奮鬥，這些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而香港也從一

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難民窟」，慢慢變成一個充滿活力、欣欣向榮、並在亞洲區數一數二的工商業城市。香港雖然有今天的富裕，但對於戰後來港奮鬥的人來說，五十年代的舊像還是不會忘記的。

香港新生代無疑把貧窮忘記了，物質的豐裕使年輕人以為香港從前便是這樣。隨著經濟發展，吃不飽和穿不暖的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但上一代那些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努力不懈的精神，看來也隨着時代變遷而消逝。對年輕人說，他們所關心的，已非基本衣食是否足夠，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如何才可追上潮流，並不至被別人比下去。事實上，物質愈是豐盛，年輕人愈是不能捱窮。上一代不認為貧窮是可恥的，因為他們多曾經歷貧窮的滋味；但當大部分人都得到相當高程度的物質享受時，貧窮便不是必要了。因此，年輕人對貧窮的反應可能比上一代更敏感，他們不但不能捱窮，他們甚至願意不擇手段，去擺脫貧窮的困厄。

香港人對貧窮的觀念，無疑在急劇轉變之中。香港人雖不至「笑貧不笑娼」，但貧窮已成失敗的象徵；很多人不願承認自己窮，並非他們收入比別人高，而是他們不願在別人面前承認「軟弱」，或自己經濟能力及不上他人。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裏，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況且，除了物質的標準外，香港也缺乏其他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尺度。

時代畢竟改變了，成功人士雖非腰纏萬貫，但貧窮的人，則肯定不會在香港有什麼成就。當然，這種觀念並不正確，但缺乏經濟條件的人，不論他有多少天分，相信也難在香港有發展。這種情況，可能並非香港獨有，但在一個缺乏高尚理想的社會裏，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

現時香港社會，貧窮無疑被繁榮遮蓋了，何況誰有興趣把燈泡搗出來。至於貧窮的人，他們既是社會的失敗者，除了默默接受命運的鞭撻外，哪有勇氣挺身出來要求社會更多幫助。這樣，香港便只有繁榮和穩定，貧窮的人既不會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大多數人也樂於不提他們！

上述言論或許有點偏激，但可看到市民不再為基本生活而大費周章，他們更感憂慮的是：他們若無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生活會不好過，雖不至要領取公援，但會成為社會「墊底」的一群，被人覺得自己好食懶弄；他們得承認自己是失敗者。社會對窮人有這種印象，貧窮逐漸變成可恥的代名詞。

貧富懸殊變得醜惡

八十年代的小康社會

經過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香港到了八十年代已是小康社會，市面充滿朝氣和活力，高樓處處，地下鐵路各條路綫陸續通行，屯門和沙田成為最新發展的新市鎮。窮人當然不會消失，但需要政府援助的家庭不多。到1992年中，香港的住戶有一百六十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個案只有七萬三千宗，其中老年個案佔65.8%，共四萬八千宗，而因低收入及失業領取綜援的個案，不及四千宗。領取綜援的個案不代表全部窮人的數目，但可反映市民能夠自力更生，只要有工作，生活就可過得去。

當香港逐漸變得富裕，市民關心的事由貧窮轉向貧富之間的差距。當眾人皆貧窮，只有極少數有錢，貧富兩極化的情況不會顯著；到了八十年代，那時有一半勞動人口從事製造業，賺取的工資不會相差太遠。工廠也欠缺人手，工人生活相對穩定，大家都想着去賺多些錢，不會太介意有些人腰纏萬貫，甚至認為終有一天，他

們也會飛黃騰達，比有錢人更有錢。

同時間，我發覺像我一樣戰後出生的，少數完成中學或大專教育後，多可在政府部門或大機構任職，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事業，收入足夠他們置業安居，生活頗舒適；逐漸，香港出現了一個不需要為基本生活煩惱的中產階層。他們不用為兩餐掛手祇足，可以追求生活享受，「喝紅酒，看法國電影」。

七十年代開始，像一般中等收入人士，我和家人開始參加旅行團出外旅遊，初時去的地方，是東南亞地區的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台灣也有去，但必須申請批核，手續十分麻煩。後來有機會到日本，已是十分豪華了。香港的旅行團，看重的是吃、喝、玩、樂，參觀名勝古蹟是其次，行程就是不斷的吃、不斷的購物，難有什麼文化內涵可言，目的是盡情享樂，忘掉在香港時的苦悶生活。

當時參加旅行團的團友，並非大富大貴，只是收入增加，生活有改善，到有幾天假期便出外走走，享樂之餘，回來可向親友炫耀一番，講說自己旅遊時的經驗，不外是住的酒店如何豪華，吃的怎樣特別。香港人有錢出外旅遊，可見市民多已擺脫了窮困，開始為自己的生活添點歡樂和色彩。

參加旅行團的有老有幼，很多是全家人一起去的。我常看到的是，子女長大了，出來工作，有點積蓄便安排與父母一起旅遊，表示自己對父母的孝心，也是對父母說：自己長大了，可以獨立了。

其實，他們的父母年紀一點也不大，只是五、六十歲，多是戰後來港的難民或他們的子女，來港後一生工作，一次也沒有出外遊玩，最終看見兒女長大，在安穩的環境中成長，難得有機會一家出外旅遊。

階層分野變得顯著

到八十年代中，香港的階層分野變得明顯：社會上約有三成人口需要倚賴政府的公共服務，如公共房屋和廉價醫療，方能維持基本生活；其餘三分之二可以自給自足，只要家人齊心，全家收入足夠置業安居。香港也出現了一些非傳統家族的富有商人，他們白手興家，戰後來港時兩手空空，但經過二、三十年的奮鬥，搖身一變成為富甲一方的大企業家。這樣的例子，過去有不少報道，不在這裏多敘述。

我認識的人中，也有白手興家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有親戚隻身逃難來港，他剛二十歲出頭，初時在五金店做學徒，工作時間又長又辛苦，因沒有家人，晚上在店舖留宿。幾年後，他技術熟練了，收入增加，自己也成家立室。到了六十年代中，他自立門戶，用積蓄開了自己第一間店舖，專門做飾物，後來店舖變工廠，訂單源源不絕，生意愈做愈大，到八十年代，這位朋友已是社會上略有頭面的廠家。

香港逐漸變得富裕，除了少數由於年老和殘疾必須倚靠福利

援助外，香港是否還有窮人？貧富懸殊為何成為社會關注的課題？1992年11月，我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貧富懸殊與社會公平〉的文章：

最近接受一間英國電視台的訪問，記者劈頭一句問：「香港人衣著光鮮，走在街上的都是名貴房車，吃的盡是各國珍饈百味，香港是不是沒有窮人？」我呆了一會，腦海裏浮現着香港的繁榮景象，隨即回應說：「香港哪會沒有窮人！你看不到我以千計無立錫之地的『籠屋』居民，十萬名領取公共援助的貧困人士，五萬名在勞工短缺情況下仍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士嗎？」

記者追問：「香港既有不少以億萬身家的富豪，亦有萬計市民收入不足糊口，香港是不是一個極不公平的社會？」我再次有點語塞。說香港公平，但貧富懸殊委實令人憂心；說香港不公平，香港卻充滿機會。今天的富豪差不多全都是白手興家，得祖宗餘蔭的反多家道中落，可見香港並非不公平。我避開問題不答，只簡單的說：「以香港今天的財富，社會裏不中人士應得到更公平的待遇，我們付出的關懷還不足夠。」

最近參加的研討會，講者不約而同的指出：香港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多舉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作為證據，說明從八十年代開始，香港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香港貧

富差距擴大是意料中事：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以製造業為主，製造業工人一度佔去勞動人口的一半，而製造業工人的工資較平均，所以香港那時貧富懸殊有縮減趨勢。但自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開放，香港製造業无移，製造業工人數目現僅佔勞動人口的25%，不少工人轉去服務行業，無法轉業的只有忍受工資不斷下降的境況。在經濟轉型之際，收入分配不平均，難免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還有一點造成貧富不均現象的，就是在勞動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大陸移民。他們教育水平較低，又缺乏現代技術，只能賺取微薄薪金維持生活。香港戰後也有不少大陸難民，但那時香港經濟結構簡單，大家都是窮人。七十年代以後，情況出現改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做的研究顯示，戰後早期移民來港開山寨廠起家的大不乏人，近十多年來是絕無僅有。

香港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屬自然現象。但貧富差距到了哪個程度才值得憂心？首先，我們說貧富差距擴大，並不表示貧者「食不飽、穿不暖」，或他們的生活愈來愈差。整體而言，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仍不斷改善，只是些人的收入以一倍或兩倍的幅度增加，一些人卻只有輕微改善，或今年加了五個百分點，下年減了三個百分點。其次，香港貧富差距雖不斷擴大，但一般人的生活仍有改善，所以在心理上，覺得差距並不明顯。猶如一場競賽，開跑後，慢的和

慢的差距愈來愈大，但只要大家仍在跑，慢的不會覺得自己差勁。競賽一旦停下，慢的就會發覺差距太大了。

所以，只要香港經濟仍不斷增長，貧富差距不會造成社會震盪，但衰退一旦出現，或經濟停滯不前，貧者一定不滿，社會也必然出現不安和對抗。目前環境來說，貧富差距並未造成威脅，但政府是否可以袖手旁觀？答案是否定的。任何人都知道，香港不能永遠只繁榮而沒有衰退，貧富差距若造成無法填補的鴻溝，衰退引來的社會震盪便十分厲害。或許香港不會出現如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大革命的情景，但七十年代中衰退帶來的治安不靖，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忘記，那時女士不敢單獨外出，男士夜間走在街上也心驚膽跳。

不過，政府是否有責任縮減貧富差距？這是公平的問題。香港要成為安居樂業的社會，社會裏必須有眾人認計的公平，這樣才能講人權和法治。香港無法追求人人收入平等，這種制度投資壞處多於好處，但也不應讓任何人勤奮工作仍無法養妻活兒，或罹患痼疾卻求診無門，這樣的社會太不公平！

為了公平，社會不能對貧富差距坐視不理；但不能為了平均分配財富，抹煞社會上優勝劣敗的現實。

貧富懸殊成為熱門議題

貧富懸殊所以受到關注，另一原因是政府於1971年開始計算香港的堅尼系數。堅尼系數是量度住戶入息分佈的數字。到八十年代，一些關注團體和學者引用堅尼系數上升的數字，催促政府注視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問題。有一次，我出席香港電台每逢週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城市論壇》，當日討論的正是政府應如何對待堅尼系數不斷擴大。那是1991年的時候，政府剛公佈1991年人口普查的結果，堅尼系數是0.48（0是絕對平均，1是絕對不平均），相比1971年的0.43和81年的0.45，住戶入息分佈擴大了不少，顯示貧與富的收入差距愈來愈遠。

在論壇上，有講者認為堅尼系數走向嚴峻，政府不應坐視不理，形容香港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我認為這樣的說法不太準確，堅尼系數只是量度入息分佈的情況，與窮人的數字沒有關係；即使有錢人多了，也不表示窮人的數目相應增加。正如其他大城市，香港的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僱員的收入差距較大，入息分佈自然趨向兩極化。紐約、倫敦、東京等大城市，收入分佈十分不平均，窮人的數目也不會少。但這些大城市都設有各項社會保障和福利措施，窮人不會餓死街頭，得到的援助金可以在落後地區過很好的生活。所以，堅尼系數的高低，與窮人的數目和生活水平，並不一定有關連；貧富兩極化愈來愈嚴重，也不表示窮人的生活愈來愈不好過。

堅尼系數雖非代表窮人的數目，但社會收入分佈不平均，難免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印象：市民走在街上，看見有錢人坐的房車愈來愈名貴，九十年代有統計顯示，以人口計算，香港人均擁有的「勞斯萊斯」和「賓士」房車，是全世界最多的。那個時候，傳媒經常報道有錢人的消閒生活，高不可攀的消費令市民羨慕之餘，心裏不禁要問：為什麼這些人這麼有錢？吃一餐飯的消費多過他們一個月的糧？公平嗎？

1993年6月，時任立法局議員的馮檢基，在會議上提出動議：促請政府正視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及要求政府提出應對的措施。馮檢基的看法是，香港的經濟雖有增長，但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顯示基層市民沒有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得來的好處。政府的回應也成為日後的標準答案：就是政府的責任在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即政府經常指的「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而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無意也無措施縮窄貧富差距。

八十年代開始，貧富懸殊一直是社會上糾纏不清的議題：一方面，傳媒不時報道香港有多少個商人打入世界富豪榜列，有多少「打工仔皇帝」年收入以千億元計；另一方面，新聞常常報道有多少市民生活貧困，居住環境如何惡劣，多少老人以拾荒維持生計。回歸前夕，有外國傳媒找我做訪問，問的是街上走的是名貴房車，基層市民的生活並不好過，香港是怎樣的社會？我引用了1995年8月在一次討論「中國現代化」研討會上對香港貧富懸殊的發言作為回應，節錄如下：

香港貧富不均，相信不會有人異議。香港作為經濟開放的社會，貧富不均屬正常現象，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動力。因此，問題並不在為什麼一些人有錢、一些人貧窮，而是：為什麼在六、七十年代，香港收入分配情況較平均，但到了八、九十年代，情況卻轉趨惡化，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香港政府是否有責任收窄貧富差距的幅度？

對於香港貧富差距擴大，財政司的回應是堅尼系數並不是準確的量度方法。財政司認為香港市民於公共房屋、醫療和其他福利設施等方面得到的協助，並不能在堅尼系數中反映出來。財政司的解釋沒有錯，堅尼系數只分析住戶的收入分配，把最低收入至最高收入的住戶按序排列，由此計算差距的幅度；至於住戶的實際開支情況，及他們的生活水平，並不是堅尼系數可以反映的。不過，政府卻迴避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也就是香港的收入分配為什麼差距愈來愈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也許是相對的現象，但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官員，財政司不應視若無睹！畢竟貧富懸殊，對社會的穩定有負面影響，政府怎可不關心？

收入分配不均，不一定是壞事，只要全港市民的生活有改善，部分人士收入較多應可接受。不過，香港近年卻出現兩種特殊的情況，使貧富差距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一是，樓價急升使財富高度集中。八十年代開始，受過專門訓練的推銷轉向服務業，愿可增大中產階層的數目及他們的收

入，但樓價上升，把他們收入的主要部分轉移到極少數富有人士手上，結果是財富高度集中，中產階層無法享受收入改善的好處。第二是，新移民增加造成低收入階層無法減少。新移民本身並不是問題，但他們多從中國農村或鄉鎮來港，教育水平低，也多無一技之長，來港後多只能找到低薪工作。新移民佔香港人口增長重要部分，他們所得收入偏低，貧富懸殊現象只會惡化，不會改善。

經過三四十年的經濟增長，到了回歸前，市民每天見到的，盡是富豪奢華消費的報道，樓價瘋狂上升，物價如脫韁之馬，以雙位數字增加。這種繁榮景象是真實嗎？市民心裏十分迷惘，覺得繁榮或許是虛假的，是中英雙方都不想香港在回歸前經濟陷入衰退而製造出來的假象。

虛假與否，繁榮卻令財富高度集中在小撮富人手裏：樓價上升，誰得益最大？股市攀上高位，賺錢的是依賴股票收息的老人家，還是操控股市大上大落的炒家？結果，香港的整體收入和財富都增加了，但富人和窮人，差距愈來愈大。貧富懸殊顯得愈來愈醜惡。1997年回歸前，香港仍未浮現明顯的仇富現象，但市民眼見的是：社會充斥不公平現象，怨忿逐漸加深。

97年窮人的生活

轉回窮人的生活。1997年1月，我在報章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貧窮家庭生活實況和成因〉，節錄如下：

當我提到一些關於香港貧窮現況的數字，碰見的朋友多表驚訝，認為香港近年經濟發展穩定，一般市民的生活不斷改善，為什麼在社會裏仍有數十萬計窮人？一些認為是激進團體故意把數字誇大，逼政府提高綜援金額；一些則認為，問題在乎貧窮的定義，每人每天二十元的食物費用看似不足夠，但一家四口，每天八十元，應可維持基本生活。此外，熟悉綜援金額的朋友都有一個疑問：這些貧窮家庭若申請綜援，一家四口包括租金在內每月金額超過一萬元，如果他們住在公共屋邨，除去租金還有七、八千元，應付基本生活綽綽有餘。他們為什麼不申請，卻甘心以微薄收入生活在「赤貧」之中？最後，很多朋友都問：致貧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想在數字上糾纏，還是就自己觀察所得，感性地看看香港窮人的生活，及什麼原因導致這些市民生活貧困。到1996年底為止，領取綜援的個案超過十六萬，是前所未有的最高數字。十六萬綜援個案中，因年老原因申請的佔百分之六十，人數超過十萬。香港六十歲以上人口約八十五萬，即是說，八個老人有一個是窮人。除了領取綜援的老人外，是否還有其他老人也生活貧困？答案應是有的，但確實數字無法知曉。

香港為什麼有這麼貧窮老人？答案十分簡單，是政府過

去犯了一個極大錯誤，遲遲不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沒有退休保障制度有什麼後遺症？以下是一些有血有淚的例子。五十年代初，香港人口驟增一百萬，多是二十歲出頭的男子漢，從大陸走到香港碌碌運載。這些年輕力壯的男士，對香港早年的工業發展有極大幫助。提供廉價勞動力外，也使香港整體人口年輕化了。不過，四、五十年後，這一批戰後來港的男士，有家室的總算有子女支持，但部分仍是孤家寡人，起初收入不錯還可以自給自足，後來體力不繼，收入下降，從租住房間，到與別人合租，最後入住「籠屋」床位，生活也只得倚賴綜援的支持。這些貧窮老人為數不少，一些就是育有子女，但子女若收入有限，單是應付自己的生活已十分吃力，怎有餘錢滿足年老父母的要求？「打工仔」平日儲蓄不多，政府沒有退休計劃協助他們早作綢繆。到了晚年，怎會不窮？況且香港人的壽數愈來愈長，退休後的悠長歲月，對貧窮的老人來說，日子實在不好過！

除了老人外，現在領取綜援的個案中，因失業原因的有一萬四千、低收入的一萬二千、單親家庭的一萬二千。這總數差不多三萬個家庭，貧窮的成因是收入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三萬個綜援家庭中，其中不乏新移民家庭。我去年做了一個關於新移民的調查，接觸了一些新移民。其中一家，丈夫剛過五十歲，過去在酒樓工作，月入七、八千元。1989年時，他返回內地娶妻，生有兩個子女。過去他把薪金的一半交給太太，妻子在內地養育兩個子女，有幾千元生活費已相當滿

足。丈夫在深水埗租住板間房，生活勉強可以應付，一有假期，返回內地共聚天倫之樂。去年初，妻子和兩個子女成功申請來港，問題立即出現，首先須租住大一點的房間，才可容納一家。不幸的是，丈夫工作的酒樓生意大不如前，維持到年中轉手經營，原有員工被迫離職，按法例領取遣散費。這家即時陷入困境，唯一維持生計的辦法是申請綜援。現在這個家庭每月領取的金額一萬多元，但租金支出是三千多元，七千元的生活費不算充裕，但比之丈夫過去賺取的多，所以也沒有什麼怨言。

以上這個重為例，香港這類家庭的數目正日漸增多，主要是家庭負擔較重，一家四口的衣、食、住、行和兩個孩子的開支，每月沒有一萬元是不行的。不過，香港現有工資中位數是九千五百元，每月薪金五、六千元比比皆是，以這個數目怎可養活一家人？這是香港面對的最嚴峻的社會問題。如果貧窮的人沒有工作能力，一如以上提到的退休人士，或生病和傷殘的，社會照顧他們理所當然，以香港現有的富裕程度，也是義不容辭。但香港現在有些窮人，並非他們沒有工作能力，只是一些從事的行業式微，二、三十年積累的工作經驗化為烏有；一些剛從內地來港，完全沒有適合香港要求的技術和知識，只得接受微薄工資，收入不足糊口。

這就是香港的貧窮現況！六十多萬窮人的數字或許有點誇大，但正在領取綜援的二十五萬卻一點不花假。香港二十

個人中有一個窮人，數字是多或少，見仁見智；但社會人士必須承認的是，在香港這個富裕社會裏，貧窮並非虛假現象，也非學術上抽象的概念。窮人就是窮人，沒有政府的支援就無法生活；窮人的生活也絕不好過，拿了政府的援助金，每花一個錢也要思量，這樣捉襟見肘的生活非一擲千金的富人可以想像。

香港確實有窮人，而且窮得要命。無論什麼原因導致他們貧窮，社會不應對他們置諸不理。

以上文章，總結了回歸前香港的貧窮面貌。不過，這樣的描述並沒有跳出香港的地域範圍，有欠完整，看不到相對於世界其他地方，香港是否已沒有貧窮？

繁榮背後的陰暗

1995年3月，聯合國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第一屆社會發展高峰會議，出席的代表來自世界每一角落，單是簽署宣言的國家有一百二十多個，包括美國副總統、德國和中國的總理。會議討論的議題，綜合傳媒的報道，我寫了以下文章，有助明白香港在貧窮問題上所處的位置：

這次大會雖命名為第一屆社會發展高峰會議，但聯合國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組織，早於六十年代初討論社會發展

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關注焦點由以經濟重建為首要任務，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物質生活較前豐裕，但增加的財富並未如想像的從社會上層滲透到下層（Trickle-down），富者較前更加富有，而貧者生活雖有改善，但與富者比較，收入和財富的差距卻愈扯愈大。隨著戰後國家重整的團結精神逐漸淡化，貧富懸殊引起的社會矛盾轉趨熾熱，很多國家的政府發覺不能對危害社會安定的動盪袖手旁觀。

聯合國曾把六十年代的整整十年訂為發展的年代（Development Decade），其後更把促進社會發展的工作延長十年，但這二十年內推動的計劃，對一些落後地區雖也帶來一點希望，但整體而言，貧窮仍是眾多國家的頭號敵人。而貧窮解決不了，文盲、失業、娼妓等問題也難有改善的答案。七十年代，聯合國曾警告各國不應把發展看成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應視發展為綜合的過程，是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等多方面整體的改善。聯合國雖然苦口婆心勸喻各國，但聽者藐藐，一些生產力仍有待提高的國家，認為只有生產數字不斷提高最重要，至於財富如何分配，怎樣不損害環境又可推動經濟發展，或如何避免大量農村人口湧向城市等不平衡現象，都看作是次要的。在一些政治不穩定的地區，執政黨多認為如無法在短期內改善經濟，或有倒台危機，哪會理會經濟發展會否帶來惡劣的社會效果。

這次聯合國社會發展高峰會議討論焦點，與六、七十年

代討論的並沒有分別。圍繞一個星期會期的討論，離不開削減貧窮的主題。或許是，今天地球上過半國家，貧窮情況不但沒有改善，且有變本加厲的跡象。以地區而言，東歐仍有百分之七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東亞是百分之十一，中南美是百分之二十三，非洲除去南部是百分之三十三，南亞是百分之四十九。香港地處的東亞，貧窮情況不算太嚴重，但人口稠密，百分之十一貧窮的人，總數即以億計。以中國為例，貧窮線是人均收入每年三百元人民幣，現在低於這水平的約有八千萬人。南亞窮人的比例最高，在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家，兩個人中差不多有一個是窮人。窮人這麼多，可見這些國家扶贫工作十分吃力；也因為窮人太多，見怪不怪，這些國家也不當貧窮是怎麼一回事。

除貧窮問題外，聯合國這次召開的會議還對發展訂立評核的準則，包括失業率、工資水平、侵犯人權記錄、貧富懸殊情況、軍事開支等。按照以上指標，世界上很多富強國家雖然物資豐盛，但社會發展上卻顯得落後。以西方一般工業發達國家為例，赤貧不再是問題，但經濟結構轉型的結果，是失業率偏高，長期無法解決。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保障成為國家沉重的財政開支，而高稅率進一步削減受薪者的工資水平，如這些國家必須在軍事上維持強勢，社會發展難免停滯不前。美國和英國是其中表表者。

回頭看香港，赤貧基本上不再存在。政府給予窮人的綜

合援助金雖有待改善，但領取者絕不會兩餐不繼。不過，香港也不是沒有窮人，年老無依者是一類，而近日申請援助的家庭，亦有不少來港不久的新移民，他們子女數目多，家庭收入多偏低。此外，香港經濟逐漸出現西方工業社會面對的問題，即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失業率慢慢向上調升。還幸，香港不像其他國家必須自擔龐大的軍費開支，但在貧窮懸殊方面，因政府無意透過社會福利重新分配財富，形成高低收入人士差距十分大。結果是，香港社會表面十分平靜，但內裏矛盾重重。

面對世界上的貧窮狀況，社會發展高峰會議達成的宣言雖有十項承諾，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對策。極其量，聯合國可以呼籲工業發達國家多提供援助。但從過往經驗看，只有挪威、瑞典、丹麥等北歐國家，為貧困地區提供超過本身生產總值百分之一的援助，其他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數額只佔生產總值百分之零點二至四，數字少得可憐。深一層看這些援助又發揮了什麼作用？一些國家拿了這些援助去購買軍火，一些中飽私囊，得益盡是貪官污吏，不但窮人得不到些微好處，且有權有勢的人更張跋扈，無權無勇的反倒受到壓榨。

聯合國把一九九六年定為「摒滅貧困年」。因此，這次社會發展高峰會議的討論，並不會因會議的結束而停止。到了明年，國際組織多再召開會議討論貧困問題，或許可以得出一些實質改善貧困人士生活的辦法。在香港，誰是貧困者？

是否提高了綜援金額便不再有窮人？什麼是有效的扶貧方法？是否搞一、兩次慈善濟貧活動便算有所交代？

1996年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消除貧窮年」。那一年，香港政府作了怎樣的回應？社會福利署於1995年檢討綜援金額的水平，翌年發表報告，建議全面及大幅度調高綜援金額的數目，特別是成年受助者，金額增加一半。綜援金額提高了，政府預期合資格領取綜援市民的數目也會增加，正遇着政府正編制九六至九七年度的財政預算，而因涉及過渡期，香港政府也必須把預算案提交中英聯絡小組審議。記得當時中方的代表之一是陳佐洱，提交預算的是負責庫務的鄭其志。陳佐洱在會上批評香港政府這樣大幅增加福利開支，猶如在高速路上駕駛着一輛名貴跑車，最後必「車毀人亡」。陳佐洱的批評是否有道理？我當時作了一些評論：以增加的幅度來說，一下子增加這麼多，確實令人感到意外，也難怪引起疑慮，但綜援金額水平偏低是事實，提升也有必要。我這樣的評論有點模稜兩可，明顯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中英雙方互不信任，我根本不知道他們言詞背後的目的，所以只能就自己所知的事實回應。

香港在過渡期間出現的各種現象，很多都令市民感到憂心和疑慮。表面上看，香港不失為繁榮的城市：市民衣着整齊光鮮，處處高樓大廈，交通先進流暢；以國民生產總值計算，香港更是亞洲區數一數二的大都會。不過，在繁榮的背後，市民是過着怎樣的生活？我希望本部分描述的，對香港從八十年代初到回歸前的十多年裏所經歷的一切，能作點補充，也是本書寫作的目的。

過往，我也有些機會到世界各大都市，發覺五光十色的繁華背後，無一例外的總隱藏着陰暗和漆黑的一面。所謂的陰暗和漆黑，並非城市中的橫街窄巷，或大城市裏總會有的非法勾當；我要講的是，大都市裏人們聽見和看到的，常限於一些成功的事例，如回歸前的幾年，報刊有不少關於有錢人如何「發跡」的報道，富豪也喜歡找文筆好的記者替他們撰寫傳記。

不過，成功例子背後，人們有沒有想到：多少市民辛勤工作，賺的僅足糊口？多少命運坎坷，奮鬥一生卻失敗收場？多少因心理和情緒的缺失鬱鬱不得志？多少遭遇不幸潦倒終生？當我們的目光只集中在少數成功的富人，就難免忽略了眾多無法攀升向上的「平庸」市民，及眾多被燦爛輝煌景象掩蓋的窮苦大眾。這就是我講的陰暗和漆黑。城市裏沒有被光照射的地方。

回歸前的一年，市民的心情確實有點亢奮，好像一切都會朝着好的方向走，暫時忘卻回歸後可能出現的風浪，也不顧股市和樓市的瘋狂所造成的泡沫和虛幻。「九七」過後，香港重新面對忽略多時的經濟和社會矛盾，遭受的挫敗就可想而知。完結這部分之先，我還要總結兩類在八十年代最受市民關注的窮人，他們是：無依無靠的老人及新來港定居的內地居民。

老年貧窮與奉養父母

1981年，我完成社署委託的貧窮研究，結論是香港市民中，

有兩類窮人最需要關注：一是孤獨無依的老人，二是子女眾多的低收入家庭。第二類貧窮家庭的數目正逐漸減少。在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大力宣傳下，年輕夫婦已減少生育兒女；外國經驗也證實，經濟一旦穩步發展，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提高，他們也不想多生孩子，醫學昌明也使嬰兒夭折率急速下降，夫婦不用多生子女作保險。

相反，老年貧窮卻是香港未來面對的大問題。1982年，聯合國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世界老年會議」(World Assembly on Ageing)，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類有國家和地區的官方和非官方代表出席的會議，參加的人數超過一萬人。大會用了東方人非常熟悉的榕樹作為大會的會徽，榕樹和老人可說十分配搭。小時候，我從灣仔修頓球場的家到跑馬地景光街上學，沿途經過皇后大道東，灣仔街市附近種有幾棵大榕樹，常常看見老人坐在榕樹下乘涼，附近有孩子在玩耍。這樣的情景，現在不再有了。連灣仔街市也只是沒有靈魂的軀殼。

會中，有大大小小關於老人的專題報告，醫學方面的新發現我聽不懂，如何護理老人的知識我是一知半解。最能激發我研究興趣的，是家庭制度的轉變與老人照護之間的關係。其中涉及我們的倫理價值觀。我從會議回來後，決定在社會保障和貧窮問題外，還會選擇社會老年學作為我的研究課題。所以，1983年當我從中文大學轉到香港大學任教時，我利用暑假的幾個月，到了日本東京的東京都老年研究所(Tokyo Metropolitan Centre of Gerontology)做訪問學人，與所內的研究員交換研究心得(研究員一般懂英語，否則

無法溝通，我並無日文基礎），並在他們介紹下，參觀了東京市內各項老人護理措施。日本早於六十年代踏進人口成熟期（65歲人口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七），所以在老年學方面的研究並不比歐美遜色。我在研究所逗留時間短暫，但得益良多。

八十年代間，我做了幾項與長者生活有關的調查，其中一些發現令我感到鬱悶，就是香港雖保留了傳統有關長者的觀念，如認為「孝」十分重要，及子女有奉養年老父母的責任，但實行起來，卻不是講的那回事。被訪長者常慨歎說：「子女是有心的，只是有心無力。」在課堂上，當討論到子女應否奉養父母時，我常問同學們兩個問題：一是，他們是否覺得有責任奉養父母？二是，到他們自己年老時，他們會否期望子女奉養他們？對於第一個問題，同學們多覺得有責任，但到了第二個問題，表示有期望的只佔少數。換言之，奉養父母的觀念在同一代人有兩種看法：他們認為自己有奉養父母的責任，卻不期望自己的子女對他們有相同的對待。

1970年，我出來社會工作，拿到薪水後，除必要使費外，全數交給父母，覺得理所當然。到八十年代，學生對我說，他們會先考慮父母的需要，然後決定交給父母的數目：如父母有足夠收入應付開支，他們只給他們象徵式數額，作為孝順父母的表示。到回歸前後，學生對我說，他們很少每月給父母金錢，只在重要節日，如父母慶祝生日，他們會請父母一起外出吃飯，或送他們禮物，他們已覺不錯的了。父母也認為他們孝順。

孝順行為的轉變可以理解，但令我感到憂心的，是在調查訪問中，老人一般對老年生活感到十分灰暗，尤其是低下階層的長者，他們多認同「年老就是等死」，何等可悲！我看到這樣的調查結果，心裏疑問：為什麼老人對生活這樣悲觀？如果他們有子女，做子女的為什麼不好好照顧他們？我當然明白，在香港這樣競爭激烈的社會裏，為人子女的也有他們的困難，但他們可令父母開心一點嗎？傳統的孝道去了哪裏？孝的觀念是否需要另一番解釋？

年老是否「等死」？

首先，老人不快樂，多少也與貧窮有關係。為什麼市民到了老年，就要面對貧窮的威脅？香港人口的數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五十年代初，增加了二百萬人，其中有幾十萬原先在香港居住，香港淪陷時逃往內地，戰爭結束返回香港。其他一百多萬，用今天的說話，全是新移民，大多攜男帶女來的，我的父母屬這一類，也有不少是孑然一身，因不知在香港能否找到工作，所以沒有與家人一起來港，只好分隔兩地，怎會想到這樣分隔卻是相舉無期。

戰後來港的二百萬難民，二十至四十歲的成年人佔絕多數。到了八十年代，離開戰爭結束已有三四十年，三十歲來港的，現在六七十歲，年紀大了，生活怎麼過？有錢的，或子女學有所成的，生活當然不用愁，但那些孤家寡人、平日賺錢不多、或要匯錢接濟內地家人和親友的，如今退下來，自己身無長物、家徒四壁，日子怎麼過？所以，公援個案中，六七成以上是長者家庭，也多在港無

親無故，唯一賴以維生的就是申請公援。

造成老年貧窮的原因，還有一點不可忽視的，那就是價值觀的轉變。戰後來港的大陸難民，持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生兒育女，愈多愈好，所以有六、七個子女十分平常，三、四個是少數。那時，沒有有效的節育方法，生多生少並非自己能夠控制，就算自知沒有能力養育孩子，也推說「天生天養」，或把孩子送給別人。在父母眼裏，多生一個孩子，有時就只是吃飯時多擺一雙筷子，待孩子到十歲八歲，還可出來工作賺錢養家。

戰後來港的難民，到他們年紀大了，才開始想起退休後的生活。傳統觀念是父母養大子女，到他們年老時，子女便應奉養他們，所以多生兒女，是保障晚年生活的最好辦法。到了八十年代，這種觀念仍存在嗎？

我在八十年代做的調查，發覺市民仍相信「孝」是重要的，也盡自己的能力支撐父母所需。不過，經深入分析後，發覺年輕人對「孝」的看法，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第一，傳統上是「百行以孝為先」，但年輕人並不認為「孝」有凌駕性的地位；換言之，年輕人如果有自己生活上的追求，他們會把這些追求放在奉養父母責任之上。當時，年輕人掛在嘴邊的是「四仔主義」：盡快結婚、生子，擁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子。要達到「四仔」的目的，年輕人賺的錢已不夠用，怎有餘錢「孝敬」父母？我問他們：只花錢在自己身上，不理會父母的需要，心裏是否有內疚？我驚訝的是，年輕人的反應

是，他們心裏也覺得不好，但要自己犧牲，又覺得不願意。總言之，心情十分矛盾。

另一發現是，年輕人一般不願意與父母同住。我訪問的年輕人，年齡約二、三十歲，是戰後出生成長的一代，也就是今天講的「60後」：他們沒有在大陸生活的經驗，接受的是香港有異於內地的文化和觀念，包括：個人須有自由、家庭不再佔首要的地位。為了追求個人的自由和活動空間，子女長大後成家立室，除非沒有經濟能力，否則他們會選擇建立自己的家庭。不願與父母同住。這種觀念上的轉變，間接促使更多老人生活貧困。因成年子女離開了，開支增加，給予父母的金錢也相應減少；而子女搬離後，沒有子女的一分，父母家中開支，全由自己負責，一旦儲蓄用盡，生活艱苦可想而知。

近來政府常提出警告，說人口老化是香港未來發展面對的最大挑戰。其實，人口老化早在八十年代開始了。我做完幾項關於老人的調查後，除關注退休保障計劃外，更提醒政府，家庭照顧長者的功能正迅速減退，政府必須增加照顧長者的社區設施，更應明白長者不一定與子女同住，他們也不願入住安老院。無論如何，八十年代開始，貧窮是老人的頭號敵人，照顧長者的生活也成為政府福利開支中最大的項目。老年貧窮的問題一直延續到現在。2013年9月，重設的扶貧委員會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五成劃分為「貧窮線」，並計算貧窮人口的數目，其中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有三十四萬，約是老年人口的33%，可見老年貧窮十分嚴峻。

新移民來港攞福利？

另一類在八十年代浮現的窮人，是今天所稱的「新移民」。香港是移民組成的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樣，大戰後也是這樣，那些稱為「原居民」的，何嘗不是數百年前從中原逃難落腳香港的新移民？所以移居香港從來並非罕有。在八十年代前，沒有人用「新移民」一詞，用的是「大陸難民」。

1980年，政府取消「抵壘政策」，在此以前，除了少數獲准探親或公幹而最終在香港定居的移民外，其他都是攀山越嶺偷渡來港的。既是偷渡來的，怎會稱他們為移民？什麼是抵壘政策？我當初也不太明白，只知早上經過金鐘地鐵站時（即今金鐘站停車場上蓋的空地），常見一百幾十人排隊等候，他們都是成功進入市區（抵壘）的偷渡者，待人民入境辦事處開門辦公，他們隨即入內登記，可獲准在香港逗留，連續在香港住滿七年可申請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輪候的人群，有時幾十人，有時一二百人，一年積累的數目便有數萬人，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陸偷渡來港的人愈來愈多，這樣下去，香港豈不「陸沉」？政府於是取消抵壘政策，並宣佈以後每天安排七十人從內地來港定居。從此以後，社會用上「新移民」（new immigrant）一詞，而對付非法入境者（illegal immigrant），政府採取的是「即捕即解」的政策，就算成功偷渡進入市區，非法入境者不可在香港居留，即時被遣返。

我與新移民的接觸始於1983年，當時我被委任為人民入境審

裁處的審裁員。直到1991年。審裁處做的是什麼？政府雖「即捕即解」非法入境者，但他們有上訴的權利。只要證實自己在香港出生或曾在香港連續居住滿七年，他們便可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審裁處的工作是聽取他們的上訴，審閱他們提交的文件，並按事實作出判斷，決定上訴人是否有居港的權利。審閱文件和其他證據時，審裁員是以事實為根據，並不涉及法律條文的解釋，所以審裁員不需要是法律界人士，但後來上訴人常提出「司法覆核」，審裁處改由退休法官擔任總審裁員。

我在審裁處工作的時間，是我出任公職中最多的一項。香港雖每天容許七十五人從內地來港定居，但那時內地與香港的生活水平相差以十倍計，一個普通工人在香港每月賺三、四千元，內地工人是一、二百元，所以內地居民覺得香港遍地黃金，一旦成功偷渡來香港，做「黑工」一年半就可賺一、二萬元，返回家鄉幾年不愁衣食。結果，不少有氣有力的內地居民都想來港一試，每天被捕的非法入境者數以千百計。審裁處原先設於域多利監獄，我到審裁處聽審時，都要經過被捕非法入境者的收押所，他們排成幾排，蹲在地上接受入境處人員的審問，其中不乏年輕力壯的男士，但也有年齡二、三十歲帶着孩子的婦女。我不禁心裏問：男的想在香港做「黑工」，女的帶着孩子來香港做什麼？

我在1997年出版的《見證香港五十年》書中，有這樣的記述：

除老人外，香港的窮人不少是新移民。八十年代中以

後，香港前途問題引起憂慮，移民外國的人數驟增，但正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前門有人走，後門有更多人湧著進來。文革結束後的幾年，即在抵壘政策取消前，約有五十萬內地居民，合法或非法的來了香港。他們只要在香港住滿七年，即可成為永久居民。這五十萬新移民，男性佔多數，年齡多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他們在香港安定下來，在內地有家室的，想盡千方百計申請他們來港；沒有妻子的，盡力找尋對象。不過，新移民想在香港找尋這路對象並不容易，問題並不在香港女子眼角高，只是她們在香港土生土長，一般有中學程度，在家中嬌生慣養，怎會對大陸的男士看得上眼。新來港的男士也明白這個道理，特別從農村來的，讀不了幾年書，收入有限，住的是狹窄房間，或臨時房屋區，怎可高攀香港女子，也怕別人嘲笑。

新移民在香港無法娶妻，但他們每月數千元的收入，在內地找一個合眼緣的女子，絕非難事。於是，八十年代中以後，返回內地結婚的絡繹不絕。況且，中國開放以後，就是每星期往返兩三次，不再是問題。聞說，過去十年，香港居民前往申請「寡使證」的，數達二十萬之多。這些人取了「寡使證」，是否在大陸結婚，沒有確實數字，但應在十萬以上。政府曾估計，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而擁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子孫，約有六、七萬人。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前，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並不算是香港居民。《聯合聲明》把這個情況改變了，只要父母一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在內

地所生子女，到了九七年自動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到了九七年，將有多少人從大陸來港定居？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香港與內地之間人口轉移更頻密。

看看以下一個典型新移民故事。八零年，即在「抵壘政策」取消前，一位青年偷渡來了香港，剛二十出頭。他來自惠陽。農民家庭，小學畢業後在附近鄉鎮做工。鄉鎮不少人偷渡來港，他也跟著一起偷渡。來了香港有鄉里收留，找了一份「跟車」工作，摺摺拾拾。後來到地盤，每月有幾千元收入。在觀塘租房住。他在惠陽有不少親人，八五年，他回鄉下結婚。妻子比他小五歲。結婚後，他安排妻子偷渡來港，但三個月後，因沒有身份證被遣返大陸。一年後，妻子攜剛出世小孩偷渡來港。妻子和兒子都是非法居民，幸好八七年政府宣佈大赦「小人蛇」，兒子留下，母親卻被遣返。此後，妻子兩次懷孕，都是偷渡來港生孩子，子女留下，母親被遣回。

我訪問這個家庭時，丈夫接到消息，妻子可合法來港。這自然是喜訊，但心中頗搖搖晃晃。三個子女，分別是八歲、五歲和三歲。大兒子在香港住了一年，帶返惠陽跟母親，到小學入學年齡返回香港。其餘兩個小的，出生後即把他們送回鄉下。做父親的不用費神，可專心賺錢，隔兩三星期返回內地與家人團聚。現在太太來港定居，一連串問題出現了。首先，他仍住觀塘一小房間，太太和三個孩子來了，

一家有五個人，地方住不下。他們有資格申請公屋，但最少要輪候五至七年。此外，五個人的生活費也是大問題，他收入不太穩定，地盤工作每月可賺二萬元以上，但淡季一萬元也賺不到。以前，他每月拿三數千元給太太做家用，在鄉下生活也算不錯。現在他們來了，一個牀位的租金也要一二十元，除去自己的開支，應付一家五口的生活十分困難。

過萬元收入的家庭，在香港不算是窮了，但家中有兩三個子女，又未能入住公屋，要舒適地生活並非易事。香港有多少個這類家庭？看來數目不少。這些家庭貧窮嗎？五十年代初期，香港超過一半人口剛從大陸來，十分貧窮，但那時富有人家不多，貧窮是多數。而香港百廢待興，有的是希望，只要努力，不怕沒有好日子過，心理上不會感到自卑。現在情況不同了，香港大部分人生活安定，物質豐富，新移民要「墊底」，感覺上不好受。另一方面，五十年代時每個人都在起點，差距不遠，現在明顯一些人跑在前頭，看一看自己的條件，只會不斷落後，難有追上的機會。這就是現今新移民貧窮家庭的處境。分析移民能否改善生活，最關鍵問題是家中有沒有工作成員。如有成員患病或遭遇意外，全家便會陷入經濟困境。一些新移民家庭缺乏謀生技能，只有寄望下一代有翻身之日。

以上提到的例子，男的是文革後偷渡來港，後來回鄉娶妻，所以夫婦之間的年齡相差只有幾年。1995年，我受民政署的委託，

做了一項新移民對社會服務的需要調查，發覺回鄉娶妻的，除文革後來港的一群，也有不少於五、六十年代來港的男士，他們年紀不小，但因經濟條件不好，所以從來沒有正式結婚；他們趁改革開放後的機會，返回內地尋找對象。這類婚姻與「買賣婚姻」沒有分別，夫婦之間的年歲可相差二、三十年，日後出現的家庭問題可想而知。

總括而言，返回內地結婚的既多來自基層，他們的配偶和子女一旦來港團聚，若然收入不足開支，他們便很容易成為貧窮的一群，新移民與貧窮也因此扯上關係。

第三部分

回歸後香港的貧窮

——香港人珍惜什麼？



按：第二部分圖片由霍漢華先生提供。





個人責任還是社會責任？

老年貧窮與退休保障

回歸前，貧窮是市民皆知的事實，不用傳媒報道；回歸後，貧窮沒有這麼顯著，傳媒卻經常繪聲繪色的報道，為什麼這樣？

當香港仍是由英國管治的時候，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不會太高，港督是英國政府委派來管治的，他效忠的對象是英女皇；港人的福祉當然要照顧，但這只為了做好管治，他最終的負責對象，仍是委派他來港出任總督的英國政府。因此，就算貧窮是每天看見的事實，傳媒不經常報道，因知道政府不會徹底解決。

以老年貧窮為例，我從英國讀書回來後，認為香港必須盡早成立退休保障制度，因參考其他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退休保障不能一蹴而就，等待老年人口多了，那時才籌劃便太遲了，老人很易成為貧窮的代名詞。

除進行退休保障的研究外，也要讓社會人士對問題有認識，我於是聯絡基督教工業委員會（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CIC），知道 CIC 也關心工人的退休福利。當時，CIC 的負責人是劉千石，他熱心工運，常為爭取工人的權益走在最前線。與劉千石傾談後，我們認為首先要做的，是使市民了解退休保障的重要。在中國人傳統觀念裏，根本沒有退休這回事，年紀大了，喪失工作能力，就得靠子女奉養。「養兒防老」就是這個意思；生兒育女除傳宗接代外，也是為了保證年老時有所依靠，不至孤苦伶仃。

怎樣增加市民對退休保障的認識？這確是大難題！那時的傳媒主要包括報章、雜誌、電台和電視。電台和電視不會替我們宣傳，只好寫些文章到報紙的「讀者來鴻」，看看有沒有刊登的機會，或我一兩位平日熟悉的記者作專題訪問，這樣的機會並不多。除此之外，CIC 是搞工人運動的，擅長落區面對市民。於是我們到各區租借場地，舉辦「退休保障資訊」的巡迴展覽，並印製草張，宣傳退休保障的重要；如果場地適合，我們還會舉辦講座，介紹退休保障給街坊認識。

這些宣傳有沒有效用？效果並不顯著，頭一兩趟展覽還有傳媒來報道，但退休保障是新概念，市民多一知半解，只懂在他們身邊，不少親友退休後生活無着，積蓄用完又沒有子女供養，貧窮是無可避免的結局。但市民除了認命外，還可做什麼？自己多儲蓄嗎？平日賺的錢已不多，生活捉襟見肘，如何為年老生活儲多個錢？期望政府設立退休保障可以嗎？市民的反應是：如果他們必須

供款（繳款），他們沒有這個能力；如果由政府支付全部費用，市民根本不相信政府會這樣「好死」（仁慈）。總言之，香港政府是殖民地政府，不向市民「掠水」（要錢）已仁至義盡，怎會奢望政府為他們的福祉作長遠打算！

回歸前政府對老年貧窮的回應

到九十年代初，市民的觀念一般仍是「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盡量與政府官員少接觸。從升斗市民的角度看，政府官員是不好惹的：就算是最低級的公務員，有什麼事情求他們，也要受他們的氣；雖說政府官員是公僕，但官員擁有權力，市民又多欠缺法律知識，官員說什麼，他們只得就範。

今天的情況當然不一樣，政府官員反過來說他們要受市民的氣，特別在議會會議上，議員不時無理取鬧，官員只好忍氣吞聲。不過，這樣的轉變，始於議會有了民選議員，立法局在1991年才加入直選議席，離開回歸只有六年時間。現在有意見認為，回歸前的政府十分開放，我認為是錯的；從我參與公職的經驗，回歸前的政府十分保守，也不見得把市民的權益放在第一位。我講了這麼多，想指出的是：回歸前，市民既不對政府有期望，也不認為政府會照顧他們的權益，所以面對貧窮的困擾，只好自己想辦法，解決不來，他們會向親友求助，到什麼辦法也沒有時，他們才會想起福利機構和政府部門，或者可以得到幫助渡過難關。

八十年代間，我們除了宣傳退休保障外，還做了一兩次調查，目的是了解市民如何應付退休後的生活。一如所料，年輕市民大多不關心退休生活的需要，覺得事情太遙遠了，到時才籌算吧！年紀稍長的，盼望能在工作時多儲蓄，或子女長大後有能力奉養他們，很少有受訪者認為政府應成立退休保障制度，他們也不願為有關計劃定期繳款。

當我們問政府應否有責任解決老年貧窮時，市民的反應是：老年貧窮是個人的事情，年老生活無着落，只好怨自己沒有「積穀防飢」，不應怨天尤人。受訪者還相信子女有奉養父母的責任，所以年老父母無依無靠，第一應追究責任的是他們的子女，不應把責任推到社會或政府身上。

市民對退休保障既沒有太多認識，也不期望政府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我們只好改變策略，不再鼓吹「隨收隨付」（由工作一代集體供養年老一代）形式的退休保障計劃，改而要求政府設立類似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儲蓄計劃。公積金計劃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大公司的僱員有，津貼學校的老師有，福利機構的社工有。公積金其實是強迫僱員有收入時把部分薪金儲蓄起來，並加上僱主的一分，到了年老退休時便可以有一筆錢使用，不致手停口停，退休時無錢傍身。

公積金並非理想的退休保障計劃，一來不是全部市民都可以得到保障，家庭主婦是顯著的例子，她們為了照顧家人，沒有受薪的

工作，放棄了保障自己年老時退休生活的權利。我們願意接受公積金這種折衷的辦法。不代表我們沒有理想，或不夠堅持，只是在當日的政治氛圍下：政府拒絕成立退休保障，僱主賺錢為上，市民又認為退休保障是個人的責任。除了推動政府成立中央公積金外，實在想不出其他辦法。

從促請政府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我清楚看到：回歸前，無論是政府或市民，看貧窮總覺得這是個人的問題：是個人沒有做好本分；所以，要解決老年貧困，就得從個人的層面入手；首先每個人都應努力工作，有收入時要「未雨綢繆」，親友之間應互相幫助；社會不應鼓勵人懶惰，政府更不該讓市民佔福利的便宜。

這種以貧窮為個人問題的態度，令貧窮在回歸前雖是眾人皆見的事實，卻沒有人提出徹底應對的辦法，有的只是一些舒緩的措施，好像貧窮根本不應存在。

董建華對老年貧窮的關注

香港特別行政區於1997年7月1日成立，到現在（2014年）已有十七年的時間。十七年不算短，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卻不算長。最近，特區政府宣傳要重建公共屋邨寧富邨，相信從構思開始，到屋邨完成，二十年就差不多了，所以十七年並不長。

過去十七年裏，特區政府在扶助窮人方面做了些什麼？特區政

府的扶貧政策，我在中華書局去年為我出版的《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一書中有詳細分析，不在這裏重複；這書記述的是我個人的經歷，政策的成效不在這裏討論。

特區政府成立之初，市民對政府有較高期望，對剛選出來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希望他為市民多做一點好事。也有一些市民對特區有懷疑，恐怕中央政府凡事插手干預，香港特區就不能做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了。

我也有參與香港特區政府的籌備工作，是籌委會成員之一，我曾用「如履薄冰」來形容回歸前兩年的經歷。從開始，我便知道籌委的工作不容易，特別是中國和英國於政制談判破裂後，各有自己的打算。中方更斷言從此沒有政制「直通車」。籌委會做的就是「另起爐灶」。對於臨時立法會的成立，港人未必認同。連帶對籌委會也採取敵視的態度。一次，籌委會在皇后大道東舊日的新華社開會，會議完畢，籌委陸續離去，其中部分有私家車接送，可以從新華社的停車場直接離開，避開在新華社門前請願的人群；我沒有司機接送，只得硬着頭皮從前門走，有示威者跟着我在罵：「臭缶出臭草。」我也沒有什麼好回應的。

特區政府成立後，確實有許多措施不如人意，但我可以肯定特首董建華是有心的，在他任內七年多，我有多次機會與他談論如何協助有需要的市民，當中包括生活無着的窮人和數以十萬計的貧窮長者。回歸前，港英政府曾於1994年底提出老年金計劃，但後來

未能在立法局通過。沒有了老年金，政府隨即立法成立強制性公積金，但強積金沒有二、三十年不會發揮退休保障的效用，但老年貧窮卻迫在眉睫。

董建華未上任前，透過社會福利署委託我進行調查，看看是否需要增加十多萬綜援長者領取的金額；如果增加，數額多少才足夠？當時，單身長者領取綜援的金額每月有二千一百元，加上租金津貼等項目約共三千元。以基本生活的開支來說，綜援長者勉強可以支撐，但用多一個錢買自己喜歡吃的東西，或看一次中醫，那個月的其他使費便得減少。

政黨和關注團體得悉董建華有意增加長者綜援金後，紛紛提出他們的要求，一般是把基本金額增加至每月三千元，也就是說，一加就是三分之一。我接受委託進行調查，心中難免有壓力：如果建議的金額不足三千元，政黨和關注團體一定不肯「收貨」；但若然增加到三千元，政府必因財政負擔沉重而拒絕，結果一切維持現狀。

事情如何解決？我想了好一段時間。原先想法是來一次全面的長者生活方式調查，就好像我在1989年那次做的，或許可證明綜援長者需要多少金錢援助才可達到「合理」的生活水平；但這樣做，調查會拖一段較長時間，生活方式也會引起較大爭議，結果各說各話，未必有助增加金額的決定。

後來，我想到：為什麼不直接去問領取綜援的長者？他們應該最知道自已的需要，也應該最能提供準確的答案。於是，我向社署取了領取綜援長者的名單，從中隨機抽樣一千戶作為訪問對象。因為調查是社署委託的，被抽中的綜援長者都願意接受訪問，成功率差不多達到百分之一百，所以答案的可信性絕無疑問，代表的是綜援長者的心聲。

調查還包括綜援長者的其他需要。但單以綜援金額而言，絕大部分長者要求的，是把綜援基本金額增加三百至五百元，即把綜援長者金額從每月約二千一百元，增加至二千四百或二千六百元，增幅遠低於政黨和關注團體要求的三千元。為什麼綜援長者的要求這麼有節制？我的理解是：綜援長者只是誠實的說出自己的感受，每月多了三、五百元，生活便會好過很多；他們不會像政黨和關注團體般「獅子開大口」。並不是與政府討價還價。我的感受是：綜援長者絕對不是貪得無厭的人，每天多了十元八塊，他們心裏十分滿足。我把調查的結果交給社署，還有其他改善長者生活的建議，到董建華上任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第一任行政長官時，他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宣佈，綜援長者的基本金額每月增加三百八十元。

聽到董建華所作的決定，我感到欣慰，覺得所做的調查並沒有白費。政黨和關注團體的反應是：有些是勉強接受，有些批評董建華吝嗇；領取綜援的長者一般沒有公開表示加幅是否足夠，但我知道他們是開心的。

政黨和關注團體無法在長者綜援金額增幅上糾纏下去，轉而重提回歸前港英政府建議的老年金，要求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並反對仍在籌備中的強積金，認為計劃未能涵蓋全部長者，提供的退休保障十分有限，未能令長者感到安心。

對於全民退休保障，以上講了，市民其實知道的不多，只知道有了全民退休保障，打工仔或許要供款，所以有極大保留，做老闆的更不用說了。我對全民退休保障也不看好，原因就是社會沒有共識；回歸前，一旦提出來，社會必爭議不休，甚至做成嚴重的對立，政府也不願冒這個險。強積金既已立法，推倒重來也不是辦法，對我來說，強積金猶如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目的旨在強迫打工仔為退休後的生活儲蓄，這種觀念是市民接受的，畢竟強積金的錢屬於自己，不像全民退休保障，繳了的錢用在別人身上。

從個人責任到制度改革

關於強積金，以後我還有要講的，但從增加綜援長者的金額到政黨要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我領悟到一個道理：市民對貧窮的意識和想法，漸漸從個人或個別組群的角度，轉到要求制度上的改革。為什麼有這種轉變？

意識的改變，不是一時三刻的事，促成的因素也必然有多種。首先，現今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命運不再憑着個人的努力可以改

變；我不是說，個人的奮鬥不重要，但社會的發展慢慢上了軌道，各行各業各有自己的規矩，即一般講的「制度化」，個人若然不依隨既定的規則做事，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

以上描述六、七十年代的貧窮面貌時，我提到認識的親友中，有不少沒有什麼學歷，但憑着一己的機智和努力，常可出人頭地。回歸後，我再看不到這種「奇蹟」的出現；相反，現在年輕人能夠得到的機會不斷收窄。前幾年，有幾位社工系畢業生，當了社工兩、三年，發覺自己不太適合，於是離開社工行業，轉行去做些小生意，或做人壽保險推銷員。做小生意的，發覺世界跟過往不一樣，本錢不夠，一個浪花打過來，很快被別人淘汰，根本無法生存下來，最終結業收場；做保險推銷員的，情況好不了許多，社工看重的是真誠，但推銷員對待顧客，很多時只能說產品好的一面，不欺騙顧客已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各行各業一旦制度化後，個人能夠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好像我一樣戰後出生的人，能夠完成中學階段，機會已「無可限量」，投身任何行業，只要肯努力（今天的用詞是拼搏），成為行業的翹楚並非是神話。所以，和我同輩的人，很容易以自己的經歷來教訓後生一輩，總覺得今天的年輕人不求上進。

時代畢竟改變了！往日我任職社工時，有些同事遇到受助者連「開飯」的錢都沒有，就自己拿錢去幫他們；今天的社工不會這樣做，並非他們沒有愛心，而是知道受助人有困難，解決問題應從制

度入手，條例不改變，窮人的生活無以為繼，只會一直拖延下去。

董建華把長者的綜援金額每月增加三百八十元，雖改善了十多萬名綜援長者的生活。但長遠來說，老人的退休保障還是要從制度上徹底解決。後來，我有機會與政府官員討論退休保障的發展，得到的回覆是：政府正推行強積金計劃，所以政府首先做的，是鞏固世界銀行講的「三條支柱」，即由社會保障、強積金、個人儲蓄和親友的支援。來解決市民晚年生活的需要，暫時不考慮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市民對老年貧窮的問題，觀念上明顯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以前看問題是以個人為出發點，貧窮是自己招來的，不應委過於他人，更不應由社會負責，否則只會愈幫愈忙，貧窮問題沒完沒了。現在的看法是：老年貧窮是社會發展的後遺症，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後果，況且人的平均壽命長了，人老了就得退下來，這是現代社會的規律，只有老弱可以賴着不走；但退休後二、三十年的「悠長歲月」，醫、食、住、行是必須的開支。傳統觀念是「養兒防老」，子女願意負起供養的責任當然令老人家安心，但沒有子女的，或子女自顧不暇，晚年生活就大費周章了！自己平日有儲蓄，整着來使也不容易；沒有積蓄的，晚景難免淒涼。

總言之，老年貧窮不再被視為個人的問題，必須有集體措施去解決。政府不能袖手旁觀。敘述六、七十年代的貧窮面貌時，我提到那時的慈善團體是窮人的救星，深發的金錢和物資比政府更多；

慈善團體的資源如何募捐得來？我做過多間志願機構（今稱非政府機構）的委員或董事，其中一些與外國慈善組織有連繫，要得到外國慈善組織的捐款，志願機構多是拍一些窮人悲慘生活的照片，然後寄去外國組織，證明香港有很多窮人需要救濟。我看過這些照片，雖不是做假，但其實沒有代表性。例如窮人要露宿街頭，熟悉香港情況的市民都知道，窮人可申請入住公屋。

還有，慈善團體常透過電子傳媒籌募經費，有時請來著名伶人新馬師曾獻唱，扮相乞丐博同情，呼籲市民多捐款。今天，不用這種手段吧？！市民都知道窮人可申請綜援，有既定制度去幫助他們，捐款給慈善機構，是自己多走一步，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窮人數目有多少？

解決老年貧窮問題的辦法變得制度化後，現在要轉去另一話題：香港有多少個窮人？民間和政府怎樣計算窮人的數目？2006年初，前扶貧委員會發表了一份由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報告，顯示在2004年第四季，如果以綜援金額的水平來計算，香港共有一百萬市民生活在綜援水平線之下，其中六十歲以上的有284,800人，十五歲以下的兒童佔229,100人，合起來超過五十萬人。

香港貧窮人口超過一百萬人，這是政府第一次公開承認的窮人數字。數字公佈後，並沒有在社會引起太大震盪，其實在市民心裏，貧窮根本不是陌生的事：親戚中有窮人、朋友中有窮人、鄰舍

中有窮人，可能連自己也貧窮，香港有超過一百萬市民生活貧窮，有什麼值得驚奇！數字公佈後，政府做好做醜也要推出措施扶助窮人；於是，曾蔭權 2007 年時再次當選特首後，對於扶貧委員會提出的扶貧措施，總不能置諸不理。有說這些措施「濕濕碎」，起不了改變窮人命運的作用，作為委員會的成員，我當時的反應是：「做得幾多得幾多，窮人有一杯涼水，總好過什麼也沒有。」

扶貧委員會於 2007 年底解散，但市民認為扶貧工作未完結，催促政府訂立貧窮線，政府卻以扶貧委員會的報告作擋箭牌，認為報告已制定不同年齡組別的扶貧指標，政府可依據這些指標釐定政策，同樣地可以達到扶貧的目的。政府雖可自圓其說，但指標有二、三十項，政府有沒有做事，誰也說不清楚；況且，政府可以把統計數字「拔圓欺騙」，只要每年有一、兩個新的扶貧措施出台，政府便有交代。

曾蔭權在 2007 年再次連任特首，任期五年至 2012 年。在他第二任的五年內，曾蔭權為窮人做了些什麼？我的觀察是：他沒有董建華那麼關心窮人的福祉。以上講了，董建華未上任前，已經有意改善長者福利，其中領取綜援的，更一下子每月多給他們三百八十元；董建華對其他弱勢社群（回歸後的新興名詞）也想多做一點事，奈何 1998 年開始，政府連續六年出現赤字，「沙士」那一兩年，每年赤字且高達數百億元；但董建華對有需要的市民還是關心的，這點我可以做見證。

有幾年，董建華在預備〈施政報告〉前，常找一些學者替他做研究。2004 年底，董建華正準備明年的〈施政報告〉（這是董建華出任特首最後的一份），我替他做了一些分析，建議為殘疾人士每月多加一百元的補助金。董建華也同意殘疾人士確實有此需要，但財務科的官員卻激烈反對，理由是政府仍有龐大赤字，任何新增的經營性開支有違財政紀律的原則。在會議上，我對於財務科官員的反對十分失望，覺得政府雖有財赤，但市民的困苦不能視若無睹，或許我是婦人之仁。

正當應否給予殘疾人士額外補助金時，董建華收到現已去世的「斌仔」（鄧錦斌）來信，要求特首批准他安樂死。斌仔在一次意外中受傷，全身癱瘓，在醫院卧床十多年，頭腦雖清醒，但每天起居需他人照顧，感到生存下去也沒有意義。斌仔是四萬多個需要協助的完全殘疾人士中的一個。會議上，我認為政府若能增發給斌仔這類殘疾人士每月一百元，應是對斌仔要求安樂死的最適當回應：政府不能批准他安樂死，是特首對生命的尊重，但政府願意伸出援手，一百元的金額並不足夠，但也表示了政府是關心的。董建華聽了意見，即時命令財務科官員如實執行。我感覺他並非為了「做秀」，而是深深的覺得，政府必須對市民有承擔，不能找藉口去逃避責任。

董建華的功過，不是我要評論的，但與曾蔭權比較，兩者在扶貧工作上的表現明顯有差異，可見為政者的態度，常決定了政策的方向。曾蔭權出任特首的七年內，針對貧者的措施只可列舉關愛基

金一項，其他不是修修補補，就是在市民催逼下，稍作增加便算有交代。

關愛基金的是是非非

關愛基金的成立目的，至今仍是一個謎。關愛基金的意念在2010年提出來，先由政府撥五十億元，再向商界籌募五十億元，合共一百億元。有了這筆錢，政府可多為窮人做事。我當初的反應是：關愛基金沒有清晰目標，如果政府真的協助有需要的市民，可透過現有措施去做，加大力度便可以，何必成立什麼關愛基金？架床疊屋之餘，市民更不知從哪裏得到幫助。

關愛基金提出後，坊間有很多傳言：有說政府在金融海嘯後多次「派糖」，如電費補貼，代繳公屋租金等，但總有些市民無法受惠，立法會議員稱之為「N無人士」。關愛基金就是要幫助這群「邊緣市民」；有說關愛基金的成立是給富商贖罪，免得市民覺得富商只懂得「吸血」，不肯為窮人做好事；更有說政府成立關愛基金，是為當時仍任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做勢，為他成為下一任特首鋪路。

我公開反對政府成立關愛基金，知道是自惹麻煩：商界不會高興，覺得罰錢都遭人批評；政府更不在話下，以為是德政，卻得不到市民的讚賞。隨後，我收到唐英年來電，想知道我反對關愛基金的理由。我解釋：自己並非反對政府為窮人做事，富商願意捐獻

也求之不得，但我認為關愛基金要發揮作用，首先捐錢的人不能對基金的用途諸多意見，否則關愛基金容易淪為有錢人的政治工具。另外，我認為關愛基金應有異於社會保障，對象應是那些經濟上有困難卻無法在現有社會保障措施中受惠的市民，包括一般稱的「N無人士」。唐英年問我：如果他公開的承諾，按照我提到的兩點做事，我是否願意加入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既然唐英年願意公開承諾，我答應參加關愛基金的工作。

我參與關愛基金共有兩年的時間，我是戰戰兢兢的。一如所料，自從政府明言捐錢的人不可對關愛基金「指指點點」，有些商人認為既不能指定捐款的用途，不捐也罷。政府原先希望商界捐五十億元，最終不到二十億元。但有了政府的五十億元，關愛基金很快便投入工作。傳媒知道我參加了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很想知道我為什麼首先反對，後來卻答應加入。是否出爾反爾？或被唐英年收買，支持他出來競選特首？我當然沒有這個意思，只要政府願意撥款協助有需要的市民，我就樂意幫忙，個人榮辱不算什麼。

我願意加入關愛基金，背後另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覺得社會保障已追不上時代，很多有需要的市民未能符合資格受惠。有些政黨如自由黨，常批評綜援受助者中有數以萬計成年人，他們有氣有力為什麼不工作？綜援設有「自力更生」計劃，協助有工作能力的受助者返回工作崗位，是否有成效是另一回事。但只要客觀分析，便知港人不會倚賴綜援：「沙士」期間，失業率上升至差不多9%，綜援失業個案一度超過五萬宗，但失業率一旦回落，綜援失

業個案隨即減少。近兩、三年只有一萬多宗。

即使是有幾萬個成年人領取綜援，但他們是好食懶殘嗎？這幾萬個成年綜援受助者，四萬多個來自單親家庭。他／她們為了照顧年幼子女留在家中不外出工作。是他／她們偷懶嗎？另有二萬多個來自低收入家庭，他們賺到的錢不足養家，難道要強迫他們的子女同樣「捱苦」嗎？我不會鼓勵人懶惰，也知道有少數綜援受助者申報收入和資產時並不誠實，但政府應否為了少數市民的欺騙行為而禁止成年人申請綜援？關愛基金推出後，申請者必須申報收入和資產，有記者問我：會否有市民虛報資料？我回答說：我不會因一些市民的虛假而使大部分生活困難的得不到幫助；我研究社會保障四十年，看到更多市民因嚴厲的審查而不願申請，欺騙綜援的總是極少數。

說話又扯遠了。我講的是，回歸以後，綜援制度並沒有實質改善，金額有隨通脹或通縮調整，但綜援的目的沒有改變，仍舊限於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這個目的應否改變？看來市民沒有共識。我發覺回歸後，綜援受助者出現了很大轉變：窮人不再一定是老的、病的、傷殘的、犯罪的、吸毒或酗酒的；現在的窮人，有新來港的移民，單親家庭的家長及他們的子女，有工作十多個小時仍不夠收入養家的打工仔，也有住在偏遠地區無法找到就業機會的低技術工人，又或是為了前途而仍在求學的年輕人。換言之，貧窮出現在各類家庭和年齡組別之中；我還發現，貧窮也趨向地區性，某些地區總排在最窮地區的前幾名。

天水圍和貧窮地區化

談到貧窮地區化，我要提另一個深刻的體驗，也可說明貧窮在香港已變成極之複雜的現象。2004年4月，天水圍發生倫常慘劇，一名母親和兩名年幼子女當場傷重身亡，父親重傷入院，數天之後也離開人世。家庭暴力導致人命傷亡，過去時有發生，但天水圍這次倫常慘劇，全家無一倖免，死去的母親死前曾多番與社工接觸，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曾幫助這個家庭，為什麼慘劇仍無法避免？

慘劇發生後，社署成立三人小組跟進，目的並不在探究死者的死亡原因（這方面有死因庭負責），而是怎樣改善區內福利服務，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我是工作小組成員之一，工作小組半年後完成報告，有二、三十項改善區內服務的建議。我想在這裏記述的，並不是報告的建議，而是在調查中的一些親身經歷，以及我對貧窮地區化的理解。

在水圍倫常慘劇發生前，我從未有到過天水圍，只知這是鄰近元朗的新市鎮。「沙士」期間，我從社工那裏得知：因樓價持續偏低，位處天水圍的私人屋苑嘉湖山莊，租金低廉到連綜援受助者也可負擔；嘉湖山莊被暱稱為「綜援山莊」，領取綜援的家庭可在其中享受會所設施。我聽了半信半疑，但「沙士」那幾年，什麼事情都會發生，不能以常理來看待。

小組成立以後，社署有安排我們到天水圍了解社區的情況，及居民對公共和福利服務的需求。我也曾參加這幾次訪問，各相關部門也樂意提供資料，讓我們對天水圍有初步的認識。不過，我總覺得由社署安排的訪問，有點官方的意味，未必能對居民的生活有一手的感受。我也想乘坐居民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而不是社署安排的政府車去做訪問。

我聯絡了幾位在屯門和元朗任職的社工畢業生，相約到天水圍走一趟，並與天水圍居民交談。伴我同行到天水圍的社工，有一位住在兆康苑（介乎屯門和天水圍之間）。我提議先在西鐵兆康站集合，然後從外走向天水圍，這樣便可鳥瞰整個天水圍。住在兆康苑的社工卻說不可，因兆康苑與天水圍雖只一站之隔，也有馬路可走，但沿途飛沙走石，盡是荒廢了的土地；有改作停車場的，更多是堆滿爛車和廢鐵的荒地。沿途沒有什麼好看的，連遮蔭的地方也找不到。我心想：二、三十萬居民住在這樣的社區，周圍環境這麼惡劣，政府是怎麼搞的？

我們在水圍站集合後，轉乘輕鐵先到天水圍北，有幾個公共屋邨仍在興建，幾棟剛建成的樓宇有居民陸續入伙。經過事先聯絡，我深訪了幾戶人家。我最想知道的是：他們為什麼搬入來這麼偏遠的屋邨？答案並不令我感到意外。居民盡是基層市民，一些以前在市區住板橋房，擠迫得透不過氣來，房署通知他們「上樓」，天水圍也得接受；有一兩戶是福利轉介個案，或正在領取綜援，當中包括新移民及單親家庭。簡單一句，他們都負擔不起私人樓宇的

租金。這是 2004 年的事，私樓的租金一點也不高昂，但工人的薪金更低，統計顯示月入低於五千元，2004 年底有五十萬人；這些家庭不租住公屋，還有哪裏可以安身？

天水圍這樣偏遠的公共屋邨，解決了基層的住屋需要，但後果是把眾多貧民困在一起。走訪居民後，我提議在附近較安靜的咖啡店，如市區隨處可見的 Starbucks、Pacific Coffee，坐下來多聽他們對天水圍的感受。社工同聲說：天水圍沒有這麼高檔的咖啡店，連發展了三十多年的屯門，一間也沒有；後來我們到了嘉湖銀座的快餐店，午後四點多鐘，正是下午茶時段，不少小孩子放學後與家人在吃下午茶，小孩和夫人都大聲在說話，環境頗嘈雜，基層市民的生活就是這樣。

沒有高檔咖啡店，天水圍的居民不會有損失，但可知他們的消費力十分有限。在水天圍認真的走了一圈，我感到憂心的是，附近差不多完全沒有當地居民就業的機會；屋邨店舖是有的，較大的商場只有嘉湖銀座，但寫字樓欠奉，銀行不見一間，其他公共服務如學校、診所、長者和青少年服務中心，他們聘用的員工，不知有多少是住在水天圍？

離開天水圍，我特意乘坐 969 號巴士返回港島。踏上巴士上層，我與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男士同坐一排，他表現有點不快，因上層還有不少空位。我說第一次坐這條路線回家，想知道巴士怎樣走，他說巴士在水天圍接客後，才上高速公路，經過西隧往港島。

謝過他後，我問他到港島是上班或回家？他說去年才搬入天水圍，原先在九龍打工，什麼工作也做過，但經濟不好，收入不穩定，入住天水圍後，朋友介紹他到港島的商業大廈做夜間管理員，現在是坐巴士返工，明天早上最早也要八點多鐘才回家。我們談了只有十分鐘，巴士還在水天圍接載乘客，我見他有睡意，也不再問了。

我對天水圍的認識並不深，當時只靠不同政府部門提供的數據，及自己幾次的訪問，總算對天水圍多了了解。2004 年底，工作小組提交報告，建議有幾十項，多是增加公共設施改善居民生活，但我明白建議的效用十分有限，對被稱為「悲情城市」的天水圍居民，不會有很大作用。到 2007 年 10 月，天水圍再次發生倫常慘劇，有母親把兩名年幼子女摔下樓層，自己也躍下自盡，三條人命一刻間喪生。慘劇發生後，社會再次起哄，嚴厲批評政府漠視家庭暴力的傷害，我在報章專欄也發表了文章，題目為：「天賜良水，官團愁民」：

上週日天水圍發生的倫常慘劇，我聽了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又是天水圍？相信留意這欄的讀者都會察覺，我對天水圍是有特別感情的，並不因我住在元朗區，也不因我在工作上與天水圍有什麼關係，只因 2004 年 4 月天水圍發生了倫常慘劇，母親和兩名年幼子女當場死亡，父親重傷入院幾天後去世後，社署成立特別調查小組看看發生了什麼問題和有什麼補救辦法。當時我是小組成員之一。

那次調查工作，我是十分着意的，在這欄我曾提過，為了好了解天水圍這個社區和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我多次到天水圍實地觀察。直到我相信自己已掌握了居民的憂慮和盼望。我膽敢說，在草擬調查報告時，建議都不是憑空捏造或交差了事，是準確的針對天水圍居民的需要，要糾正的弊病也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所以，今次天水圍再次發生慘劇，我心裏有點內疚：為什麼上次提交的報告未能防止慘劇重演？為什麼三年過後，天水圍還是這麼悲情？我當然不會認為一個調查小組的報告可以在短短兩、三年內改變天水圍的形貌，也不會因為報告的二、三十項建議可以扭轉居住在水圍三十萬居民的命運。但我們的社會是否就這樣讓悲劇繼續發生？我們的官員在痛心之餘是否只能說慘劇無法避免？

問題出現在哪裏？如果細心分析這次天水圍慘劇發生的情況，不難發現有三組問題是必須提出來討論的：這三組問題包括天水圍整體規劃和公共設施出現的漏洞和錯誤，香港婚姻和家庭制度產生的危機和困惑，民生福利措施的推行和社區重建。

先看規劃和公共配套出現的錯誤。天水圍規劃上最大的漏洞是沒有吸取屯門的教訓：屯門作為新市鎮發展了三十多年，到現在還是在各項指標上最靠前三名社區之一。屯門的

問題是地域偏遠，人口以公屋居民佔多數，就業機會偏低，地區經濟不發達形成消費力薄弱……。屯門是政府發展的第二代新市鎮，規劃上犯了這麼多錯誤還可推說經驗不足，但天水圍在屯門之後，興建時間相差十多年，就是初期還不知道問題所在，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屯門面對的困局一一湧現，政府為什麼仍讓天水圍走向同一死胡同？

就是規劃錯了，天水圍不是一天建成的，現在接近三十萬居民是從九十年代初陸續搬入的，負責區內公共設施的政府部門對居民的需要有否作出調整？規劃只是一種預測，是死的，官員應換實情行事，是活的。這也是最令我滴心的地方：為什麼眼見數以萬計公屋居民搬入天水圍，基本公共設施還付諸厥如？為什麼到了 2001 年，天水圍有二十萬居民，區內卻沒有一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這算不算行政失當？我在此公開向中訴專員投訴，盼望為天水圍居民取回公道！

這次天水圍慘劇顯示的第二組問題，是我們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確實到了崩潰邊緣，亟需正視。政府最近在媒體多了關於和諧家庭的宣傳短片，但什麼「我們都是一家人」並不播著療處？香港的婚姻和家庭制度所以出現問題是我們的觀念改變了：不再重視婚姻和家庭，不再認為結婚和組織家庭是人生必走的路；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也因香港回歸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兩地婚姻趨普遍，家庭的完整受到衝擊；我們對婚姻和家庭也降低了期望；婚姻和家庭不再是神聖的制

度，離離合合是今天普遍接受的現象。

在這些轉變之中，社會如何看待婚姻和家庭？重申「我們是一家人」可解決問題嗎？社會可宣傳怎樣的訊息？政府的責任在哪裏？個人如何回應時代的變遷？以上都是大問題。策略發展委員會剛成立有關鞏固家庭的工作小組，盼望在這些方面能找到出路。

至於民生福利措施和社區重建，政府承諾在這方面會加把勁。自天水圍慘劇發生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答應在區內增設資源，民政局局長曾德成提出要搞活社會企業協助區內弱勢社群。不過，要建立天水圍成為有生氣和關懷的社區，並非兩位局長講的這麼簡單：社區網絡不是兩三個計劃可建立起來，鄰里關係也要時間培養。天水圍的基本問題是，區內居民本身的條件有限和區內就業機會不足，這兩大問題沒有改善，天水圍不會從「悲情城市」轉為「歡樂城市」。天水圍居民對我常講的一句話是：只要收入有改善，我便要搬走！

天水圍是什麼？是一個外在環境還算不錯，內裏卻因政府行政失誤而集多種問題於一身的新市鎮。

深水埗、屯門、觀塘、葵青的貧窮

天水圍第一次發生倫常慘劇後，我認定香港的貧窮不再是個別市民遇到的困難，而是已成為結構性了。以上敘述老年貧窮時，我形容問題變得制度化，意思是長者生活欠缺保障，再不是鼓勵子女奉養年老父母，或個人有收入時儲蓄多些便可解決；要確保市民年老生活無憂，唯一解決辦法是從制度的改革入手，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老年貧窮無法解決。

貧窮變成結構性的社會問題，這是我參與扶貧委員會時另一項觀察。扶貧委員會按綜援金額水平，發現香港共有一百萬市民生活貧困，若按地區的分佈，排在首六、七位的，好幾年都是：深水埗、元朗（包括天水圍）、葵青、黃大仙、離島（主要是東涌）、屯門、觀塘。深水埗多次佔第一位，表示該區貧窮住戶最密集，葵青排名也常在前三位之內；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屯門和觀塘發展已有三、四十年，區內公共設施相當齊備，新穎購買商場也有兩、三個，為什麼住在那裏的居民仍這麼貧窮？為了解答我的疑團，我特意到屯門、深水埗、觀塘和葵青四個地區，親身觀察區內居民日常的生活狀況。

這樣走馬看花當然看不到什麼，但在每區轉了大半天後，多在黃昏邀約兩、三位在該區工作的社工，到附近茶餐廳小聚，從他們身上多知道居民的生活，低收入家庭又怎樣應付日常開支？我不會說自己對每區的情況有深入了解，例如屯門這麼大，住上六、七十

萬居民，在外國已是中等規模的城市，有自己的議會和獨立財政。屯門可劃分為幾個分區：有以公屋為主的，有以私人樓宇為主的，發展的年期也不相同。我得到當地社工的經驗分享，總算有了一些概括的印象。於是在報章專欄中談談自己對這四區貧窮狀況的看法，作出一些分析，時間在2006年中。

地區除貧，當然不是我一人可提什麼意見，但我還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盼望的，就是可以引起社會人士的回應，特別是這些貧窮地區的議員和關注團體，若大家都起來討論，就算未能即時找到解決辦法，最少也不讓區內貧窮情況惡化下去。

先談屯門，數據顯示，屯門區的失業情況確實有了改善。或準確一點來說，住在屯門區的無就業成員家庭的數目減少了。屯門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展成為新市鎮後，最大問題是交通不便，區內又欠缺就業機會，居民要找工作，最接近的也要到荃灣，而每天花上兩、三個小時到九龍和港島上班的也大有人在。

屯門為什麼顯得這麼偏僻？理由是香港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九龍和港島區，住得遠一點的，上班時難免要忍受長途跋涉之苦。但屯門偏遠的地理環境可改變嗎？其實，歷史上，屯門並不是這麼偏遠的，在香港開埠以前，更是珠江三角洲流域的轉運中心。

我在大學念一年級時，曾修讀已故羅香林教授講授的香港對外交通史。羅香林對香港歷史有精遠的研究。學期完後，他還帶領同學到新界各處考察古跡，如荃灣的駱馬爺墓、青山的杯渡禪院等。我記得了昔日的龍珠島，即今日的黃金海岸一帶，羅教授指出，明朝政府曾在這裏屯兵，所以稱為屯門。明兵更在龍珠島對開海面擊退當時來犯的荷蘭船艦。

我重提這段歷史，絕非懷舊，而是要說出一地的興衰，與本身的地理環境是分不開的。香港割讓給英國後，英國人以維多利亞港為商貿中心，後來九廣鐵路興建完成，運輸以陸路為主，珠江口岸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屯門的轉運作用一落千丈。

我所以形容屯門最近有了一點起色，第三號幹線和西鐵相連完成幫助不少，但更重要的，是在回歸以後，港粵兩地的距離拉近了，特別是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的交往，頻密程度正以幾何級數上升。現在港粵政府傾談之中的建設，除港珠澳大橋外，還有香港與蛇口，香港與中山的直達交通設施。我並非專長城市規劃，但以常理推算，隨著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緊密連繫，屯門的地理位置應更吃重，甚至成為兩地的交通樞紐。

上篇講過，地區扶貧並非要派錢，最有效辦法還是令貧

窮地區恢復生機。有了人流、物流，就不怕沒有就業機會；多了職位，薪金自然上升，貧窮家庭便有翻身的日子。不過，要掌握機遇，看來政府還要多點積極干預，畢竟三數十年積聚下來的貧窮不會說走就走。

同樣是貧窮地區，深水埗較走門優勝之處是有地利之便；為什麼深水埗的交通這麼方便，還是和偏遠的走門同樣貧窮？要解釋箇中原因，首先要看一般大城市的發展規律：每個大城市，總有它經濟活動的集中點，如紐約的曼哈頓，而香港就是維港兩岸。在這些經貿活動最稠密的地區附近，總有一兩處令人感到破落，甚至有藏污納垢之嫌的貧民窟。在這些破落地區居住的市民，從事的是低薪職位，薪金微薄，他們不能花費昂貴交通費到較遠而環境較佳的地區居住，只得在城市中心附近覓一棲身之所，環境怎樣惡劣也不計較了。九龍的深水埗、土瓜灣，港島的灣仔、上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聚集了一群低下收入階層的市民。

與深水埗相似的，還有旺角、油麻地和九龍城；這些地區的共通點是以私人樓宇為主，而且是樓齡較高、陳舊和狹窄的私人樓宇。因這些私樓租金廉宜，引來的自然是低下階層市民，特別是一些流動性較高的人士，形成住在這些地區的居民。除了部分老街坊外，多對地區沒有歸屬感。

這些地區的貧窮特色，並不是觀塘區的老化問題，而是

太多以地區為踏腳石的居民；一些成功申請公屋便「上樓」去了，一些在別區找到工作便搬走，所以我稱這些地區是窮人集散站。

換言之，要改善深水埗的貧窮狀況，並非細眉細眼的扶貧工作可達到目的，最重要還是香港的經濟保持穩定；只要有工開，職位不短缺，深水埗的中下階層居民便有謀生的辦法，他們不一定需要政府的幫助（當然，政府提供培訓課程是好的），也不需要政府什麼繁複的扶貧措施（當然，政府推動社會企業也有一點幫助）。

除交通方便外，深水埗還有一脫貧的優勝條件，就是區內特別多小店鋪，有些更是成行成市，如五金店、各式各類的零件店；這些小店鋪的生意額不太高，卻為區內低學歷人士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以前有區內議員認為要改變深水埗的形象，就得減少小店鋪數目，引入大型商場；但從扶貧角度看，這樣只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區內小市民可能連生存空間也沒有了。其實，深水埗雖窮，但其中窄小的居住單位、被時代拋棄的小店鋪，正為數以萬計但求一宿兩餐的貧窮家庭，提供了一處他們還可求活的棲身之所。

屯門和深水埗的致貧成因各有不同，但扶貧策略卻只此一條：增加就業機會。

觀塘是戰後最先發展的新市鎮，同期發展的有荃灣和稍後的葵涌。觀塘和荃灣（葵青區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從荃灣分出來獨立成區）是早期設立的新工業區；政府為了工廠有足夠工人，於是在區內興建大量公屋，確保當時數以萬計、大大小小的工廠不會因工人短缺而拖慢生產。

我記得七十年代初任職感化官時，曾介紹不少接受感化的青少年到工廠工作。當時，有紗廠老闆對我說：在香港開廠是最好的，不愁沒有年輕工人，政府解決了他們住的問題，工廠便可二十四小時生產，一天三班。工人連續工作八小時，不用給他們吃飯的時間。現在看起來，好像不太人道，但在六、七十年代，連續工作八小時或更長是平常事。

除觀塘和葵青區外，類似的地區還有黃大仙，都是政府早期為了發展工業而建立的市鎮；這幾區的特色是居民大多住在公屋，也多本來棲身於附近山邊木屋，後獲分配公屋單位。這些居民隨地區老化，少數環境改善了便搬到其他地區或申請居屋，但大部分留在區內，只在屋宇重建時搬往新單位。

總言之，住在這些跟隨時間而成老化地區的居民，他們的黃金時代在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二、三十年裏，也就是他們年輕力壯的時候。

今天，觀塘是老化的社區：工廠搬走了，商業活動仍保留一點街坊的特色。只有 apm 是現代的，但吸引來消費的，多不是觀塘的坊眾。只要在觀塘舊區和附近的公共屋邨走一走，便可見區內的陳舊和破落，連帶住在這裏的居民都有一點「垂垂老矣」的感覺，或許這就是市建局在未來十二年，要把觀塘重新塑造的原因。

以上文章，寫於 2006 年，到今天又過了八年，各區的貧窮狀況沒有太大改變，貧窮變成結構性的問題。所謂結構性，指的是貧窮成為牢不可破的現象，是制度的一部分。再以天水圍為例，區內至今仍嚴重缺乏就業機會，找好一點工作的要走到九龍和港島；結果，專業人士很少住在水圍，搬入天水圍居住的以中下階層為主，導致區內居民收入普遍偏低，消費能力薄弱，區內經濟不振，就業機會更青少見少。這樣，一環扣一環，惡性循環一旦形成，要走出這個死胡同，談何容易？2007 年天水圍再次發生倫常慘劇後，政府有意在水圍增加就業機會，辦法之一是把賽馬會場外投注的行政中心設於天水圍，又透過東華三院的社會企業計劃設立「天秀墟」；但貧窮一旦成為結構性，扶貧措施顯得杯水車薪，也很難將困局翻轉過來。對於天水圍的貧窮，我曾於扶貧委員會上提出改善的建議，隨後把建議寫成文章，刊於 2006 年 10 月的專欄：

天水圍現有二十七萬多居民（因天水圍北仍在興建，居民數目可能有變），八成以上住公屋，形成天水圍無論在屋邨外形上，或居民表現的行為，都顯得十分單調和欠缺生氣。

因這些居民搬入天水圍只有數年時間，要根本改變天水圍的貧乏情況，看來未來二、三十年都沒有可能；因此，天水圍的扶貧工作，首要任務應是防止惡細胞惡化下去，也就是讓這差不多三十萬天水圍居民，生活上可以穩定下來。

天水圍的扶貧工作最重要還是增加就業機會。與屯門一樣，天水圍是偏遠的；隨香港經濟復甦，屯門的就業機會有了一點起色，但天水圍卻沒有這麼幸運。除天水圍本身欠缺經濟活動外，天水圍固有更多家庭欠缺謀生能力，如單親和新移民家庭，以致他們到其他地區找尋工作的可能性也相對的偏低。

天水圍居民既多無法到別區工作，要解決他們貧窮，便得移船就壖，在水圍區內創造就業機會，而且是一些適合天水圍居民就業條件的職位。

不過，為了讓天水圍居民有更多就業機會，我曾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區內接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學校及診所等，在聘用非技術性工人時，先考慮區內居民的申請。我明白，這樣做法，或許有違平等機會精神，但只要申請者條件相等，給予天水圍區內居民優先權是應該的，也合情合理。另外，我也建議這些機構多設立部分時間職位，讓區內有家庭負擔的婦女，也可多些收入幫補生計。

另外，我有兩個建議：一是為「自由行」旅客提供廉價旅舍住宿。現在內地旅客只求晚上有休息的地方，並不是要享受五星級的酒店服務。所以改裝修車場為旅舍應大有作為；況且，內地旅客住在水園，可到屯門和元朗中心購物，到迪士尼和昂坪參觀大佛也十分方便。正是一舉數得。我知道，這建議一定遭官員反對，認為改建停車場未必符合成本效益，改建手續也十分複雜；如果官員認為不可行，最少也應開放給私人市場，看看是否有利可圖。

第二是在天水圍區內增建公共設施。我指的公共設施，並不單是規劃好的，如社區會堂、公眾泳池、診所等，而是在這些以外，看看是否有一些全港性的公共設施，也可利用天水圍較多的空間來興建。我特別想到為老人和傷殘人士而設的護養院和復康院等；社會對這些院舍的需求很大，輪候入住的數以萬計，所以多建這些院舍並不會浪費資源。此外，就是政府無意增加護養院和復康院的數目，我想在地域上，重新調整這些院舍的所在地也是必須的。舉例來說：政府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港島和九龍興建了不少安老院，一些更在極貴重的地皮，如港島大坑道。因為這些設施是全港性的，入住這些院舍的長者親人，並不一定住在港島和九龍；事實上，隨香港人口北移，親人現多住在新市鎮。因此，如果在水園興建養老院和復康院，替代港島和九龍區的現有設施，應更符合市民的需要和要求；至於現有地皮能否為庫房增加收入，這是另一回事。

總言之，現在最迫切的就是在天水圍和附近區內增加就業機會，特別是針對天水圍公屋居民教育和技術水平的工作。或以上兩個建議，當然不能一、兩年間為天水圍居民提供大量職位，但最重要的是走了一條適合天水圍現況的扶貧路。其實，多項地區調查顯示，天水圍居民的要求並不高：他們期望的，是政府實踐諾言，給他們足夠的設施和服務，不要讓他們有事事不如人的感覺（最近輕鐵取消天水圍北761線，讓人感覺雪上加霜）；只要他們可找到穩定工作，薪金足以養活自己和家人，他們已十分滿足。

只要政府多花點心思，多從居民的感受看問題，天水圍不應是「悲情城市」，居民應可生活得快樂和開心。

天水圍到了今天，仍未見有大轉變，不少悲慘故事仍與天水圍地帶在一起；深水埗還是板隔房和窮人的集散地，一批窮人走了，來了另一批；觀塘的裕民坊要重建，但願五、六年後給人煥然一新的感覺；葵青仍是問題多多的老區，社工對我說：區內酗酒、吸毒和黑社會活動愈來愈猖獗。

關愛基金做的扶貧工作

回說關愛基金，除了無緣無故被捲入箇中紛擾外，我答應做委員，心裏也想：過去我提出這麼多扶貧的建議，現在政府願意撥款設立基金，為什麼不好好利用？我家附近有一家酒樓，門前的對

聯：「早進來晚進來早晚進來，多吃點少吃點多少吃點。」後聯我改為：「多付點少付點多少付點。」關愛基金的目的，我也把對聯改成：「大是貧小是貧大小是貧，多幫點少幫點多少幫點。」我對關愛基金沒有太大期望，但不少市民生活在貧窮邊緣，並非窮到要中領綜援。如果得到關愛基金協助，生活不會這麼困難。以下兩個故事，可說明關愛基金的作用。

關愛基金想為貧窮家庭做點事，但直接派錢不太好，還有什麼可以做？委員中有接觸學童的，從他處得知，部分學童因家貧無法繳付在校午餐的費用，只好推說自己正在減肥節食，或不喜歡供應商的飯盒，或自備了食物。總言之，不願學校和同學知道自己家貧。委員會決定為領取書簿津貼的學童代繳午餐費用，把飯錢直接交給學校。正如其他家長為子女繳費，受惠學童就不會感到尷尬和白卑。

殘疾人士方面，一些必須倚賴器械走動，一些需要額外藥物和他人的照顧。生活十分困難。政府常說殘疾人士可領取傷殘津貼，但殘疾人士多有怨言，認為金額不足夠。我們與殘疾人士見面，聽取他們的意見，發覺問題並不簡單。坐輪椅和需要洗腎的，面對的困難並不一樣。關愛基金當然不能一一滿足他們的要求，但可以做的都盡力去做。我聽着殘疾人士訴說他們的故事，深感人生旅途中，一帆風順的百中無一。人總要面對大大小小的挫敗和不幸：一些人自暴自棄，前途就此完結。一些人失落之後，重拾信心，踏上人生另一階段。關愛基金能夠做的，是幫窮人一把，免得他們因匱乏而做違背良心的事。

貧窮新一代與「M型」社會

貧富懸殊與社會穩定

現在要轉到貧富懸殊，這在前兩部分也有論述的。回歸後，貧富懸殊是緩和了還是變本加厲？貧富懸殊從來不是新鮮的話題，古時已有「貧無立錫之地」的說法，我在八十年代初所做的貧窮研究，也曾引用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可以說，自有人類歷史記載以來，貧富懸殊已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就算制度怎樣追求公平和平等，社會上總有些人擁有極多，有些人就是不至一貧如洗，但得到的常不夠溫飽。

探討貧富懸殊的文獻多如汗毛，數也數不清。就我的理解，香港現在貧富懸殊還未到危害社會穩定的地步。有歷史學者認為，近代發生的革命事件，例如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清朝的覆亡，多多少少與貧富懸殊都有關係。當富人不知窮人辛苦，還說飢餓的人為什麼沒有肉吃，社會就不會安寧，動亂隨時爆發。香港的富人如何看待窮人？以下再詳細論述，但香港有錢人還未至如此淒薄。

第二部分裏，我提過1993年時立法局一次辯論中，馮檢基議員曾促請政府正視貧富懸殊惡化現象，要求政府採進措施縮窄貧富差距。政府當時的反應是：貧富差距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後果，政府的責任是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政府無意遏止高收入人士有更多的收入。直接一點來說，政府不會「阻人發達」；對於窮人，政府卻不會袖手旁觀。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就是要協助窮人免於匱乏。

1996年，統計處發表中期人口普查報告，並公佈量度收入差距的堅尼系數，數字是0.518。議員和關注組織立時拿數字來抨擊政府，指香港的堅尼系數較發展中國家如中非共和國、洪都拉斯都要差，顯示貧富差距十分嚴重。當時任職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稱堅尼系數未能準確反映市民的生活實情，指數字只計算市民的收入，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尤其是公共房屋，低下階層市民得益最大，但這些無形的收入都不計算在堅尼系數之內。曾蔭權的說法不無道理，但香港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也是政府無法抵賴的事實。

回歸後，香港經歷長達六年的經濟低迷期，市民最關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飯碗，有錢人是否愈來愈有錢，自己是否愈來愈貧窮，暫且擱在一邊不討論。經過六十多個月的通縮後，政府提出要削減綜援金額，關注民生的政黨和組織均極力反對，精神全投放到各項抗爭活動，貧富懸殊是否嚴重的爭拗反而靜下來。

2003年「沙士」爆發，政府為了挽救經濟，引入「自由行」，

市面情況才有好轉。在市民眼裏，香港的繁榮不再，收入就算沒有持續下降，但要返回九七時的水平，前景十分渺茫；但當香港經濟停頓不前的時候，收入不平均和貧富懸殊的情況卻正在不知不覺中變本加厲。為什麼這樣？道理十分簡單，如我一樣有固定收入的人，經濟雖然低迷，但薪金不會大幅下降，反因通縮令自己的收入相對地增加了；低下階層隨着失業率上升，職位常不保，人工也多少了一大截，整體收入的差距就愈扯愈大。

董建華任特首時，有一次與學者見面，我指出：根據最新（2003年）發表的人息分佈數據，1997年回歸的一年，香港約有24萬個家庭月入不到五千元；同一時期，家庭收入五萬元以上的，不但沒有減少，且有輕微上升。換言之，在回歸後的六年裏，低收入家庭多了差不多一倍，富裕家庭卻不斷上升，兩者之間的差距愈來愈明顯。

市民對貧富懸殊的感受

以上是數字上的分析，市民的切身感覺又如何？2006年，我在專欄文章裏這樣解釋市民對貧富懸殊的感受：

市民好像參加馬拉松競賽，有的走得很快，有的走得較慢，但大家都向前進發，相互之間的距離不會對落後者帶來太大壓力，反正競賽仍在進行，差距是必然的。

同樣道理，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前，貧富懸殊並未對香港的安定構成威脅；相對上，有錢人確實愈來愈有錢，窮人也愈來愈窮。不過，隨著經濟增長，窮人的生活仍不斷改善，他們正如競賽中的落後者，與有錢人的收入差距擴大，但生活還不至停滯不前。

亞洲金融風暴出現後，情況應劇逆轉，就好像競賽到了盡頭，或突然中斷。從98年度開始，特區政府連年出現赤字，失業率飆升；包括公務員在內的打工仔經歷前所未有的減薪期。這時貧富懸殊成為市民忿怒的源頭，最終促成2003年7月1日五十萬市民上街表達對政府施政強烈不滿。

感受永遠是相對性，窮人覺得自己比別人窮，也是一種感受。到了今天，仍有不少人認為，窮人只要努力就不會貧窮，而香港不是沒有職位空缺，政府根本不應協助窮人，幫助他們其實是害了他們，令他們永遠不得翻身。對於窮人的感受，很多人也不屑一顧，甚至說他們假扮貧窮，博他人同情。我不想反駁這些批評，看看實情便一清二楚：現在領取綜援的三、四十萬人中，有十多萬是在學兒童，貧窮絕對不是他們所願；他們每天與同學相處，可以對自己的貧窮沒有感受嗎？就算是領取綜援的老人家，他們自認貧窮，感受會好過嗎？長者每天也會與鄰舍見面，吃什麼？買什麼東西？別人都會知道。誰有錢，誰貧窮，能瞞得過人嗎？

所以，不能單倚靠數字來理解貧富懸殊，還要明白市民的感

受。我以上提出的「競跑理論」，正要說明，貧富懸殊不單是收入分佈的差距，還得看市民對差距的反應。回歸前，市民對幾位首富非常羨慕，覺得他們有今天的成就，積聚了這麼多財富，不但是他們努力的成果，更證明香港是充滿機會的社會，當時流行的說話是：「李嘉誠可以，我自己也可以。」雖然知道自己正在欺騙自己。

回歸後，不到十年的時間，情況出現了一個大逆轉，市民不再以富商為仿效對象；他們不是仇恨有錢人，但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開始看不順眼。董建華任特首時，坊間有「官商勾結」的傳言，董建華對此十分不高興，一次與學者見面，擊頭一句就是：「官商勾結」絕無其事，官員絕對不會與商人有枱底交易。另一場合，談到數碼港的地產發展時，董建華解釋：自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香港經濟長期低迷，根本沒有商人願意投資，政府盡了最大努力，才得到可靠財團答允；所以，絕對沒有「利益輸送」，只可說商人有眼光，願意冒此風險。

我相信董建華講的是真話，但市民判斷是非，憑的是自己的感覺，看見地產商賺大錢，還不是政府「明益」有錢人？回歸前，市民仍認為自己有發達的機會，看到別人發財，自己也雄心勃勃；回歸後，一年復一年，經濟長期不景氣，股市如同吃了瀉藥直線向下，樓價也從1997年的高位調頭回轉，股價不見了一半比比皆是，負資產使眾多中產家庭惶恐失措、鬱悶不可終日。

經濟停滯使貧富懸殊變醜陋

到了「沙士」的 2003 年，市民心死了！保得住飯碗的已是謝天謝地，還有能力供樓的已算幸運，不至破產的已對得住自己和家人。在陰雲密佈的情景下，誰敢妄想自己會發達？發達的心死了，但人還是會比較的，眼看仍有不少人揮霍無度，一場豪門婚宴可以花上億元，新居裝潢也動輒以千萬元計。市民心裏會想：為什麼分別這麼大？「競跑理論」是：競賽還未完，跑得慢的還會自我安慰，或許一如龜兔賽跑，最後自己可以追上去；現在競賽完結了，機會不再有了，難免自咎，自己為什麼這樣不濟？真的是沒有努力嗎？別人跑的這麼快，是他們天賦異能嗎？再想下去，就發覺錯不在自己，也不是有錢人的錯；這樣，錯的必然是政府，是政府設立的制度不公不義。

貧富懸殊逐漸演變成爲政府與富商互相勾結。不少政府官員對這個指控感到錯愕，董建華也極力否認，問責官員更齊聲說沒有這回事；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有錢人的財富愈來愈多，這是董建華和問責官員都無法否定的事實，他們只可以辯說：政府無法縮窄差距，況且《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必須維持低稅率，不能對富人徵收重稅，所以政府只能保障窮人的生活，富人賺的錢愈來愈多，政府只能徒呼奈何！

2007 年中，政府統計署發表〈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主題報告，統計處處長在發佈會上補充說：收入差距擴大不一定是壞事，

只表示部分市民的收入較前多了。對於統計處長的言論，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問題不單在數字顯示的差距，還要兼顧市民的感受：市民未必知道堅尼系數代表什麼，也不知香港的整體收入如何分佈，但他們知道的是，為數十萬計的基層工人，工資每月不到五千元，卻要每天工作十多小時。

這是在香港未實行最低工資之前的情況。那時候，為了明白基層工人的感受，我做了幾個訪問，對象首先是我居住樓宇的管理員和清潔工。他們每月有多少薪金？其次是我常常光顧的茶餐廳老闆和員工。老闆每月給伙計多少人工？我得到的數字都是真實的，一點不假。與管理員和茶餐廳員工傾談時，我還會問他們家裏的情況：配偶是否外出工作？有沒有子女讀書？

窮人其實不會憎恨富人。在接受我訪問的工人心中，他們覺得有錢人都有他們成功的道理，各有他們賺錢的手法，不能說他們不對。但相比於有錢人，他們感到不忿的是，自己為什麼賺的這麼少？有清潔工對我說：她一早離家上班，六時過後才放工，每月只得四千元！她說話的語氣，我知道她心裏有火！

面對傳媒訪問時，窮人會說生活「好苦」、「好慘」，但一般不會怨天尤人，常講的是：誰不用「捱世界」？但制度若然不公平，他們是知道的；有錢人如果有各種特權，政府又好像偏袒他們，窮人是會憤怒的；當然，他們有這種感覺，不多不少也受傳媒的影響。我問茶餐廳員工，政府怎樣偏袒富人？他們想了一會，舉的是

當時具爭議的事件，如地產商的「發水樓」，政府廉價出售建成的居屋給地產商。總言之，這些都是感覺，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但一旦有這印象，很難會改變。我曾對政府官員說，貧富懸殊是否嚴峻，不能單看數字，最重要是市民的感受。

M 型社會和中產「下流化」

「沙士」過後兩、三年，經濟復甦勢頭不錯，我從公佈的人息數字，卻發覺中產有「下流化」的趨勢。「下流化」是台灣詞語，指中等人士的收入不但停滯不前，且有向下流動的危機。那時候，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剛提出「M 型」社會的理論，指出日本社會中間收入的一層，一些增加了收入向上流，但更多收入減少向下流，形成英文「M」字中間部分向下陷的情況。我比較了 2006 年和十年前的收入分佈數字，發覺月入六萬元以上的人士多了，月入一萬元以下的增加更多，可見中間部分減少了。

「M 型」社會的意見提出後，引起不少討論，到了 2007 年中，統計處也作出回應：說香港不是「M 型」社會，並不符合大前研一的定義。我沒有反駁，因數字分析，各人可以有不一樣的結論：中產人士中，確實有少數向上流，他們主要從事金融界，或自己是專業人士，但非專業的大學畢業生、任職教師、行政人員、推銷員等，雖自命為中產，但出來工作十年八載，收入與基層相若無幾，自己也覺得向下流了。

「M型」社會的爭論持續了一段時間，其中涉及的計算方式及理論相當複雜，並沒有引起市民太大關注。不過，自命中產的市民意識到，他們的中產地位並不穩固，有時只是一廂情願的感覺，相對於居住公屋的低下階層，他們只是表面風光，實質上左支右絀；最令他們感到傷痛的是，中產的最重要特徵，即擁有自己的物業，卻離他們愈來愈遠。

中產淪陷了！說話或許誇張一點，但2008年雷曼事件引發的金融海嘯，對中產是雪上加霜：雷曼事件造成的傷害，並不限於購買了雷曼債券的投資者，而是一切以金融產品作為他們儲蓄工具的中產人士。結果，凡有投資股票和其他金融衍生產品的中產人士，很難沒有損失。

雷曼事件引發的金融海嘯

2008年至2010年間，香港的經濟經歷了頗大的波動，金融海嘯一起，股市和樓市隨即下挫，幅度十分驚人；待美國聯儲局出手救市，開始推行「量化寬鬆」政策，股市和樓市才穩定下來，但香港的經濟已如過山車，急速的下滑，之後慢慢地爬起來。這樣的起落，為香港的貧窮帶來了新的詮釋，也令香港的貧富懸殊變得尖銳。

傳統上，福利機構的扶貧對象多是一些老、弱、傷、病的市民，其中大部分領取綜援，但綜援金額未必足夠，所以到了「搵尾」，不少綜援家庭已「彈盡糧絕」，只好向福利機構求助。福利

機構如果有額外資源，也會為求助者提供食物和日用必需品，慢慢成為坊間所稱的「食物銀行」。除綜援受助者外，也有一些家庭未必符合資格領取綜援，如新來港的內地移民，收入不穩定的低薪工人等，他們也是「食物銀行」的援助對象。

2008 年金融海嘯發生後，有「食物銀行」的社工對我說：近日有衣着似「上班族」的男士來領取食物，他們表現尷尬，明顯以前並沒有尋求協助的經驗。另有社工對我說：在中環的快餐店，午膳時分，他看見有衣着整齊的男士，待女士完餐後，食物如果有剩餘，他即趨前坐下，三扒兩撥的把食物吃光，情景悲涼。

以上事例，當時傳媒也有報道，但情況是否普遍，我無法掌握，所知的是：確實有中產家庭的戶主，在金融海嘯中失去工作，或投資蒙受極大虧損，儲蓄不至消失殆盡，但一時間沒有錢用，生活異常困難。聞說一些擁有學歷和專業資格的人士，一旦遭解僱，不願告訴家人，每天仍假裝上班，其實在街上踴躑，到下班時才回家。正是這些中產人士，再沒有固定收入，自己不吃，但家人也要吃，只好向「食物銀行」求助，而自己的午餐也只好不要面子的吃別人留下來的食物。

還好，這樣的悲慘日子並不長久，到 2010 年初，市面大致回復原貌，「上班族求食」的報道不再出現。這是否意味中產不再向下流？香港又可返回「只要肯努力，總會有出頭」的日子？我的觀察是：香港自此經歷了根本性的改變，改變表面上或許看不到，但

只要與回歸前的情況比較，貧窮的面貌出現了變化，貧富懸殊也須有新的解釋。

住屋問題製造社會分裂

變化是什麼？先談 2008 年後出現的住屋情況。回歸後，我負責指導的研究生，多是從內地著名大學本科生畢業來香港大學就讀的；博士課程一般需要四至五年方可完成，頭兩、三年大學為他們提供住宿，最後一、兩年，他們要自己找地方，一般在大學附近的西環和堅尼地城的唐樓租住地方。2008 年前，同學花兩、三千元可覓得一個約一百呎的房間，有時三、四個內地同學合租一個單位，攤分起來每月約二千元。

2010 年開始，有內地同學對我說：二、三千元已租不到一個房間，出租的單位也愈來愈少；業主都把單位分割為極細小的套房，叫價三、四千元。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麼細小的套房，以前的套房裝潢豪華，多在中環對上的半山，是收入不錯的單身僱員的住所。同學住的套房是另一回事。

2010 年中，有一位我指導的內地同學租了這樣的套房。在堅尼地城三角碼頭附近，我趁機「參觀」：房間約七、八十呎，有一線窗口，望出去並不是青天白雲，是隔離不遠另一棟樓宇的牆壁；鄰近窗口的地方裝上馬桶和洗手盆，對上置有花灑，只要把浴簾圍上，算是有獨立的廁所和沐浴間；餘下的空位，只可安放一張單人

床和一張摺枱，牀上有掛衣的地方。

這樣的蝸居，後來傳媒稱之為「劏房」，分佈港九新界，初時還以為是單身低收入人士租住的，後來油麻地花園街深夜一場大火，起火是街旁售賣衣服飾物的攤檔，牽連鄰近樓宇也燒起來，濃煙加上火勢，導致人命傷亡。後來發現，着火的舊樓都隔有「劏房」，居住環境十分擠迫，走火通道亂七八糟，居民找不到逃生通道，最終逃不過死門關或嚴重受傷。

這次大火，顯示「劏房」居民不再是收入微薄的獨身漢，更多是單身年輕人，男女都有：他們可能為了返工方便，或不願與父母同住，於是選擇單獨一個人生活，爭取最大的自己空間。除年輕人外，也有不少低收入家庭，他們可能正在申請入住公屋，或成員中有新移民，暫時無法「上樓」。入住「劏房」的原因很多，但不離收入無法追上不斷攀升的私樓租金，租住「劏房」是他們唯一出路。

受火災影響的居民，其中有大專學歷的年輕社工，他沒有詳細交代租住「劏房」的原因，但從他的例子，可知今天大專學歷，不再是脫離基層生活的保證。這帶到我要談的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今天中產的定義。誰人是中產？社會人士對中產沒有一致的看法，一些市民認為：收入不斷增加，原先住在公屋的，有了足夠儲蓄，就可申請居屋，若能力許可，私樓價格又在自己負擔範圍之內，可分期購買自住物業。無論擁有的是居屋或私樓，一旦擁有自己的物業，就算仍要供款，感覺上也算是中產了。

復建居屋的爭議

「沙士」過後，樓價止跌回升。2007年，股市創新高，樓價開始脫離一般打工仔的負擔水平，政黨和關注團體催促政府恢復興建居屋，否則市民置業困難重重。那時候，我是策略發展委員會成員，好幾次討論應否復建居屋，身為策發會主席的特首曾蔭權，反應異常消極，嘗言樓價仍未返回「九七」水平，不少小業主仍未脫離「負資產」，這時政府復建居屋，樓價再次下跌，誰來負責？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政府更不敢貿然復建居屋，但礙於復建居屋的呼聲一浪接一浪，曾蔭權推出居屋「優化版」，申請者可先租後買；但「優化版」是虛招，市民不領情，繼續要求復建居屋，並同時增加公屋興建的數目。為什麼市民有這種呼聲？問題還是私樓太貴！2010年開始，樓價如脫韁野馬，連元朗和上水的新樓也要萬元一呎，令人瞠目結舌，一般市民無法高攀。

在一次策發會的會議上，我提出政府必須復建居屋的十大理由：三個是經濟性的，三個是政治性的，四個是社會性的。我強調居屋不單是滿足低收入市民置業的欲望，更是幫助他們向上升流動的階梯。我從1977年開始在大學任教，學生中超過一半來自公屋，到他們畢業，收入有改善，可與家人一起申請居屋，一次未能抽中，再接再厲。直到成功擁有自己的物業；他們的父母十分開心，覺得子女學業有成，連帶他們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學生工作了幾年，有了一點積蓄，自己又打算結婚，下一步就是置業安居。這

樣，父母得到安頓，自己也有物業，兩代都不用為住屋煩惱，心裏十分踏實，從基層到中產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政治上，我看不到政府不復建居屋的理由。樓價升至不合理水平，一般市民買不起，自然積累怨氣，政府官員的反應也令人氣餒：特首曾蔭權勸告年輕人不用急於置業，並以自己為例，說四十多歲才買第一層樓，又說環頭環尾還有幾百呎的中下價樓，年輕人可揀其中可負擔的置業，再過幾年才樓換樓。曾蔭權要求年輕人以他為榜樣，但他是以自己三、四十年前的經歷，現在用來教訓千禧年代的年輕人，與時代太脫節了！2007年初，經濟恢復急速發展，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對議員表示：「今天的香港是二十年來最好的！」這話聽進年輕人耳裏，只覺得他說話渾薄。

每月萬多元收入仍是貧窮

2009年，經濟剛從金融海嘯恢復過來，失業率下調至百分之四的低位，找工作絕對不困難，物價也相對的穩定；在「自由行」的帶動下，市面一片繁榮景象，但市民的怨氣有增無減。市民埋怨些什麼？原因很多，但香港的收入分佈愈來愈不平均，應是促成市民不滿的重要原因。以上我引用日本學者大前研一「M型」社會的理論，指出香港正陷入同樣的危機；三年過去，我翻看香港的入息公佈，發覺月入一萬至二萬元之間的受僱人士，竟超過一百萬人，佔整體受僱人士三成有多。後來，我在報章撰文提出警告：這樣的收入分佈必在社會上造成嚴重的矛盾和衝突。

打工仔月入萬多元，生活應該不錯，他們為什麼還要鬧情緒？在社會上製造事端？我進一步分析這百多萬月入介乎一萬至二萬元受僱人士的背景。發覺他們大部分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約有一半擁有專上學歷。其中部分是學士學位畢業生，部分完成副學士課程，部分曾接受專業或技術訓練。以學歷和收入而言，這批萬多一萬元收入的人士，不算是窮人，他們自己也不會認窮，但他們的生活好過嗎？

月入一至二萬元，生活必需開支應可應付，他們仍算貧窮嗎？為了深入了解這些年輕人的生活狀況，我邀請幾位大學畢業了十年八年的同學來茶敘，聽聽他們的經歷和意見。首先，今天的年輕人出來工作後，就算沒有結婚的打算，他們也希望搬離父母去自找居所。年輕人為什麼不想與父母同住？因素很多，如深入分析，可另撰寫一部書。但年輕人已是大個仔、大個女，還會與父母同住嗎？香港的居住單位多只有幾百呎，年輕人怎會有自己的空間？

另外，收入分佈不均，樓價飛升，誰是罪魁禍首？幾位三十歲上下的大學畢業生異口同聲的把矛頭指向政府：政府偏袒地產商，不肯散建居屋，只着重發展金融和地產兩個行業，把香港變成一個大賭場。發達就要靠炒樓、炒股；正正經經、誠誠實實的做事，月入不過萬多二萬元，「餓你唔死」，但要成家立室、置業安居，不要發夢了。

「地產霸權」的後遺症

除政府要負責外，年輕人還提到「地產霸權」，這是近年每次遊行和抗議最常聽到和見到的口號。什麼是「地產霸權」？以下再解釋，但與年輕人傾談後，我感到不安的是：為什麼在回歸前，市民對富商稱許有加；回歸後，地產商卻成為攻擊和嘲笑的对象？是地產商做錯嗎？是政府偏袒他們造成的後果嗎？是香港的經濟扭曲發展所形成的現象嗎？不要小覷「地產霸權」的指控。

自此，香港不再有成功的典範（role model）：從前不少市民以富商為榜樣，盼自己也能白手興家、飛黃騰達。今天，這樣的人生目標如廢人說夢話，買中六合彩還容易呢！

自此，市民不再相信政府關心他們的福祉。政黨、公民團體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政府復建居屋，但政府的表現卻是這麼冷淡，這麼漠不關心，怎教市民不沮喪！市民感受到的政府不但沒有把他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只想著如何「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恐怕一旦復建居屋，樓價應聲下跌，政府又給市民罵了。於是，官員採取「拖字訣」，推出什麼居屋「優化版」，但市民看來有如「指鹿為馬」，政府把市民看作傻瓜。

自此，香港社會不再和諧，市民間出現嚴重分裂。二十五年前，我在《目睹香港四十年》一書裏，指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市民好像同坐一艘船，因人數過多，擠逼得完全沒有空位；船

客小心翼翼，不敢輕舉妄動，否則船一傾斜下沉，眾人都有生命危險。我用這個比喻，想說明香港的和諧，很多時是逼出來的，並不真實；市民知道，做事一旦過了火位，社會便很容易出現亂子，因香港根本沒有什麼維繫眾人的傳統和基礎；他們願意在這地方生活下去，只為這地方給予他們生存和自由發展的空間。

今天不少人談論香港的核心價值，一般包括：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有說這些是「香世價值」；無論是香港價值或香世價值，市民真的重視嗎？我看不一定，但市民也知道，如果失去這些價值，大家不會按規矩做事，個人不會有保障，公平和公義不會有人理會；換言之，有了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社會才會運作暢順，市民才會感到安全。

「地產霸權」的想法一旦深入民心，市民就會覺得香港再不一樣了！連住屋的基本權利也被地產商剝奪，社會還有道理可講嗎？2009年至2012年間，政府沒有決心解決市民住的需要，容讓私樓價格瘋狂上升，實在大大傷透了市民的心。政府官員常說：市民中有一半是業主，如果樓價下跌，他們豈不理怨政府？但樓價的升跌，對只擁有自住物業的家庭，真的有很大影響嗎？他們會為了樓價的升跌而賣樓買樓嗎？

樓價飛升卻令年輕人十分憤怒：他們埋怨政府沒有理會他們的住屋需要，仇恨地產商把市民的心血「搾乾搾淨」，不再相信社會有公平和正義。

或許我接觸的年輕人太憤怒了！但誰人敢言，香港近年出現的分裂、矛盾和衝突，不正是「地產霸權」和收入分佈不平均所造成？2011年11月，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貧富懸殊漸成葫蘆形」，或可說明其中的轉變：

為什麼月入一萬到二萬元之間的打工仔是貧窮新一族？這種領悟是今年「七一」遊行時觀察得來的。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是2003年後最多；參與遊行的群眾，據傳媒報道，超過半數屬年輕人，年齡介乎二十至四十歲間，其中「八十後」尤佔多數。

雖然上街遊行已成香港本土文化，市民習以為常，但市民對政府施政如不是有強烈不滿，當氣溫徘徊在三十二、三度之間時，年輕人不會輕易上街。他們願意走出來，除了對政府忍無可忍外，相信更根本的原因是，感覺自己生活在這個社會裏，好像完全看不到前途；尤有甚者，他們發覺際遇如此不滿，並非自己沒有努力，而是社會制度欠缺公平，政府施政有違公義。

從這樣的觀察，我聯想到近年廣為社會關注的貧富懸殊問題，這是個中央領導人也認為特區政府必須解決的深層次矛盾。不過，提起貧富懸殊，政府的反應總限於如何改善窮人的生活，其他就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就這樣，政府 2005 年成立扶貧委員會，兩年後解散了。委員會的成效如何，見仁見智，但委員會的二十多項建議大多得到落實。扶貧只是第一步解決貧富懸殊，隨後來的是最低工資。這個從前看似絕對沒有可能的勞工措施，今天成為事實。工會領袖過去的努力應功不可沒；而中央領導人訓示要認真解決，相信也有助最低工資最終落實推行。

這樣，基層工人的工資提升了，貧富懸殊就可改善嗎？答案是「否」的。最低工資只能令收入差距不再惡化下去。那麼，香港的貧富懸殊又是怎樣的變化？戰後六十年來，香港的收入分佈出現了怎樣的變化？現在的貧富懸殊有什麼特色？

我生於戰後初期，那時窮人佔了絕大多數，且多是從中國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家無定所外，很多連基本生活也無法支撐，患病的又多是得不到適當醫治，病死街頭時有所聞。今天，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多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他們回想兒時經歷時，多訴說在極惡劣的環境中長大，成功絕非僥倖。

誠然，對年長一輩的香港市民來說，五、六十年代是艱難的歲月。以上所提的成功例子絕無僅有，更普遍的情況是市民儲蓄度日。能夠「餐餐餐食餐餐清」的已是中等人家。孩子完成小學已算幸運，更多是中途被迫輟學，出來工作幫補家計。我讀的小學是窮人家的學校，獲取派位升中學

的，在一班四十人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

從入息分佈情況看，五、六十年代就像一個金字塔，極上層是尖尖的，那極少數富貴人家，不是傳統上好幾代的有錢家族，就是從中國大陸來港的大富大貴。至於金字塔的最底層多是難民，他們身無長物，且多是從鄉下來的農民，他們拖男帶女，來港的目的是但求溫飽。

以前不會用貧富懸殊來形容收入嚴重不均，但金字塔形的入息分佈，難免對社會穩定造成衝擊。香港在五、六十年代出現了三次規模龐大的社會動亂，雖說其中兩次由政治紛爭引起，但內部沒有矛盾，市民生活穩定，人心怎會思變？動亂怎會一發不可收拾？

到了七、八十年代，研究香港變遷的學者常把這個階段形容為黃金期（golden period），因在這二十年裏，香港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兩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期間經濟發展迅速，原因是香港正赶上世界工業發展的潮流，短短十數年間，勞動人口有超過四成從事製造業；社會發展則更飛猛進，原因是殖民地政府放棄過往讓港人自生自滅的政策，轉而採取錄取手段，強化殖民管治的穩定和認受性。

以入息分佈而言，七、八十年代間，赤貧人口的數目逐漸減少。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數十萬內地居民逃來香

港，但香港的製造業正值蓬勃期，要吸納廉價勞工完全沒有問題。此時香港各行各業仍在草創階段，投身任何新興行業，無論學歷如何，只要勤奮工作，要出人頭地並不困難。

那些有高學歷的，如大學畢業生，一旦進入政府部門或大企業，只要不過不失，多可晉升至管理階層。早前我與幾位八十年代初讀社工的畢業同學聚舊，他們已是首長級官員或機構主管。就是這樣，到了九十年代初，香港的入息分佈從金字塔形轉變為橢球形；極貧的人口不會消失，但他們不會如戰後初期般佔人口的大多數，取而代之是更多中等收入人士，也就是一般所說的中產。

三年前，我在本欄引用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的用語，說香港也走上了M型社會的言論，即時引起一陣激烈辯論。無論結論是什麼，香港階層向上流動，近年來確實出現了相反的方向。再以八十年代初的畢業同學為例，他們的子女多已長大成人，一些且出來社會工作；我的學生均異口同聲說，他們的子女很難有自己的機會。最令他們擔心的是，子女欠缺經濟能力組織家庭。

M型社會或許沒有在香港出現，但不爭的事實是，回歸後方畢業出來的年輕人，若出身中產，他們要停留在這個階層必須加倍努力；而來自基層家庭的，要往上爬則阻力重重。畢竟到了今天，香港已不再是處處充滿機會和生機。

這樣，櫻球形的收入分佈又漸漸變形了。部分原在中間的往下滾，原在基層的則往往原地踏步。現在最貼切的形容是：收入分佈的形狀好像一個葫蘆或水果店常見的啤梨，底部重重的。這樣的貧富懸殊，政府如何應對？

「貧窮新一代」是我過去幾年，在研討會上或文章中常談論的，指的是月入一萬至二萬元間的打工仔。我發覺這一群受僱人士數目在 2013 年底達到 138 萬人，年齡多在二十至四十歲間，有四成擁有專上學歷。我為什麼稱他們為「貧窮新一代」？因按照扶貧委員會於 2013 年訂下的「貧窮線」，他們不算窮，但他們得不到公共房屋和福利的保障，生活過得並不輕鬆。

年輕人為了自己的生活空間，不惜「蝸居」，是他們的選擇嗎？我擔心的是，他們為了應付作為「中產」的生活開支，不少借貸度日。他們不願腳踏實地、勤奮工作嗎？今天的社會風氣、消費文化，年輕人如何自處？年輕人不應委過於人，但他們深信「地產霸權」是存在的，他們也覺得香港社會並不公平。2011 年 3 月，我在文章中對「地產霸權」作了以下的詮釋：

所謂「地產」，意思指貧富可以如此懸殊，收入可以如此分佈不均，箇中情況皆因地產而起；擁有土地者可積累財富，貧無立錫者只得淪為社會最底層。換言之，是否擁有土地或物業，劃分了貧與富；擁有愈多土地愈富有，只擁有自住物業的是中產，沒有的就是貧窮了。地產既決定一個人的

貧富，也成為權力的來源。

所謂「霸權」，就是擁有土地者不但積累財富，且可把權力伸延至市民生活的不同領域，影響力無遠弗屆。市民發覺擁有土地的富商不但擁有巨額財富，還以一股強橫的勢力令他們生活艱難：工作愈來愈辛勞，生活沒有改善，付出與收穫不成比例，前景灰暗不明，人生就是一連串的無奈和混沌。所以，政府對貧富懸殊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按照個人技能和經驗的差距，收入分佈有差距可以接受。香港奉行資本主義，貧富懸殊是意料中事，但香港現有的貧富懸殊明顯超過了可接受的程度，也明顯是不公平制度的後果：政府監管不力，容讓富商「賺到盡」；制度向有錢人傾斜，令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政府的政策軟弱無力，使弱者無力向強者討價還價。

要消除市民的「仇富」心態，必須處理貧富懸殊，設立關愛基金只可幫助少數有需要的市民，但不能改變他們認為政府偏袒富人的看法。我講了，要市民相信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制度上必須搖亂反正，以公平為基礎，推行政策時符合公義的原則。

貧富懸殊引發的民怨是大的！令人憂心的是，怨氣並不限於基層，貧者很多時把不幸歸咎於命運。其實，中產對貧

富不均同樣感到不安。他們不是憂慮自己的利益受損，而是他們看見少數人擁有天文數字的財富。三百多萬打工仔卻有一半月入不到一萬一千元，這樣的懸殊能長久下去嗎？我認識的一些富人也認為情況不健康，政府必須做一些事。

不要自欺欺人了，政府該承認貧富懸殊是動搖社會穩定的最大隱憂。就算政府不知做什麼，也應提出問題供公眾討論，共謀對策。我的建議是：政府應就貧富懸殊草擬諮詢文件，臚列造成懸殊的成因和影響，並提出短期和長期的解決辦法，讓市民提供意見。

事實說明一切

到了這裏，應對回歸後的貧窮面貌來個總結。回歸後的窮人是誰？梁振英當選特首後成立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翌年發表2012年貧窮情況的報告，為窮人的數字提供答案：市民中，六十五歲及以上的長者，三個中有一個貧窮；一至十四歲的兒童，五個中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其他市民也有生活貧窮的，但不及老人和兒童的情況嚴重。

回歸前看貧窮，着眼個人，好像政府肯幫助市民，市民自會自力更生，不再窮了。但貧窮單靠個人努力就可改變嗎？回歸後，市民發覺到，所謂「授人以漁」，就算有道理，也只適用於部分市民；那些晚年生活貧困的老人，平均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活費用如何解

決？又如貧窮家庭的兒童，他們可以得到公平的發展機會嗎？

貧窮由個人的問題演化為制度的缺失，引起的社會矛盾和衝突，是香港無法擺脫的枷鎖。貧窮與貧富懸殊是一線之隔，窮人不會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貧困，也會與周邊的事物比較；我談貧窮，也談貧富懸殊，目的在說明，貧窮看似一己之事，但窮人也是社會一份子，與別人比較時，貧富懸殊就成為必須關注的現象。

在比較之下，就會出現今天市民常用的兩個詞語：公平和公義。公平和公義的意思，我從小便聽老師解說，為什麼市民今天對事情動輒就說制度不公平、措施不公義？市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寫作此書，我的目的不在分析問題，是以我的親身經驗來解說現象。如何解決貧窮和貧富懸殊，我沒有答案；到了今天，我還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貧窮、有人富有？為什麼窮人總是這麼多？我能夠做到的，是把我經歷和所看到的，如實的說出來，我相信唯有事實本身才可說明一切。

有一次，我和一位拾荒的老婦交談，她正把街上拾到的廢紙皮交給回收商。我問她：做了一整天，辛苦嗎？她沒有回答，從衫袋裏拿出一張十元紙幣，另一個五元硬幣，表情好像說：就是這麼多！我知道了，一張十元紙幣和一個五元硬幣是最真實的答案。

香港有什麼變化而令我有執筆的決心？首先，香港社會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我熟悉的貧窮，情況很不一樣。三十年前，我認為香港的貧窮已非「吃不飽、穿不暖」，今天再這樣形容貧窮，看來也不再貼切？其次，常說香港的收入分佈極不公平，貧富懸殊，香港的穩定會受到破壞嗎？第三，香港的住屋問題轉化為階級矛盾，抨擊「地產霸權」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的房屋建設為什麼淪落到如斯地步？第四，香港的家庭顯得支離破碎：年輕人不結婚，不生育，老人被形容為「社會包袱」，親情去了哪裏？最後，香港人追求的「獅子山下精神」是怎麼一回事？「獅子山下精神」仍存在嗎？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目睹六十年來香港社會的動盪與演變，指出香港已出現根本性改變，特別是人所不願見又偏偏避不開的貧窮問題。本書結合周教授戰後在香港的成長經驗，以及四十多年來在社福界工作及教學的親身經歷，主要圍繞香港社會的貧窮面貌作比較及探討。周教授強調，現時香港的貧窮已由個人的問題演化為制度的缺失，成為結構性的問題，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和衝突，是香港無法擺脫的枷鎖。

其實，貧窮面貌所反映的，又何止限於窮人的物質生活？貧窮又豈可與社會其他現象分割？各位可以借周教授的慧眼和真人真事的論述，透視香港社會六十年來的貧窮真相。

ISBN 978-938-6200-82-5



9 789388 329092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98元

建議上架分類：香港專題／社會研究